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SAIAS

闻 道

◎学人访谈

冯绍雷教授访谈录

◎国际问题

第一次英日同盟与20世纪日本
结盟外交的缘起

◎学术随笔

修昔底德与战争的起源

◎天下

索契——被绑架的白雪公主

2014年第1期

总第12期



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访问我校



冯绍雷教授应邀在中国
驻俄罗斯大使馆做演讲



我校在俄罗斯高等经济
研究大学正式设立工作室





2014年第1期

总第12期

主 编：蒋霁望

副主编：

李后立 李沁笛

蔡一麟 李 娟

国际关系与地区
发展研究院

《闻道》
编辑部主办

目 录

卷首语

《闻道》创刊三周年记 蒋霁望

学人访谈

冯绍雷教授访谈录 (1)

国际问题研究

第一次英日同盟与20世纪日本结盟外交的缘起
..... 尤一唯 (18)

美国与中国在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 Lebedeva Polina (芭丽娜) (38)

学术随笔

修昔底德与战争的起源——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 孙 超 (68)

读《大外交》有感
——从历史视角看政治领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 华 盾 (85)

天下

索契——被绑架的白雪公主
..... (95)

话语·幽默

..... (99)

《闻道》三周年专题

- 小时代浪潮下的守望者——献给《闻道》三周年
..... 李 沛 (100)
- 将心注入
..... 吴途勇 (102)
- 在《闻道》中蜕变
..... 曾乔圆 (105)
- 我站在丽娃河畔
..... 王晓笛 (106)

专题报道

- “中亚南战略交叉点”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 (107)
- 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最后的边疆：新欧亚理念”
国际学术研讨会
..... (109)

院内·院外

- (110)

编 辑：

(按拼音字母为序)

费梦戈 关婧雯 古娅珂
华 盾 李春燕 李 括
孟 舒 王晓笛 王亦冰
王韵涵 黄敬荣 黄仲凯
席天士 杨骐铭 杨晓娜
叶 锟 张洪玉 赵舒婷
朱文青

封面题字：冯绍雷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 座 410 室
邮编：200062
邮箱：ggwendao@gmail.com
网站：<http://www.saias.ecnu.edu.cn/il265.htm>

注：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单位
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靡不有初，寤志有终。

冯弘雷

沟通的渠道

交流的平台

启发智慧

砥砺思想

分享知识

奉献感悟

吴文

学人小传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综合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



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 2010 年世博会国际事务咨询专家、上海市政府聘请的会议大使等职。历任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立法咨询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政府外事咨询专家、联合国开发署 CIS 国家宏观经济问题专家等职务。专攻俄罗斯问题及战后国际关系。主要研究领域：俄罗斯政治、外交、社会转型、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等。

《闻道》：冯老师您跟新中国同岁，跟新中国一同成长。在这 60 多年里，您是如何走上俄罗斯研究的道路呢？

冯教授：大概两年前，跟布鲁金斯学会一批老朋友们在一起时，他们问起了我的个人经历。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 1949 年到 1966 年这 17 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下，大体是属于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此后，经过了文革十年沧桑，那不仅是一个东方古老国家的灾难走向了顶端，而且从国际发展角度来看，也是当时国际社会所经历的激进时代的登峰造极之时。

十年文革之后，我们又亲眼见到一个国家是怎么从混乱和灾难中获得重生。痛定思痛之后，中国迅速地走向改革开放，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包括在百废待兴之际，我们有了机会上大学。我既是属于老三届，这指的是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在中学念书的初中三届、高中三届的这批人。

同时，我又属于 77 届，也即是文革之后的第一届经过比较正规考试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从那时起，在这所大学一直工作到现在。这批美国朋友听我讲完之后，感慨地说：“Shaolei, that is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国家。一方面，是多灾多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劫后余生、经久不衰，真是很不容易。从大的方面说，我觉得，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和许多东欧国家是属于类似的一个情况。我在读科尔奈的一本新书《思想的力量》，这可以说是东欧一位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回忆录。他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匈牙利的解放。在苏联影响之下，包括科尔奈在内的很多人，对于在废墟上被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开始时还都是充满激情，有一种解放感。

《闻道》：后来这种解放感退化了吗？

冯教授：从我记事开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时上海已经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这一波运动。我的印象当中，至少我们跟苏联不一样，苏联是采取一种全面剥夺的办法，而我们大体上是采取一种赎买的方式。总体上说，我印象中开始时的商业阶层和知识阶层还是比较合作，并且不少人还是真心诚意地投入到这样一个社会改造中去，愿意为社会做贡献，接受国家的赎买政策。总的来说，心态还是比较平和、比较正面的。

当然，之后的情况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1962 年的时候，我那时是少先队的宣传委员，负责出黑板报，记得在黑板报上还曾经写过“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样的标语。虽然，当时并不理解这样一句话的政治含义，作为一个未成年的经历者，只是感觉到那时的社会气氛有点异样。不像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对当时的历史做很多分析了。

再往前追溯的话，是 1958 年的大跃进，我印象倒是深极了。当时在我所念的小学操场上搭了小高炉在炼铁，每人到处搜集废铜烂铁，搜来就去“炼钢”。记得后来汪老（汪道涵）曾对我说，当年宋庆龄还曾经把她的瑞士手表都贡献给大炼钢铁。当然炼出的是什么就不得而知。很不幸的是，此后，马上就转入三年自然灾害。就在我们长身体的这一年龄段，当时我们日常吃的东西就是豆渣、包菜——也就是无法合拢叶子的卷心菜，还包括杂粮。国家开始全面困难了。

一方面是面临困难，但另一面还是有不少令人震撼的消息。大概是我

考进了格致中学之后的第二年，1964年10月底的一天，全班同学在教室里集中，听取了关于中国原子弹爆炸和同时赫鲁晓夫被撤职的广播之后，老师和同学们情绪激昂。我还走到讲台的黑板前，写下了两句话：“中国原子弹爆炸了，赫鲁晓夫下台了。”当时，人们感觉到国家的大环境在变化，加上自然灾害，说实话开始有点担忧。但是，总的来说，人们还是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抱有很正面的期待。

紧接着的1966年就是文革了。就文革之前的个人经历而言，正处于一个长知识和审美观形成的时期。当时，中国传统样式的多种文化曾经让我着迷。我对古典文学、戏剧、绘画、书法、包括中西音乐，都深感兴趣。这是受到我的父辈、祖辈们偏好的影响。包括江南有一种地方曲艺，叫苏州评弹。我大约在上学之前，就被祖辈们领着去专门演出苏州评弹的书场听书，迄今还是非常留恋。家里有着父辈传下来的大量戏剧史的图书、资料、唱片。所以，以我对京剧历史沿革的了解，年轻人、包括同龄人中能够跟我对话的人，大概不会很多。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人接受传统文化，很多都是从我们的戏剧——特别是京戏的戏文和表演中接受的。这大概是中国式传统社会的传播和认同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到文革开始，我首先感到很压抑的，就是居然要把那些我所迷恋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全部都打倒在地。文革初期，开始大规模地毁坏文化，抄家。因为我那时候家里藏有很多“封、资、修”旧物和上万册藏书，以前的每年暑假都曾帮着父亲整理图书、编制目录，很了解那些收藏的价值。所以，1966年夏秋的那一段，天天担惊受怕，怕毁了这些宝贝。

文革的大串联，我是出去较晚的。一直要到1966年10月中旬，有点憋不住了。于是，我们4个男同学也一起出去“串联”。当时决定步行，从上海走到北京。我们四人花了整整11天工夫步行走到南京后，其他同学们都走地脚打泡，我居然还能顶下来。这大概跟我喜欢运动有关，因为当时我还是中学校篮球队的控卫。我所在的格致中学初中校队当时曾经拿下了上海市的第四名，这可是此后一辈子的荣耀。

步行到了南京之后，有消息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将在12月8日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小将。当时，已经是11月初了，再往北走下去，就可能会见不到毛主席了。于是，我们改变主意，决定从南京扒火车上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我们这批外地学生通通被集中在西郊，因为当时已经开始军管了，军队已经参与对红卫兵的管理和控制，记得当时是被集中在北京军区八大

处驻地。突然一天凌晨，通知说有特殊任务，也没说什么任务，于是，我们清早4点钟就急急起来，随身的小刀、钥匙片都上交。另外，很奇怪的就是鞋带也不能系。然后，就从八大处北京军区，摸黑排队，步行到西郊机场等候。

12月8日那天，大概下午4点钟左右，太阳都快下山了。突然，从机场西边，呼喊声像潮水一样席卷过来，突然我意识到了，有多少万人聚集在那里啊。当时的感觉真是有点狂风大作，乱云蔽日，然后是人潮滚滚。“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像海潮一样从机场的西边翻卷过来。果然，是毛主席来了，而且，主席的车队来得很快，一下子就到跟前。我们这个地方正好处在上坡，毛主席的车开得比较慢，所以看得很清楚。但秩序有点乱，前挤后拥。落日余晖之下，灰蒙蒙的沙尘之间，我只看见一个高大身影，远远高过其他人，纹丝不动地站在那辆吉普上，两手扶着车身的握把，犹如铁塔一般，神色凝重而威严。这是我唯一一次亲眼见到毛主席。那时，只觉得幸运而又有一种神秘感。文革开始的这一段，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斗和打砸抢，对毛的全面崇拜还没有发生动摇。

以我的理解和感受，文革的转折点是在1970年的林彪事件。在此之后大家对文革和中国政治的理解，逐渐开始走向怀疑，也逐渐冷静。特别是此后的1971年7月16日，那天《人民日报》发布了一条只有一句话的重要消息：基辛格博士在北京跟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然后，就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整个形势出现大的转折，文革也渐渐地走向终结。

《闻道》：这个时候您应该也有特别的感受吧？

冯教授：文革还没有结束，我们就已经有很多新的感觉和新的认知了，特别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及秋后“追查反革命谣言”等事件。实际上，在这最后的一两年，民心已经基本上站在文革的对立面了。总之，我们这一代人从新中国的崛起，一直到文革中饱受创伤，经历了那么多，思想变得较为成熟，习惯于多向度的思考，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闻道》：您在文革期间主要有哪些思考？这些思考与您后来学院建设的构想有些什么关联呢？

冯教授：文革期间的思考还是不少的，虽然来得晚，也很肤浅，但却都是大问题。比如，和老一辈的交流中，我开始思考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否只

能像文革时这样管理呢？我所了解的那些被打倒的著名人物是否都是坏人呢？毛主席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他的思想呢？但是，感触最多的，恐怕还是教育问题。

如果，把 17 年“修正主义教育”和最近这个 30 年的教育做一个比较的话，一方面，我们看到 30 年的教育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步，并且，是以国际先进的教育模式为蓝本的一种学习和模仿，当然我们也加以变化创造，有很大进步。

但是，我们是否要以此来完全否定之前 17 年的教育，从我个人经验来说，似乎值得再做思考。除去僵化的意识形态、除去陈旧落伍的学科知识，至少，它对培养一个人的全面性和多方位发展，当年还是提供了一些值得我们再思考的做法。比如，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当时所感受到的体格和知识教育的兼顾，对于各类人文素养和兴趣爱好的熏陶，对于独立处理各种事务能力的培养，都还是有效的。我记得，当时连副课老师都是一流的。比如，音乐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高材生；美术老师是留日的，与著名人物画家关良是同学；教外文的实习老师是来自华东师大的大学生，人品、敬业、教学能力，包括他们非常和蔼可亲的形象，迄今都还历历在目，深深印在脑中。想想看，连实习老师都能够给年轻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至少，这反映出这里曾有着一种相当有效的社会教育功能。多年来，我在国外曾经见到很多来自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当时的年轻人在西方打拼，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全面的知识积累和综合能力往往使他们比较受人欢迎。虽然，英美式的学科分化，特别是分门别类的专业化教育把事情做细了，提高了专业素养，这是不可磨灭的进步。但是，它也使得原本互相贯通的知识系统变得有点支离破碎了。包括来自美国本身的专业人士，特别是一些我所熟知的资深专家和多年大学教育部门的管理者，都在反思美国式的教育系统，认为有这个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请埃马尔这位法国年鉴学派的大教授来讲课的原因。埃马尔先生是年鉴学派硕果仅存的大师，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或者更晚的代表人物。法国就是跟美国背其道而行之，年鉴学派就是不太讲分化，而是讲综合。知识是一种自然状态，过于细分使得各个知识系统之间的关联会丢失。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专业细分，有便于学科的深化，这点是必要的。但是万事皆有度，到一定程度还是要关注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性。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要关注知识的系统性和人

的全面发展相互之间的呼应，避免过于支离破碎，也避免人的片面发展。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希望注重于推动整体的国际研究，而不只是 Theory of IR。不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一定非要打仗，然后，又跟建构主义吵架。值得在专业范围内做一些争论，好处在于推进我们思维的建构能力和深化。但是，在中国当前条件之下，面对如此天翻地覆的国际变局，还是既要关注学科的分化，同时，还要通过综合，特别是汲取传统的营养，来推动国际学科和健全思维的有效构建。

在我还能发挥影响的一个小小的学院当中，要求同事们都力求既要有分化，但是一定要有综合。我希望每一个老师和同学都要在知识成长和发展过程当中关注这一点。专、偏可以，哪怕出怪招都可以，大学本身就应该有充分的宽容度。今天的大学问题之所在，恐怕是缺乏一点弹性，太浅薄平面，太千篇一律。我们鼓励创新，但另一面，我非常希望看到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交流和融通。

我曾有幸带过一个学生，他的论文选题，比较接近于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国际研究的作品，也即研究的是一个影响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能源诅咒”。这个概念在西方本身也有极大争论，所以，这位同学阅读了大量有关本题的正反两方面的学术作品；同时，他也从实证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以当前而言，虽然有一些国家，比如说俄国，还包括拉美，过度依赖能源的问题严重。但是，有一些能源资源很丰富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挪威、甚至澳大利亚等等，为什么他们没有陷入困境？我认为这样一篇文章，深入地切近到当前影响国家间政治的重要范畴的研究上，不是简单的描述国际事态的过程，而是从学理角度抓住一个核心概念进行分析，找出它的问题所在，又提出自己的反驳，这样的文章就非常有意思。如果这篇论文写成一篇 20 万字的博士论文，我相信会更精彩。到时候也可以把这样一篇文章拿给国际同行们看看，就一个国际学界当红的热点问题，提出我们中国学子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让我很高兴的是，我 82 年开始在华师大工作，已经 32 年了，学院国际交流水平在不断地提高。我们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美国、法国、德国、新加坡，当然还有俄罗斯等国，都有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即使是做这样一个比较前沿的论题，我们也都可以有条件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这是和我一起工作过的老师们，共同努力的辛勤汗水，留下了这些条件，值得大家爱护和珍惜。

《问道》：您的大学生涯是什么样的？

冯教授：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我们10年积累了多少优秀青年，要让他们进入大学深造。”这是77届这一历史现象的一个主要背景。当时，我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了，因此更加珍惜这次机会。当年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校长很有远见、很智慧。他见到有些学校，比如复旦，只收应届的年轻人，就说：“我知道啊，有一批老三届的同学都没有进入啊。”所以，我们是作为77届的最后一批，以走读生的资格进入华东师大的。77届政治教育系有4个班级，我们走读班是四班。但是后来证明四班是最优秀的。现在留校的杨国荣、许纪霖教授，包括童世骏书记，还有经济系的金润圭教授，都是我们老四班人。在老四班中，本人荣幸地当了一回“中层干部”，那就是本班第二党小组的组长。

被耽搁了10年还有机会进学校，于是乎大家都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因为年龄大，经历较多，我们这批学生读书时有点离经叛道，但我们系的老师非常宽容，到现在我还记得很多很好的老师。到了大学第二年我跟老师打招呼说：“老师，我今天到历史系去听课。”老师说：“去吧，去吧！”历史系，特别是历史系世界史的所有课程我都听上了，听到了林举岱、王养冲、郭圣铭、李巨廉、王斯德等老师的课。林举岱是世界史的大专家，王养冲是法国史、思想史的大专家，郭圣铭是中世纪史和史学史的大专家。我和这些老师的关系都非常好！所有笔记，包括世界史的，还有中国史、古希腊史、罗马史等等，我现在都还保留着。记得教古希腊史的老师叫孙道天，一口京片子，而且，长鬓卷发长得就活脱像个古希腊人。这些史学大家在上课时，大都不看讲稿，一边讲述，一边行走于讲坛和学生坐席之间，挥洒自如。这样的一种教学姿态，使满课堂的思想能够活跃起来，也便于跟同学们有沟通，我很喜欢这样的交流。之后，我又去听了中文系的课，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大家，以及施蛰存这位中国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都听到了。在外文系，我不光听俄文，也听英文。外文老师都非常优秀！还有位外文老师绰号叫“八国联军”，因为他会讲八国语言，而且，毛主席语录外文版他倒背如流。太厉害了！真是才气横溢！我觉得中国人才真的是太多，太聪明智慧。很可惜就是一代代人才，没有使他们能够各得其所，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恐怕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浪费。

我在77届这个特殊背景下的经历，决定着我以后对学科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博采众长，推崇多学科、跨学科的发展方式，一定要跳

出单一学科的阔域。我自己学习的过程也影响了我以后对学科的理解，那就是绝不相信那些教科书式的教条，而是关注知识系统的开放性和真切的解释力。

1981年，就在我念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建立了上海苏联研究所。在此之前，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们成立了一个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小组，我被推举担任了组长。我们这个小组一共有5、6个同学，许纪霖也是其中一员。我大学毕业论文是做的“卡达尔的匈牙利改革”。这个题目还是我向许纪霖“征用”的，因为我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而许纪霖当时好像是改做了关于苏联改革的题目。当时没书看，只有少量的几本翻译著作，所以，我们主要以讨论问题为中心。杨成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引过我的一段话，就是说当年搞苏联东欧研究是考古。因为，那时的“《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

上海苏联研究所施平老所长，也是当时上海的大学党委书记中最具魅力的一位，现在103岁了，依然思维清晰。建所30周年时，我们还能够有幸请他出场。担任当年本所刊物编辑的赵泓老师说：“小冯，我们所的刊物，现在叫《俄罗斯研究》，当年叫《今日苏联东欧》。创刊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小冯你写的。”我说：“我记得，是1981年吧，那时我还是三年级大学生，题目大概就是叫‘苏共二十六大的评析’”。当时，做研究就是考古啊！那时，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真理，苏联社会主义怎样蓬勃发展。然后，“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但是，你就是要从这些枯燥无味的文件当中一篇篇比较，咬文嚼字，嚼出点东西来。当年的研究就是这样。

《闻道》：您当初为什么会想到成立一个小组呢？

冯教授：因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就开始了，中国改革怎么搞，谁都不知道，大家只知道粉碎四人帮很开心，可以看传统戏、听古典音乐了，老干部解放了，知青回城了，大学重开了，教授们又可以上讲堂了等等。整个秩序都恢复了，但是改革到底该如何搞，不清楚。当时之所以掀起了这股“苏联东欧热”。一方面，中国要搞改革，首先的模仿对象就自然是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从官方意识形态讲，这都属于“社会主义改革”。虽然中国官方立场当时都还没有承认这些国家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只能称之为“修正主义国家”。但是，这些国家改革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确对中国人而言，充满了新鲜感和吸引力。另一方面，50、60

年代一大批留苏和学俄文的老师，自然就成了当时的“苏联东欧热”的社会支持基础。

我国的改革一方面是学习西方，但是在开始时，有很大一股动力，是来自于学习苏联东欧的改革经验。这一点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实际上，我们始终在这两个方面在吸取知识。从整个 30 年发展过程来说，我们从西方吸取得更多。这个过程在新世纪初有所调整，我们重新加强跟俄国的关系，这是后话了。其实细细想来，这样一个过程中也包含着不少至今还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为何中国改革开放的知识蕴积是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径？

《闻道》：您之前曾说过，现在 18 大提倡的改革跟 30 年的改革，也是一个相互参照。但是现在的改革和您以前经历过的那个改革有什么不同？您讲到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的转型，当时，您是如何看待那种改革经历的？

冯教授：作为个人的体验，整个 30 多年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大体上，从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这前 20 年我觉得基本上是按照一种线性的过程，也即从传统体制走向现代民主与市场体制，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轨迹在行走。而从 90 年代末到新世纪，出现了一些变化，特别是 2003、2004 年以后。这些新变化的核心就是，一方面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晰的线性的过程，从传统体制走向现代市场民主与法制体制，现在还在推进。但是，在另一方面，在这种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欲求，那就是实现民族抱负，建立强大国家，构建大国关系。我觉得这是一种具有新的含义的一个社会过程，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过程。它是前 20 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这些成果使得中国人能够有条件、有能力真正去着手大国的构建。

但是另一方面，大国构建包括要实现民族抱负，要实现中国梦，要建设强大国家，要构建有效而强大的政府，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势头，它的内在含义和我们仍在延续的仅仅从传统体制到民主法治市场关系的建立是不太一样的。过去改革的核心制度和含义就是 **deregulation**，就是要求政府解禁，放松监管，让市场企业、个人释放能量，用市场来整合资源。但是，当我们强调建设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强大政府、追求大国抱负的时候和 **deregulation** 的含义有所不同。所以，我觉得新世纪中国的改革面临着更加深刻的改革内容、更加艰难的改革任务，以及更加复杂的一系列挑战。

《闻道》：近些年来俄罗斯普京搞改革对我们来说有哪些地方值得参考？

冯教授：你这个问题很好！我不大喜欢说中国的崛起。中国依然处于发展、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崛起”这一词确实有点横空出世，而令大家有点突然的感觉。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大家都没准备好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美国人没准备好，中国人也没有准备好。这是一个几十年积累的迸发，同时，我们并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与周密筹划。

但是，我觉得国际环境中，倒是跟中国在新世纪比较迅速的成长，有一个不期而遇的过程，那就是俄罗斯。正好俄罗斯在新世纪也经历了所谓“黄金十年”。大家知道普京这个人本来是来自自由派阵营的，俄罗斯的转折点也是在 2003 年。2003 年的俄罗斯有几件大事，一个是抓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最大能源企业尤科斯的总裁，从内政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以前，俄罗斯推崇偏于自由化的经济取向，但是 2003 年以后，逐步地转向了威权主义。在此同时，2004 年正式推动的中央对地方权力的回收，地方长官不允许直选，而是通过任命，都是这种思想转向的体现。2003 年之前是自由选举，现在也在重新开始自由选举。但是从 2004 年开始，乃是总统任命地方长官，然后议会通过。实际上，这项制度的准备工作是在 2003 年做的，2003 年是一个关键时刻！

同时，俄罗斯外部环境上也出现了一个大转折，就是伊拉克战争。我觉得伊拉克战争不是美国强大的体现，是美国战略上出了大毛病。因为这场战争对美国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实在不易说清。这场战争到现在为止，连战争爆发的一个必要前提都没有找到，也即到底为何美国要打这一仗，是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还是美国借机实现它对世界事务的掌控。我觉得美国出问题了。这不光是他的物质性的权力出问题了，关键还是它的思想和战略出问题了。

相形之下，我认为俄国当前经历的是一个“威权体制”。在没有找到更为合宜的术语之前，请允许我还是使用这一“西方术语”。事实上，中国也有类似的政治建构。中俄在迅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彼此相互关切，而且相互支撑。普京最近年度咨询报告之中讲了一句我觉得很重要的话。他讲，也是第一次相当明确的提出，他信奉保守主义价值观念，conservatism。为什么这个东西出现了呢？普京说，按他所理解的保守主义，不是为了让历史倒退，而是恰恰阻止历史倒退和社会走向混乱。Conservative，保守的意思就是遵从传统的价值、国家、家庭、宗教、个人关系，遵从传统的价

值标准。我觉得，对于当下的俄国，这并不是坏事。应该摒弃成见，比较公正地看待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与上世纪 90 年代的自由主义路向的“休克疗法”相比，2003 年俄罗斯出现了一个逆向的过程，而且几乎跟中国的历史进程并行发生。在我的记忆当中，中国当时至少有两件大事：一件是郎咸平辩论。这场辩论实际上是批评私企利用改革的机会聚敛财富导致国家资产流失。这是关于国资和民营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另一件大事是，2003 年是中国国资委成立的一年。国资委的成立当然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重新组合发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之后出现一大批实力强劲的国有企业，也从此开始了一大批中国国企进入 500 强的行列。而这两个过程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正在于，从 2003 年起中国成为了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这对于建立强大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宏大过程的开始。

新世纪以来，中国和俄国之间不期而遇的相互推动，相互支撑，有着深层的背景。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同时，另一方面还有深层理念上的驱动。很长时期中，这两个国家的改革进程都受到了西方的质疑，不太相信你们真的会改革，也不太在意中俄这两个严格意义上的非西方文明体，在改革过程当中所遭逢的何等艰难困苦。似乎美国人对中国还是寄予较大希望，但对普京的批评则更严厉。其实苏联解体以来，俄国每一届领导开始都是跟西方比较接近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上台的时候都是接近西方。普京上来更不用说了，“9·11”的时候让美国进入中亚，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但是，20 年来的俄罗斯每一届领导都出现了先是与西方关系热络，然后到最后总是与西方闹翻的地步。

到了 2003 年和 2004 年之后，经过与美国的短暂“蜜月”，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于互相质疑。一方面是双边关系本身被美国退出“反导协议”、伊拉克战争、北约欧盟扩张及“颜色革命”等一连串事件所破坏；另一方面，新世纪“黄金十年”中有所得益的俄罗斯出现了一度强劲的增长。一大批跨国企业活跃于国际市场。实际上，这是一个全球化过程。可以看看 2013 年的 Economist 第二期，有一组文章专门讨论“新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这组文章将这类进程称之为“新全球化”。我认为这和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以国家为背景的大型国际企业的重新崛起有关。

《问道》：可是有一个趋势说，跨国公司的兴起是和全球化有关系的，那跨国公司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主权弱化。因为跨国公司在谈

判中占尽优势，包括在区位选择上都是占有优势，即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得主权式微，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冯教授：实际上，这是一个新形态的全球化过程的出现。以前的全球化过程基本上是 Washington Consensus 主导，是以资本、商品、科技、劳务的自由流动为基本的动力，这是西方国家观念形态的主导。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从撒切尔到 80 年里根上台以后，撒切尔夫人卖矿山、卖国铁，liberalization 开始之后，里根接上，更大规模推动西方导向的全球化，推广到拉美，还推广到东欧，然后又推出了一个苏联激进改革，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终结和苏联解体，那当然是跟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过程有关。这个是一个私人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原则，是 deregulation 的过程。

那么，到了那个新世纪的一个新的全球化过程出现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至少，不是只有唯一的 Washington Consensus，还有普京理念，有中国想法，有 new economies 的一个群体的蜂拥而起。而且，动力不光是来自所谓的 State Capitalism，而且里面包含着许多所谓 National Sovereignty 意识的推波助澜。你看这个全球化的内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甚至资源的流向都变了。原来我们接收的是来自西方的资金、投资，现在中国对美国投资超过美国对华投资。中国对非洲投资的一个国家开发银行都已经超过世界银行的投资规模。所以呢，新时期出现的变化，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我刚才讲的以中国和俄国为例，这是从国别角度。而从区域的变化看，也正在出现大变化。从全球层面讲，这个过程带动了整个新经济体的出现，使得全球化过程出现了一种新质。我并不是说，新世纪以后，整个全球化过程都在出现逆转，总归还是有延续性，liberalization 过程并没有中断，但是，一种新质在出现。

《闻道》：冯教授，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周边的概念。现在我们学院在您的领导下也成立了一个周边中心。我们国家跟周边的关系比较复杂，东边有韩国、日本还包括台湾地区，这些地区比较发达；西边有中亚；南边包括新加坡、印度、越南这些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那么，在您看来，从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跟周边应该构建出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形态？或者说我们能够做什么？

冯教授：首先是中国的周边是基于怎么样的一种特质的周边环境，第二个问题，中国应该确立一种怎么样的周边理念和跟周边战略。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呢，我想讲这样几个事情。中国在亚洲，但是现代

国际体制的发源是欧洲，欧洲跟亚洲有基本的区别。欧洲是由民族国家系统所组成，但是亚洲不一样。王庚武先生说过，亚洲历史上是由大大小小的帝国所构成。也就是说欧洲在民族国家经过一个“去巫魅”的过程，他有可能从中世纪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亚洲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这样一个“去巫魅”的过程。帝国的传统深刻影响现代亚洲的发展。有的人经常问欧洲为什么可以出现一个一体化的过程，但是，亚洲就很难完全复制同样的进程。基本的社会历史结构决定了亚洲的多样性、复杂性。再加上地缘政治与经济方面有高山大海的阻隔形成了一个面目多样的亚洲，而不像欧洲那样是一个大的完整版图。所以，这个基本点就决定了亚洲跟欧洲这个区域整合状态是不一样的。包括区域大国所能发挥影响的这个空间背景是不一样的。欧洲法德之间经过一场大战，没过多久又走到了一起。亚洲的大国之间，政治大国之间就远没有这么简单。甚至，当代国家关系进程，我觉得经常会有一个误解，我们往往会把发生在欧洲的国际政治经验扩大化，放大为一种全球的经验。比如说，当我们说冷战终结，我们经常以冷战结束的 1989-1991 年，作为一个跨时代的界限。但是，你用这个时段看欧洲很清晰：东欧激变，苏联解体，改朝换代。但是亚洲就不完全是这样，如果冷战的终结是一个过程，那么 1972 年尼克松一来，中美解冻，实际上，作为过程的冷战终结就开始了。但是，作为过程的“冷战终结”迄今为止仍未终结。亚洲至少还有两个重要国家由于冷战的原因，处于分裂状态，那就是朝鲜半岛尚未统一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冷战状态显然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以一个发生在欧洲的这个背景下的国际事件来简单的套用到亚洲的国际发展序列过程当中来。情况不一样。其实，过程的变化反应的是结构性内容的不同，欧亚之间结构性的本质特征是有重大区别的。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中国是个大国，特别是中国迅速发展以后，举手投足就影响到整个的亚洲，特别是周边地区。如果从一个大历史时段，特别是从冷战后的整个历史时段来看亚洲，可能就便于我们理解中国所处的周边态势。

首先，中国所处周边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山头帮派林立。比欧洲所谓的“均质国家”状态要复杂的多。所以，中国的周边环境或许是大国当中最为险恶的。第二，又由于中国本身特殊的历史过程，它曾经是亚洲文明的中心，这个华夏帝国对周边历史，对亚洲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这

深远影响里面有很多相互交好的回忆，但是也有很多痛苦的经历，而且当我们在构建新的周边关系的时候，历史记忆又会发生巨大作用。所以，这里面产生的困难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个新的叙事系统。因为原来的叙事系统不光与新中国的诞生、与改革后中国的发展有关，而且又在一定程度上与帝国历史，跟我们刚才说的亚洲所处的复杂背景相联系。甚至人们很习惯以此跟一些特定的概念，比如说“朝贡体系”相关联。这些概念都有必要做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新的解释。我们现在要希望构建新型的周边形态，具有新型的周边的关系内容。但是周边的邻居往往又会将此与以往的历史相联系，所以我们创造一个新的叙事过程不是一个很简单过程。我们不能脱离历史，但是我们要超越这个历史。尽管中国也不简单地是一个 nation state，这一点上，我们可能真的是要学习、“研制”出这样一个“去巫魅化”的 the Nation State 这样一个过程和氛围来解决我们这个周边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所谓“世俗化”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全新形式的既自上而下，也自下而上的过程。而且，这又是一个由内而外，同时也反过来，由外而内的过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既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且帝国传统影响深重。所以，我们这个周边建设的挑战还是很尖锐。自己要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和我们的基础上，也即要动员 30 年改革发展的巨大而深厚的积累，以及中国有长远的睦邻友好的这样一个传统，而且，再进一步说我们在海外还有丰富的资源。比如说我在国外的時候，我的华人朋友就跟我說：“改革 30 年来，我们是回到祖国，通过对自己祖国的投资，办厂兴业，来振兴自己的祖国，现在中国要走出去了，我们就是中国走出去的桥梁和中转站，通过我们作为中介，去实现海外的更扎实的更广泛的发展。”这的确是个很好的想法，那么怎么来利用这个资源，首先就是我们要新的理念。不光是大家互利共赢，而且我们要怀有理想。所以，我觉得中国梦不光是发财致富，而是中国人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当然要包含着人民富足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含义，但是，我觉得更多地要体现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里不仅仅是现代西方社会所有的富足、繁荣、进步、文明、平等、民主和自由。我觉得，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如：和谐、共存、多元、宽容、协调、发展，这样一些问题上，中国理应有更大的施展余地。

《闻道》：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有什么想法？

冯教授：对于我们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发展，特别是学科的发展，一直在探讨三个基本方面的问题：

1. 当代国际政治的过程、现象、问题的研究：包括 IPE、International Finance、International Tra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也包括非常实用的，今后同学们参与市场、直接应用于工作的一些实用的知识，我们希望培养既具备理论知识基础又非常贴近现实的研究人才、专业人才以及职业人才。

2. 国别和地区研究：我们要有自己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要形成有自己特点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不知道同学们是否发现，西方人的 Regional Study 和 Country Study 似乎还不是一个非常清晰有着严格学科意义的规范模式。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发现现成的关于国别与地区研究的方式。我们老师的研究积累更多的是两个地区：前苏联地区以及 1997 年以后我跟童世骏老师、范军老师、李宏图老师、余南平老师，包括潘兴明老师等我们引进的老师一起推动的欧洲研究。当时欧亚峰会要举行，我们提供了专门的研究报告，外交部还给了我们表扬信。

还有第三块，即现在的周边问题研究。这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我们工作过的领域。但关键的是国别和区域研究如何进行，研究工作的框架是什么。是不是单单就是介绍国家人口多少，地理面积多少或者哪个政党执政等等就算是国别研究？这是不够的。所以，即使西方还来不及形成一个非常完备的关于国别及地区研究的研究框架，我觉得，中国人应该顶上。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补上这一课。因为，从逻辑上说，这个世界对中国的要求已经摆在这里，你们有条件做得比前人更多、更好。中国人要做贡献，首先要在知识体系上做贡献。多吃点苦，多读点书，多动脑子构建出一套既和世界经验接轨，同时也体现本土立场的规范来。

这个世界变化很大，原来我十多年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AIS 学习的时候，我听了他们国别研究的课：Political Economy in Latin America，这是他们的区域研究框架。Political Economy in Russia，是他们区域研究的课程，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老师们也有许多创造，比如说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张昕老师给你们上过 Comparative Politics，你们可以受到点启发，这是西方成熟的东西。但是，这并没有正面的解决国别研究的问题。它的确提供了很好的角度和知识门类，但却不见得是完美的国别研究的模式。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研究的努力方向。不仅是我们的老师，研究生同学应该一起来

努力。好好地写一篇论文，敲下一块砖，啃下一个角，这也是一种贡献。

3. 国际政治中的理论、历史、思想研究。

我们还是要注重理论、历史，包括国际法、思想史以及政治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大作用。我觉得现在正在出现一个与大国、区域，甚至全球过程出现的新阶段相关的新局面。大体上我认为 90 年代末、新世纪初正在出现的相向而行的两个过程：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开始关注思想和历史研究。为什么关注思想研究？并不是说国际政治原来没有思想，Francis Fukuyama 说的 *The end of history*，也是思想。但是，*The end of history*，终止的不光是历史，而且终止的也是思想。苏联解体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就不需要讨论了。这是抽象的说法。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不需要。另外，90 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行其事的 *Theory of IR*，严格来说这还算不上思想史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战略、谋略。它也有一些关于人、国家、战争的思考，但是我认为它基本上与主流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史脱节。

我在《思想史与国际政治》这本书的序言中讲哈佛的 David Armitage，他写了篇文章 *Fifty years rift*。这篇文章的意思是国际关系学界有一个巨大的抱负，就是要把它构建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但是它恰恰与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与政治理论研究几乎在过去 50 年长时期地脱节。所以，似乎是“国际政治理论无思想”。这话听上去有点极端。

到了新世纪以后，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在中国出现了赵汀阳对“天下体系”的研究，除了葛兆光、赵汀阳，还有复旦大学刚过世的邓正来教授也曾努力推动以中国自主性为背景的学术思想的进程。这已经超越了理论，因为这里有许多与实际过程相关联的精神诉求。而这与我刚才说的大变化是否有关系呢？与 2003 年出现的节点是否相关呢？

另一方面是 Armitage 所提出的，思想史研究、历史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国际转向”。历史研究本身大量出现了跨国史、全球史、比较史。国际政治与历史毫不相干的情况，显然让国际政治更吃亏。离开了正经的历史，国际政治研究本身就会感到不足。所以，现在国际政治的研究并不乐观，甚至一片纷乱。正是因为国际政治脱离了思想和历史。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像我刚才所说，人们的眼光逐渐超越了 *nation state* 的基础，而是关注全球问题。同时，国内与国际、思想与历史开始相互交织，似乎重新回到了 50 年前汉斯·摩根索所在时代的状况。实际上，康德、马克思、休谟、洛克，一直是把政治、经济、思想等与国际政治放在一起而编织成

为一个宏大体系的。

同时，我不认为我们曾经花过很大功夫的 Theory of IR ，就完全应该放弃。毕竟，这是把一个学科进行细分，通过思辨、推理、论证，涉及到许多概念范畴建设的一项大工程。这对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上思维理性化水准的提升是有帮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吸收，不要学僵化的东西，而要从中学学习理性的思维逻辑。中国人习惯大而化之，习惯于简陋的思维，构建学科的思辨性工作做得不够。我们借用美国人的理论，推进我们思维的健全化，这对学科知识的建构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这跟我们学院的建设一样，我们不要简单地否定某一个学问、某一种思路。我们可以做很多转化工作，去芜存菁。我想，已经积累的经验一定会使得我们更善于鉴别，更善于摸索建立我们自己的更好的知识结构框架。

（采访：孙超 吴途勇 蒋霁望 孟舒）

（编辑：华盾 张洪玉 蒋霁望 孟舒）



第一次英日同盟与 20 世纪日本结盟外交的缘起

尤一唯*

【摘要】 “结盟外交”是日本 20 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日本结盟外交的起点是 1902 年的第一次英日同盟。而长期坚持“光辉孤立”政策的英国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盟友，原因在于 20 世纪初英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恶化，另外对德、俄谈判失败之后，英国担心遭到孤立。但相比于英国，第一次英日同盟对于日本的意义更为重大，它使日本成为一个与超级大国英国平起平坐的盟友，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此外，日本通过英日同盟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推行其远东政策——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扩张；可以说从英日同盟之中日本初次尝到了结盟外交的甜头。此次同盟塑造了日后日本外交的心态，二战的惨败是日本放弃结盟外交后最大的教训之一，因此在此后的历史中，做大国坚定不移的盟友成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和出发点。

【关键词】 日本外交；第一次英日同盟；结盟外交

格伦·斯奈德将同盟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国家联合，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明确写入条约中。”^①而斯蒂芬·沃尔特则从相对宽泛的意义上定义同盟，他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②

根据此类对同盟的定义，有学者统计，日本在 20 世纪以来的 70% 的时间内都与当时世界的顶级大国保持了一定的同盟关系。^③“结盟外交”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生。

① 参见 Snyder, Glenn H,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1(1990), pp.103-123.

② 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 年第 5 期，第 16 页。

③ 张景全：“20 世纪日本对外结盟初探”，《世界经济与政治》，北京，2004 年第 12 期，第 14-20 页。

可谓是日本近代外交政策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日本对结盟的偏好与欧亚大陆西端的另一地理条件相类似的岛国——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于欧洲大陆，英国长期采用“均势外交”战略，在战时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他们联合起来，打败或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①对欧陆保持相对的超脱；同时英国在和平时期一般不与他国保持结盟关系，英国的原则就是“决不在多少还不确定的未来承诺任何事情，而是等待事件发生时再决定采取什么方针。”^②

然而在 20 世纪初，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这两个岛国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结盟外交的道路，两国的命运交织于 1902 年的第一次英日同盟。通过英日同盟的缔结，日本迅速地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崛起，挤压了英、俄在当地的势力。而英国由英日同盟缔结起逐渐改变了“光辉孤立”的外交政策，开始将“结盟”作为一种和平时期的外交政策加以运用。

两个岛国不约而同地在 20 世纪初选择结盟外交，其原因何在？一国之所以选择同盟的动机十分复杂，既有出于客观因素从国际格局、地缘战略矛盾、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也有出于主观因素如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国内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识以及个人情感因素等原因的考虑。本文主要从日本的角度出发，试图对这一有意思的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并就这一历史事件对日本日后外交行为的塑造进行简要分析。

一、“英日同盟”相关研究概述

英日同盟作为 20 世纪初影响东亚乃至世界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同盟前因后果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英日同盟早在二战前就引起了英美、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③但限于“当代史”研究的局限，战

①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64 页。

② [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出版，1987 年，第 73 页。

③ 二战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有：Jonathan P. Dolliver, Significance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74, No. 546 (May, 1902), pp. 594-605; A. L. P. Dennis,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Vol.1, No.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23; Chang, Chung-Fu,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No.12*. Johns Hopkins Press, 1931; Charles Nelson Spinks, The Back ground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8.3 (1939): 317-339; 有贺长雄：《最近三十年外交史》，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10 年；田保桥洁：《明治外交史》，东京：岩波书店，1934 年；渡边几治郎：《日本近世外交史》，东京：千仓书房，1938 年；京口元吉：《日本外交史话》，东京：朝日新闻社，1943 年。

前的研究者难以广泛地接触到第一手资料，战前的相关研究虽不乏洞见，其分析往往猜测多于实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英国政府相关档案“五十年保密期”已满，20世纪初期英国的内阁、外交档案纷纷解密，基于第一手材料的研究成为可能。在英国，大量涉及英日同盟以及二十世纪初英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①英国学者侧重于研究英日同盟与“光辉孤立”外交的联系，其中针对传统观点——英日同盟意味着“光辉孤立”的终结；有英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伊恩·H·尼什的研究最为突出，他批驳了英日同盟标志着英国放弃“光辉孤立”的观点，认为英日同盟只是一个局部的同盟，“英国并未就此放弃孤立政策”；罗威也认为同盟仅限于远东一隅，并不意味着放弃孤立的外交政策；英国历史学家 A·J·P·泰勒甚至干脆认为英日同盟的缔结是英国为了拉拢德国而做出的举动。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日本外交文书》^②中有关英日同盟的部分在二战后的50年代得到了解密。^③1955年，日本将涉及英日同盟详细谈判过程的第33、34卷出版。^④与此同时，1953年日本外务省将小村寿太郎^⑤写给日本政府的有关英日同盟谈判的报告以及个人陈述整理后编纂成《小村外交史》^⑥一书并编辑出版。日本学者也基于此类档案材料对英日同盟做了大量研究，^⑦日本学者不同于英国学者之处在于他们详细分析了日本政府

① 基于英国内阁、外交部档案的研究主要有：George Monger, *The end of isolation*, London: Nelson 1963; John.A.S.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4; Ian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 1894-1907*,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6; C.J.Low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London: Routledge, 1967; Christopher.H.D.Howard, *Splendid Isolation: A Study of Ideas Concerning Britain'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and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Later Years of the Third Marquis Of Salisbury*, London: Macmillan, 1967; A.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195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hillips O' Briened,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1922*, London: Routledge, 2003.

② 日语中“文书”一词意为“档案”。本文中所有涉及《日本外交文书》的内容参考日本外务省网站所公布的外交文书数字化档案：<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archives/mokuji.html>，2014年2月21日查阅。

③ 虽然在二战前已经出版了其前九卷和涉及日本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谈判的内容，但其内容仅涵盖明治时代早期（到1876年为止）的外交档案。

④ 参考日本外务省网站，外交史料馆，“年度别刊行实绩一览”，<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bunsho/index.html>，2014年3月19日查阅。

⑤ 在英日同盟谈判过程中担任日本外务大臣。

⑥ 日本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东京：新闻月鉴出版社，1953年。

⑦ 日本方面的主要研究有：黑羽茂：《日英同盟的研究》，山形：东北教育图书，1968年；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6-9卷，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

内部对于“英日同盟”与“日俄协商”两条外交路线之间的分歧以及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①

在中国,最早对英日同盟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曾留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远东国际关系的张忠绂,他以《英日同盟》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而后该论文通过新月出版社在上海出版成《英日同盟》^②一书,堪称当时研究英日同盟的佳作。此外,《大公报》的主编王芸生曾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后编辑出版为《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③一书,书中第四卷、第五卷简要涉及英日同盟的成立、谈判过程。

列宁曾经如此评价英日同盟:“英日同盟的缔结,准备了日本对俄国的战争。”^④受此影响,中国学者在此后的研究中倾向于将同盟缔结的原因归结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导致矛盾激化而相互勾结共同宰割中国。^⑤虽然此种分析不乏合理之处,但此类相关研究多根据二手的材料写成,很少涉及第一手资料、档案。但是近来也有不少详细利用日本、英国外交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对英日同盟进行一番详细考察的著作。^⑥此类研究多侧重于对历史的描述,但也有试图对日本结盟外交特征进行一定概括的研究。^⑦

印书馆,1980年;黑羽茂:《日英同盟的轨迹:帝国外交的骨髓》,东京:文化书房博文社,1987年;平间洋一:《日英同盟》,东京:学艺出版社,2000年;藤井信行:《日英同盟协议交涉与英国外交政策》,横浜:春风社,2006年。

① 例如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黑羽茂:《日英同盟的轨迹:帝国外交的骨髓》。

② 张忠绂:《英日同盟》,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

③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④ 见《列宁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⑤ 例如:周启乾:“第一次英日同盟与日俄战争”,《历史教学》,1983年第04期,第24-27页;陈德海:“英国的‘光辉孤立’政策与《英日同盟》的缔结”,《外交学院学报》,1992年02期,第92-97页;王明星:“第一次英日同盟的缘起与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05期,第47-50页;叶艳华:“试析日英同盟成立的历史背景”,《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14卷第2期,第93-97页。

⑥ 例如: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三章第三节“俄国占领东北与第一次日英同盟的形成”;曹中屏:《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东西方文化的撞击:1500-1923年》,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八章第一节“第一次英日同盟的成立”;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策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三章第二节“日英同盟与对俄战争”,第162-183页。

⑦ 但也有涉及历史事件与日本外交关系的著作,例如李广民:《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张景全:《日本对外结盟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

二、日本结盟外交的心理根源

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将心理学的微观层面分析引入了国际关系学领域，他指出：“最容易影响知觉倾向的因素正是这样的国内行为方式，也就是深深根植于全社会的行为方式，除此之外，人们根本想不到可能存在什么别的行为方式。在同质化程度很高的岛国社会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①这种倾向在日本表现如下：

首先，由于日本自然资源稀缺，多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导致了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对于外部世界的细微变化极为敏感，并使得日本总是处于不安全感之中。在自我不安面前，日本人常靠依附一个强大的集体以减轻这种不安全感。因此，“国际舞台上谁独占鳌头，日本就会出于保护自我利益而跟谁结盟：1902年到1922年追随英国，1936年到1945年追随德国，1952年起则紧跟美国。”^②

此外，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度大，导致生存空间的逼仄，因此养成了极度体谅别人，同时也需要高度自制的民族品性，学者认为：“无疑日本人比绝大多数西方人更具有集体倾向，而且在互助式的团体生活中形成了这方面的高超技艺。”^③

温特指出，“自我约束推动建立安全共同体，减少国家在把照顾自己的部分责任交托给他者时产生的担心”，“自我约束在群体之间竞争中有利于选择利他主义者。”^④这种自我约束和集体倾向使日本容易成为一个最忠诚的盟友，但这种倾向也使得日本人的个体相对缺乏独立的精神，因此在缺乏与盟友一致的目标以及盟友约束情况下，日本往往不善于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而是陷入民族主义的“集体狂热”之中。1922-1940年是日本二十世纪唯一持续时间较长的相对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时代，但恰恰就是在此时，日本逐渐将自身拖入了侵略中国的轨道之中从而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

①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94-295页。

② [美]罗伯特·A·帕特斯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9页。

③ 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and Marius B. Jansened, *The Japanese today: Change and continuity*, London: Belknap Press, 1995, pp.138-139.

④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0页。

以上的种种民族特性形成了日本外交政策灵活的现实主义、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相对缺乏理性以及对国际规则建构的消极态度等特征。以上特征使得日本更倾向于通过结盟的形式而非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来达成自身的目标。

三、第一次英日同盟缔结的国际背景

在 19 世纪，英国通过长期的海外扩张占据了广大的殖民地，构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日不落帝国”。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光芒渐渐黯淡。大英帝国的衰落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虽然 1880 年英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仍然占有 22.9% 的比例，但到 1913 年已减到 13.6%；1880 年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为 23.2%，而在 1911-1913 年却只占 14.1%。^①

其次，表现为其他“中等强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列强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新一轮竞争。德国在统一后迅速崛起，在威廉二世时代采取“世界政策”，意欲夺取“阳光下的地盘”；而美国在 20 世纪初不仅在工业产值上超过英国，还意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过美西战争夺取加勒比海地区霸权并涉足太平洋即是其挑战英国的表现。

法、俄同盟与英国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法国在埃及、摩洛哥、暹罗、非洲地区与英国激烈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俄国向近东、波斯和阿富汗、中亚以及西藏地区全面扩张，威胁英属印度边境，同时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加紧在中国的扩张，意图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地位。英俄之间的“大博弈”被世人视为下一场世界大战的预演。^②

1899 年 10 月爆发的布尔战争更是加剧了英国此种困境。英国取得了“皮洛士式胜利”，元气大伤，尼尔·弗格森认为：“布尔战役之于大英帝国，就好像越南战争之于美国一样，是挥之不去的痛，此次战役有 4.5 万人牺牲，花费了 25 万英镑；它导致了英国本土舆论两极对立。”^③

为了解决此种困境，维护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当时英国主要外交选择有两种，一种是与德国在全球范围内结盟，不仅可以在东亚、非洲等殖

①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上，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第 237-238 页。

② 有关英俄“大博弈”的历史参见：D. Fromkin (1980), *The great game in Asia*, *Foreign Affairs*, pp. 936-951.

③ [英]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年，第 235 页。

民地上获得来自德国的支持，还可以在欧陆牵制法、俄；另一种是与法、俄同盟直接谈判，达成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妥协，为自身提供更多的外交空间。但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英国逐渐放弃长期坚持的“光辉孤立”政策，此后英日同盟的缔结可以说是以上两种政策暂未奏效后临时的替代之举。

反观当时的日本，在 20 世纪初，日本并非一个与欧陆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性大国，因此关注的重点主要是远东及其周边地区，日本尤其担忧的是俄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虽然日本在明治时代初期，就树立了“开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①的狂妄目标。但基于地缘以及日本本土安全的考虑，日本最关心以及首要的扩张目标是朝鲜半岛。

日本的对马岛(Tsushima Island)距离朝鲜半岛最近处仅有 49.5 千米，与英国距离欧陆最近的多佛海峡距离(34 千米)相当。^②若朝鲜半岛落入他国手中，日本群岛便将处于直接威胁之下，因此日本将朝鲜半岛视为维系日本本土安全生命线所在。当时日本外交政策中一条首要原则就是，为保证日本群岛的安全，不能让朝鲜落入第三国之手。朝鲜半岛被喻为是“插向日本心脏的一把匕首”^③。

但在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缔结中俄密约，设立中俄银行，铺设东清铁路，租借旅大，最后更是利用义和团事件占领满洲，将其锋芒直指韩国。”^④尤其是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临近竣工使得日本政府产生了防备俄国的紧迫感，“吾人不可忘记，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便是朝鲜多事之时，也是远东发生剧变之时。”^⑤

1895 年 4 月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可谓是俄国抑制日本在大陆扩张的一大胜利，三国干涉还辽时“日虽对英乞援，英国亦不之助”。^⑥日本意识到自身的势单力孤，单独依靠战场上的胜利而缺乏外交上盟友的支持，不足以实现本国的扩张目标。此后，俄国更是希望进一步将日本从朝鲜半岛上排挤出去，让日本彻底退出欧亚大陆。

①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 1 卷，第 228 页。

② 相关数据参考：<http://ja.wikipedia.org/wiki/%E5%AF%BE%E9%A6%AC>；<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2%A4%E3%82%AE%E3%83%AA%E3%82%B9%E6%B5%B7%E5%B3%A1>，2014 年 3 月 22 日查阅。

③ [美]罗伯特·A·帕特斯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74 页。

④ 日本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东京：新闻月鉴出版社，1953 年，第 251 页。

⑤ 山县有朋：《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 年，第 197 页。

⑥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4 卷，第 112 页。

日本政府认为相比于满洲，朝鲜半岛对于日本的意义更大。此外日本也希望将扩张目标转向中国南部，尤其是靠近台湾的福建省。小村曾说，“在瓜分中国和划定势力范围时，日本坚持在南部中国的优势地位大概不难得到俄国的支持”^①。因此，日本政府希望以日本不介入满洲为条件换取俄国退出朝鲜。

1898年3月19日，西德二郎外相通知罗森公使“如果俄国把朝鲜交给日本，日本则可以承认满洲及其沿岸不属于日本利害关系范围之内。”^②这就是所谓的“满韩交换”政策。但是，从1895年4月起，俄国就对日本采取了一种势不两立的态势，并决定把它坚持到底，决不让日本登上大陆。^③

俄国的不妥协的态度使得两国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因此“满韩交换”政策的失败使得日本不得已地走上了寻求盟友的道路，而在当时法俄结盟的条件下唯一可寻求的大国盟友只有英、德两国。

四、远东“满洲危机”中的列强

十九世纪末期，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焦点逐渐聚集到远东地区，国际矛盾在远东的具体表现便是俄国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后所引发的“满洲危机”。英国远东政策的目标是“确保整个中国对外国贸易开放，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这一贸易。”^④为防止各国利用义和团运动之机在中国乘机扩张势力范围改变原有的在华格局，英国认为有必要缔结一项协约来规制各国行为。

英国的此种倡议首先得到了德国的支持，1900年10月16日英德签订了《扬子江协定》，表明英德两国反对任何国家在中国现有领土上进行扩张的行为，并规定在两国力所能及的地区保证“门户开放”的态度^⑤。

此后英国还牵头呼吁其他国家特别是俄、日加入《扬子江协定》。英国希望以此在中国问题上以大国协调牵制任何国家借义和团运动之机在

①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第699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301页。

③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陶文钊、李金秋、姚宝珠译，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1980年，第131页。

④ [英]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刘存宽、张俊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页。

⑤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第52页。

中国扩大势力的行动。10月23日英国就日本加盟一事询问日本，在英德对日本的加入都无异议，日本遂于同月29日正式发表宣言加入该协定。^①

早在1900年7月，俄国便借口义和团对中东铁路的破坏占领东北全境。俄国陆军大臣库洛帕特金告诉维特伯爵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②。”^③于是俄国明言自己不会加入该协定，因为协定中的对华政策不符合俄国的利益。^④

俄国利用义和团运动之机确立俄国在华的优势地位的野心在此暴露无遗，因此俄国显然对这样一项维护旧有格局的协约毫无兴趣。同年11月11日，俄国更是强迫盛京将军增祺草签了军事暂定条例——《旅顺协定》，俄国的举动引起了列强的关注和恐慌。

日本从这场危机之中看到了利用列强在华矛盾寻求盟友的契机，日本政府得知英国对旅顺协定的负面看法后立即命令日本驻英公使林董援引《扬子江协定》来试探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是否可以一起在满洲问题上采取反俄立场，但英国回应暂时只会对旅顺协定采取旁观的态度。^⑤不过英国同意与日本一起对清政府施压，让清政府拒绝批准《旅顺协定》，同时英国还希望拉拢德国参加对清政府施压。^⑥

但英国在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上有明确的底线，也就是英国绝对不会迁就日本而采取反俄政策。就在此时，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会见即将回国述职的驻日公使窦那乐时，就曾试探英国是否可以和日本一道在清政府遭受俄国入侵时给予其援助。窦那乐明确告知日本外相，“英国不会为了保全清帝国的完整而选择与俄国对抗。”^⑦

实际上，英国并不信任日本的实力。因为英国认为“日本的实力对内自守有余，但英国不相信日本有对外派出同盟军转战大陆，向新加坡以外的海洋派遣舰队的力量。而没有这种力量，日英同盟就是没有意义的。”^⑧日本还试图试探德国的态度，而德国明确告知日本，德国在满洲问题上持

①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第69页。

② 布哈拉原为中亚地区的一个汗国，1868年沦为俄国的附庸。

③ [俄]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肖洋、柳思思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④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第73页。

⑤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04页。

⑥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06页。

⑦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78页。

⑧ 渡边几治郎：《日本近世外交史》，东京：千仓书房，1938年，第315页。

中立立场，但在俄日发生冲突时会对日本持善意中立立场。^①日本利用“满洲危机”试图拉拢英德的举动在此进展得并不顺利。

但“满洲危机”持续发酵给日本再次带来了机会。1901年2月19日，俄国公布了新的中俄协约草案，扩大了俄国在满洲的特权。^②清政府拒绝了该条约，并将内容暗中透露给了列强。1901年1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公布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并说“约文所说俄国驻扎奉天省专员（总管）所拥有的权限，与俄国驻扎布哈拉、英国驻扎印度土司辖境官员的权限相等。”^③此消息一出便引起列强的哗然，再次引发了4月的满洲危机。此外，俄国更是进一步声明，在八国联军从北京撤军并且重建清帝国中央政府之前都会驻留满洲。对于俄国而言，若联军从北京撤退后，唯一有能力在清帝国内大规模驻军的只有与中国陆上毗邻的俄国一家，如此一来俄国要独占满洲就会变得易如反掌。

俄国咄咄逼人的态度不得不使英国更加重视日本的作用，因此在3月1日兰斯多恩要求与林董进行会谈并就满洲问题交换意见^④，兰斯多恩表明了英国当时的担忧。兰斯多恩还在3月4日要求俄国说明新协定的意图，对俄进行公开质问。^⑤

但这并不代表英国此时会转向日本而对抗俄国，相比日本，英国更重视德国的态度，英国试探德国是否愿意将《扬子江协定》适用的范围扩大至满洲。但德国对俄国向清政府提出的新协定丝毫不关心。此外，英国还关注德国会对日俄冲突持何种善意中立立场，询问德国是否愿意在战争爆发时动员海军威慑法国的舰队，阻止法国对远东地区的增援；并建议与德国一道签订一项有关在日俄之间爆发战争时英德共同维持中立局面的协定，但德国婉拒了英国的建议。^⑥

3月15日，德意志帝国宰相比洛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声称满洲并非德国重要的利害所在，之前签订的英德协定并不适用于该地区。^⑦德国的“亚洲地图……是画在欧洲的。”^⑧比洛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向英国建议“两

①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88页。

②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91页。

③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04页。

④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78页。

⑤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91页。

⑥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12页。

⑦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26-227页。

⑧ 见《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441页。

国缔结一个针对俄法协约的全面同盟。”^①如此一来《扬子江协定》就成了一纸空文，“德国在满洲问题上的不合作，使得英国和日本的希望化为了泡影。”^②此时德国对英俄矛盾激化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一方面有利于逼迫英国与自身结盟；另一方面隔岸观火，有利于德国乘机在全球拓展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3月17日俄国将清政府答复新协约的最后期限定为26日。^③同月19日林董向兰斯多恩提议，由英日共同再次施压让清政府拒绝俄国的提案^④。清政府在4月2日拒绝了俄国缔结新协约的要求。^⑤俄国虽然表示不会再提出新的协定，终止了对清政府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但俄国此时并不表明态度，暗中等待时机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正是由于俄国对满洲问题上与列强的不妥协态度，使得日本得以借英俄关系的恶化之机来拉近英日关系。

五、英日谈判的开启与英国对俄交涉的失败

4月9日德国驻英公使对林董表示，可以考虑缔结一个远东范围内的“日英德三国同盟”。^⑥成立一个德国在内的同盟可以多少打消英国对日本实力的怀疑。于是林董在4月17日将德国方面的建议告知了兰斯多恩并打听英日缔结一项协定的可能。兰斯多恩回复说，“反对单独签订一项英日协定，但若有德国参加可以考虑。”^⑦但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否决了“日英德三国同盟”，他不愿与德国结盟。索尔兹伯里更多从欧洲外交角度考虑中国问题，认为在远东问题上与德国的接近会将英国逐渐拉入德奥意三国同盟，让英国对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负有援助义务，这与英国的利益是不相符的。

此时日本国内政局的不稳影响了此后的英日谈判，5月10日伊藤博文内阁因为财政危机垮台，经过短命的西园寺公望内阁后，6月初建立了以桂太郎为首相的内阁。英日同盟的谈判因此而延搁两个月。此外，1901年

① Lord Newton: *Lord Lansdowne: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1929, p.199.

② 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6卷,第58页。

③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33-234页。

④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77-279页。

⑤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34页。

⑥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页。

⑦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8页。

夏天的财政危机促使日本政府必须寻求 5800 万日元的外国贷款。英国正处于布尔战争之中，财政上难以提供这笔贷款。因此有传闻称日本将在巴黎举债，然后倒向法俄同盟。法国外长德尔卡塞此时给日本人放了一个钓饵“如果他们能同俄国人把问题解决，法国准备给一笔贷款。”^①

若此时英国不鼓励日本，把日本看做她的朋友和针对俄、法的潜在同盟者，就可能迫使日本采取下策同俄国达成某种协议。为阻止法俄同盟对日本的拉拢，英国外交部亚洲事务次长伯蒂提议按票面价值购买日本拥有的五百万英镑庚子赔款证券和在日本反对外国占领朝鲜时给以海军支援。^②

此后英国不得不以更积极的态度重启谈判，7月10日，兰斯多恩与林董举行第二次会谈，在此次会谈中，英方第一次表示了与日本订立条约的意愿，英方就满洲问题提议为了对抗俄国再次对清政府提出新协定，“是否可由英日之间达成不反俄，但是可以避免俄国吞并满洲的某种协定。”^③ 可是不久以后兰斯多恩又反悔了，说“这只是出于一时兴起，缺乏深刻的考虑。”^④

为何兰斯多恩会出现此种反复的态度。实际上兰斯多恩在与林董再次谈判前数月，一直在试图与俄国寻求对话。兰斯多恩此时希望就俄国从满洲撤军一事与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尔夫谈判，英国表示，只要俄国不入侵中国，英国不会对俄国采取敌对行动，但俄国拒绝与英国对话。因此兰斯多恩不得不收回之前的反复态度，再次对日本提出缔约要求。

7月31日，兰斯多恩与林董举行会谈。兰斯多恩说为了保障英日两国在清帝国的共同利益，英国希望达成一项日英永久协议。当兰斯多恩得知日本可能就朝鲜问题而与俄开战时他表示：英国也害怕俄国独占朝鲜，但保证清国和朝鲜的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是英国的基本政策。对此，林董回答道，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只停留在间接利益层面，但是朝鲜对于日本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希望防止俄国独占满洲进而威胁朝鲜。^⑤

八月，日本首相桂太郎公布了其内阁大政方针：1、在巩固财力的基础上发展工商业；2、扩充海军军备至八万吨；3、因难以独力维护远东大

① [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第447页。

② Nish, p.138.

③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80页。

④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83页。

⑤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5-26页。

局，抓住时机与英国缔结某种协定；4、将韩国置于日本保护之下。^①日本政府正式将与英国结盟列为政府目标之一，并积极推动谈判。

8月14日，兰斯多恩与林董再次会谈，兰斯多恩坦言英国与日本协商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此外别无他意。而与英国相比日本在远东地区涉及的利害问题更多，因此英国希望由日本先提出迫切要求的条款。^②

此后会谈进入了两个月的空白期，因为各国政府和外交家都投入了义和团战争后善后条约的谈判之中。日本新任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被任命为全权公使在北京处理条约事宜，一直未能正式赴任外交大臣，小村要求林董在自己回国后再处理此问题，林董此时得不到外相的授权。直到10月8日《辛丑条约》缔结后，小村才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到本问题（英日同盟）上”^③，林董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授权重启谈判。

10月16日，林董提出了日本方面的条约方案：一、两国共同维护日本在韩国的利益，不允许他国损害；二、两国维护清帝国的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三、合约一方与第三国交战时另一方保持中立，但若有第四国参战则由双方共同应对；四、不允许与他国单独缔约；五、暂不考虑德国加盟此协约。兰斯多恩同意以上五点，并表示会将内容向索尔兹伯里首相传达。林董又在这五点要求基础上另加了补充说明，六、对日本而言满洲问题是相对次要的问题；七、日本最迫切关心的是朝鲜，因此将俄国势力驱逐出朝鲜是日本事关生死的问题，请英国政府务必认真考虑；八、希望英国帮助确保日本在朝鲜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九、日英之间的同盟并非攻守同盟；十、作为英国对朝鲜保证的交换，将条约范围扩大至暹罗也可以；十一、日本希望缔结两国海军合作协定。英国约定将于三周后的11月6日对日本的草案进行答复。^④

日本在会谈中最关心的是朝鲜问题，日本希望借英国之手保住在朝鲜的势力。但就连日本这个条件不多的方案，英国也并未认真加以考虑，在回复日本之前的三周内，英国内阁并没有认真讨论这个草案，而是仍在紧锣密鼓地与俄重启谈判，将英日同盟抛在一边，希望与俄国达成直接的交易。很显然英国仍不相信日本在远东的实力，在德国不愿意施以援手的情

① 德富苏峰：《公爵桂太郎传》，东京：原书房，1967年，第995页。

②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2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东京：新闻月鉴出版社，1953年，第260页。

④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7页。

况下，与俄直接谈判也许是更优的选择。

此时恰逢阿富汗酋长去世，由于担心俄国单独干涉阿富汗继承问题。兰斯多恩借此机会与俄国驻英大使就此问题进行了非正式会谈，同时还就俄国对满洲问题的看法提出了反对意见。直至日本提出草案九天后的 25 日，兰斯多恩才将日英协约的草案以及与林董会谈的记录和备忘录交给索尔兹伯里。虽然索尔兹伯里首肯了对日同盟草案，但还是将日英协约暂时抛在一边，在 10 月 28 日内阁会议中，同意继续就波斯和中国问题与俄国直接交涉等待俄国的态度。^①

兰斯多恩接受此命令，于 29 日与俄国驻英大使进行了会谈，并告知了英国希望与俄国直接对话的意图，此外还提出了英俄共同向波斯借款表达了与俄国共同瓜分波斯的想法，还表达了英国与俄国共同解决满洲问题的意向。但是俄国对于英国政府的建议一概拒绝，俄方回复说俄国在和清政府正式订约前不会向英国透露任何有关条约的内容，并拒绝对波斯共同借款的建议。^②同月 31 日，俄国再次要求清政府赔偿俄国在满洲铁路的损失，^③并且单独与波斯政府签订了借款协议。俄国人丝毫不想收敛一点他们的野心：除了控制北中国之外，又增加了一条要求——在波斯湾占有一个港口。^④

11 月 5 日兰斯多恩无奈地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俄国交涉的失败，提出了对日协约草案，大多数阁僚表示赞同，协约草案得到了通过。^⑤英国从此迫不得已地转向日本，开始认真地讨论英日协约草案。

六、英日同盟的最终谈判

1901 年 11 月 6 日，兰斯多恩答复了日本的草案，并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英日协约草案。^⑥英国方案与日本方案大体相同，但英国对日本在韩国的自由行动有所保留，因此林董认为应加入更多有关韩国的条款，同时提

① John.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4, p.402.

② C. J. Low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London: Routledge, 1967, p.132.

③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 34 卷，第 420 页。

④ [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446-447 页。

⑤ George Monger, *The end of isolation*, London: Nelson, 1963, p.57.

⑥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 34 卷，第 39-40 页。

议同盟期限应为五年。^①两国之间对于协约的看法可以说已十分相近，唯一存在分歧之处仅在于朝鲜问题，英国不希望自己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承担责任。

此时伊藤博文访俄一事影响了英日谈判的走向。在甲午战后日本国内反俄情绪高涨，日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卧薪尝胆对俄复仇的声音。但是日本政府内部仍有要求与俄国直接谈判的“俄国派”，持此观点的主要有元老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他们都出身于长州藩，在幕府末期英国曾经带头封锁对马海峡并炮轰下关，年轻的伊藤和井上都亲历此事，因此他们对英国抱着本能的不信任感，伊藤博文说：“英国政府只图一己之利，不顾其他，与之联合，效果甚微。”^②

就在英日紧张谈判的最后阶段，11月4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抵达美国接受了耶鲁大学的名誉学位，并在返回日本程途中抵达巴黎，计划作为特使访问俄国。伊藤要求日本政府和自己在俄国谈判之前暂缓与英国的谈判。^③但是日本政府拒绝了伊藤的要求^④，伊藤因此不得不承认与英国谈判的优先地位。^⑤

伊藤于11月25日抵达俄国与维特伯爵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展开谈判。27日，伊藤接到桂太郎首相的电报，进一步指示对俄谈判，仅限于交换双方意见。^⑥12月3日，林董甚至不打电报而让英国公使馆的书记松井亲自带着英日同盟修正案文本千里迢迢赶到圣彼得堡将其亲手交给伊藤博文^⑦，以便让伊藤及时了解英日谈判的进展。由于俄国坚持“我们取得满洲，完全归我们，我们给你们朝鲜，但不全归你们”^⑧的立场，因此俄国放弃了最后一个与日本以及英国妥协的机会。伊藤博文逐渐抛弃了自己对英国的厌恶，表达了自己对日本政府方案的支持。12月6日伊藤博文致电桂太郎，表明他并不反对英日同盟，而主张英日建立更直接的攻守同盟。^⑨

在统一了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后，11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

①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42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322页。

③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04页。

④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50页。

⑤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05页。

⑥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54页。

⑦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15-116页。

⑧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陶文钊、李金秋、姚宝珠译，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1980年，第288-289页。

⑨ 见《小村外交史》，第282页。

对英草案的修正方案。^①12月7日，外相小村寿太郎向日本政府内部有最终决定权的元老会议提交了《日英同盟意见书》，他分析了英日同盟和日俄协商的利弊得失，认为英日同盟的受益要大于日俄协商。^②小村还认为“英国之势已过全盛时代，多少已呈现衰退之观。”^③因此应该将条约的期限尽量缩短。12月9日，明治天皇批准了英日同盟。12月11日最终修正案在元老议会通过后，日本政府立即下令林董与英国敲定最后的谈判。^④

12月12日，兰斯多恩与林董会谈，林董正式递交了日本的最终修正案。由于担心英国方面对于伊藤博文访问俄国动机的怀疑，日本稍微降低了自身的价码，尤其是在韩国问题上的要价，不再要求英国支持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仅要求英国不干预对于日本在韩国的自由行动。此外，日本方案与兰斯多恩草案最大不同之处便在于将协定范围明确地限定于远东地区，并希望在远东地区得到英国海军的援助。^⑤

19日召开的英国内阁会议讨论中，条约中有关韩国的款项遭到了内阁多数的反对。^⑥内阁会议结束后兰斯多恩再次与林董举行会谈，表达了英国政府对日本修正案的疑虑，因为在韩国问题上，日本和俄国的矛盾可以说是无法调和的，英国担心日俄之间会因朝鲜而开战，将英国拉入一场对俄法同盟的战争。^⑦

英国于次日进入了一周的圣诞休假。兰斯多恩约定与林董在休假结束的次日，即12月31日与林董继续谈判。此时伊藤博文适时访问俄国归来特意途径伦敦多少推动了谈判的进展。伊藤博文与兰斯多恩在1月2日与6日两度举行会谈，伊藤博文向英国外交大臣如此解释道，日本只是希望在政治上扩大在韩国的势力，为达成此目的，需要与俄国协商，这是自己此行的目的。因此日本并不希望与俄国结盟，此行访问与缔结英日条约也没有矛盾。^⑧伊藤还表示日本也与英国一样并不希望与俄国开启战端，伊藤博文与兰斯多恩的会面可以说为英日之间消除了最后的隔阂。

此后二十多天，双方就条约的细节进行了多次磋商，双方分歧的焦点

①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61页。

②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66-69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东京：原书房，1986年，第203页。

④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75页。

⑤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70-75页。

⑥ Nish, p.208.

⑦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86页。

⑧ 伊藤博文与兰斯多恩会谈的详情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37-142页。

仍在于有关韩国的条款，索尔兹伯里希望淡化其中表现日本独占韩国的词语，否则难以获得内阁的支持。同时要求更改部分用语的修辞，以减少条约所引发的敌意^①。1月24日，英国部分考虑了日本的想法，对修正案进行了些许语句、修辞上的修改后得到通过；日本政府也在26日接受了最终条约文本。^②

在1月30日，英日两国由日本驻英国公使林董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正式缔结《英日协定及附属的外交文书》，条约内容包括公开协约和秘密海军合作协议，协约正文共有六条，主要内容有：一、相互承认并尊重、维护两国各自在清帝国、大韩帝国的权益，并保证以上两国的独立及主权完整；二、若英国或日本国，为保护上述利益而致与他国开战时，则他方应严守中立，并努力防止其他国家参加战事；三、当另一国或数国参加对于该同盟战争时，则他一缔约国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媾和时亦须相互同意，然后实行。如有第四国或更多国家帮助交战对方时，缔约国一方应协助同盟国作战，禁止单方面苟合。三、条约的有效期为五年。^③

此外两国政府还签订了秘密的《海军合作协议》，规定“日英双方海军在平时尽可能合作行动，一方为另一方的军舰提供港口、加煤等便利，同时在远东维持超过第三国的海军优势。”^④

为了打消法俄同盟对英日行为的疑虑，防止法俄两国的猜疑，日本坚持要求将条约全部公开。在涉及条约公布的问题上，虽然英国认为“此类协定此前从未有过公开发布的先例。”但小村认为此类协定之所以不公开是因为大多数同盟有其特定针对的国家，而本同盟的目的却与此相反……若不公开发布，必然会就同盟的目的和使用范围产生不利的谣言，从而对两同盟国不利。因而希望英国政府同意公开发表。^⑤最终英国同意了日本的要求，除了秘密海军合作协议外，2月11日，条约全文的内容在伦敦和东京同时公布。

由于英日同盟条约的防御性、维持现状的特征以及其条约用语的考究和谨慎，使得法俄同盟对此条文并无太大的异议。俄法两国在对英日同盟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俄法两国对此约十分满意，因其对俄法两国政府曾

①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6页。

②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2页。

③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6-17页。

④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东京：原书房，1986年，第203-204页。

⑤ 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6卷，第105页。

经迭次声明至今犹为变更之作为政策基础的各种原则，予以确认。”法俄同盟对英日同盟仅做了部分保留意见：“惟不得不预为考虑，将来或因第三国之侵略行动，或因中国发生扰乱，致该国之保全及自由发展陷于不安，因使两国特殊利益有受侵害之事，两同盟国政府应保留会商采取保护利益之手段之权。”^①由此看来，英日同盟不仅是英日两国联合对俄国的一个警告同时也为两国与法俄同盟之间重启谈判留出了空间。

在英日同盟的谈判之中，相比英国的态度，日本对谈判显得更为积极。实际上英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外交政策自始至终都避免激化与俄国矛盾，并将对俄谈判放在头等地位考量，对涉及俄国的问题都小心翼翼，多次因担心俄国有过激反应而拒绝日本抛来的绣球。毕竟英日同盟涉及的利害仅限于远东地区，而英国涉及与俄国的利害则是全球性的，特别是在英德结盟失败、英德矛盾激化、陷入全球对抗的情况下，英俄谈判防止德俄结盟的意义对于英国更为重大。而且英国始终反对与日本缔结一项明确反俄的条约，甚至从条约文本上来看第一次英日同盟甚至根本算不上一项对俄的军事同盟条约。即使在英日同盟缔结后乃至日俄战后，英国仍不放弃对俄国的示好，英国只限于与日本进行有限的海军合作而反对与日本任何的陆军合作都是为了避免与俄国彻底分裂。

对于这一点，日本能较好地将自己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诉求与英国遏制俄国过度扩张又不忘对其示好的需求相匹配。后来曾出任英国首相的贝尔福在谈及英日同盟时说：“日本当然不能帮助我们阻止阿姆斯特丹落入法国手中，或者阻止荷兰落入德国手中。”^②英国并未获得一个全球范围的盟友，但日本对此十分满意，曾任日本外相的加藤高明说，日英同盟“限定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和朝鲜，这么一来就不会把日本拖进大英帝国的扩张之中。”^③日本只承担了有限的责任，却免除了对俄战争的后顾之忧，不得不说这是日本外交的一大胜利。

七、结论

传统观点认为，通过第一次英日同盟，日本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还达到了避免对俄、法同盟战争的效果；而对英国来说避免的是日俄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49-150页。

② O'Brien, p.56.

③ Ibid, p.22.

之间的接近，并在远东地区获得了一个坚定的盟友。

但仔细分析，法国在远东地区的兵力尤其是海军力量有限，难以对俄国进行实质性的支援；而且法国也竭力避免俄国卷入远东冲突而分散了对欧洲的注意力——若俄国在远东开战会使法国陷入单独面对德国的危险之下。此外，德国早已表达了对日俄开战的善意中立态度；而美国此时正热衷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而担忧俄国在远东的独大，因此也倾向日本。可以说即使不存在英日同盟，日俄开战后俄国恐怕也难以获得外界实质性的支援。此外对于英国而言，由于日本视朝鲜为“生命线”与俄国在朝鲜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不可避免，日俄之间也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英国对于日俄接近的担心多少有些多余；而且英国与日本之间的盟约仅限远东一隅，日本难以为英国分担太多的防务责任。

但是条约对日本而言的意义不仅限于准备一次对俄战争，而是使得日本顺利将自我投入了一个大国集体之中，从中取得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 20 世纪以前，日本不被列强视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大国，但日本充分利用了第一次英日同盟的契机，特别是在第二次英日同盟^①达成后，在英国的牵头之下，日本与法俄同盟间也达成了和解协定^{②③}。日本左右逢源，极大改善了自身的国际环境，通过把自身绑定在了协约国的战车上换取了自身的最大利益。

与英国结盟使得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初次体会到了与大国结盟的好处，但是有学者注意到“日本作为二流的帝国主义，它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有与旧殖民帝国合作的一面；也有相互竞争的一面”^④。日本在 1922 年之前一直推行与欧美列强一致的“协调外交”，但是与“霸权国”的结盟实际上是以承认英、美的既有优势地位为代价的。在日本仅作为地区性大国的二十世纪初，此种矛盾暂时难以显现，但到日本一战后在远东地区迅速挤占英、美的势力，立志成为世界性大国之时，这种利益一致性便消失了，

① 1905 年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中英日正式达成了攻守同盟，规定日本取得自由处置韩国的权利，把现行条约改为同盟国一国在受到一国攻击的场合要求他方援助的攻守同盟条约；还把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印度，并将条约期限延长到 10 年。

② 1907 年 6 月 10 日，日本与法国之间签订了《日法协定》，法国承认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法国要求日本政府确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统治并驱逐在日本活动的越南独立运动人士。

③ 1907 年 7 月 30 日，矛盾最大的日俄之间缔结了《日俄协约》，包括秘密划定两国在满洲的利益范围和俄国承认日韩特殊关系，作为交换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权益，日本和俄国达成了“韩蒙交换”。

④ 张景全：《日本对外结盟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2 页。

日本开始走向了挑战英、美既得利益的道路，因此选择了与“霸权挑战国家”德、意结盟，但 1940 年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却是日本结盟外交的一大惨败。

战后，日本再次面临结盟外交的选择问题，对此日本政治家无不借鉴了曾经结盟外交的原点——英日同盟。在谈到英日同盟的解体时，战后头十年曾数次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无不懊悔地说道，英日同盟的解体以及日本放弃与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是日本外交的一大悲剧。此举“搞乱了日本外交，让中国离间了各大国”。他还说，“英日同盟的稳定影响消失以后，我军便进军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于我们后来的境地如何，人人皆知。”^①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于当年放弃英日同盟以及“大国协调”之懊悔。因此，吉田茂等日本政治家在战后放弃了“日本中立化”的外交选择，再次选择了与“霸权国”结盟，将自身投入了西方阵营中。

作为一个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罕见的现象，日本迄今已与美国保持了六十多年的同盟，虽然同盟的具体内容历经数次变化，但是至今该同盟仍无松动的迹象，无论是日本政界^②还是民间^③仍坚定地将美日同盟作为自身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不仅是日本对战前历史反思的结果，或许也是日本不得不选择结盟政策、依附于大国卵翼之下的命运的一个写照。

（责任编辑：朱文青）

① 见《世纪之旅：七大百年外交风云》，第 281 页。

② 在日本政府制定的“防卫大纲”以及“安全保障政策”中，无不将“日美同盟”的强化作为一项追求的目标。参见：“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26622.pdf>；“防衛大綱（和文）”，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2013/_icsFiles/afifile/2013/12/17/20131217-2_1.pdf，2014 年 3 月 28 日查阅。

③ 根据日本 NHK 电台在 2010 年对 1030 位日本民众做的随机电话调查显示：71% 的调查者认为“日美安保条约今日对日本仍有意义”；42% 的调查者认为“日美同盟应该维持现状”，还有 29% 则认为“日美同盟应该进一步加强”。参考“日米安保のいま”，http://www.nhk.or.jp/bunken/summary/research/report/2011_03/110302.pdf，2014 年 3 月 27 日查阅。

美国与中国在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Lebedeva Polina* (芭丽娜) (俄)

【摘要】 本文主要论述过去十几年内在世界最大且最快速发展区域之一的东南亚地区，中美两国在现阶段以及前瞻性合作中的交互关系，这种关系也对东南亚区域间经济合作一体化的演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有增无减的经济一体化对该地区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东南亚的意义有所扩大，但是只有长期存在的以及稳定的东盟才可以作为更深的一体化基础。很明显，中国与美国两国都在世界领导中起意义深远及必不可少的作用，因此在每个一体化步骤，它们的权威应该受到相应的关注。对东盟而言，中美关系被视为形成地区机构最重要因素之一。

显而易见，1997-1999危机之后，中国在发展它与东盟国关系中有很大的进步，并加入了东南亚的主要一体化过程中（例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盟十加三）。而美国正好相反，失去了它在该区域政治与经济的权势。鉴于中国目前正在寻求其跟美国关系中的新型地位，希望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与美国相等。很明显的是，最近两国在东盟框架下的合作与竞争被视为中美争夺全球领先地位的体现。

然而，由于中国与美国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它们在东南亚的竞争显然并不是筋疲力尽或是伤害东盟及自身的利益。该论文的目标为研究美国-中国-东盟双边及多边经贸关系，以及美、中在东盟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论文也讨论，谁将来会成为亚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领导者。

【关键词】 美国；中国；东盟；东南亚；经济一体化

导言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美国加速“重返”东南亚和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有关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的发展状况日益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迅速发展中的地区大国，而东盟亦是亚太地区的一极。因而，中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2 级硕士留学生。

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到整个亚太地区国际格局的重构。相应地，深入分析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的走势亦成为中国外交战略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冷战后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的演变，受国际环境、各自对外政策的调整等多种因素影响，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005年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活动明显趋冷，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相应减弱。与此同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稳步提升。美中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力量和影响渐趋平衡。然而，东南亚毕竟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尤其是“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可或缺的区域。为重新取得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加速了“重返东南亚”的步伐。美国的这一举措给东南亚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增添了新的变数，也必然会将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带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双边关系的角度看，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盟关系一直稳步提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这“标志着双方经贸合作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①。就美国与东盟关系而论，2009年11月双方实现历史性的首次峰会，会议就双方未来的互利合作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这是因为美中双方都认识到东南亚的战略价值，因而都力求使东盟的战略天平向自己一方倾斜。面对中美两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东盟选择了“大国平衡”的战略来加以应对。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许通美对这种战略作了如下的描述：“不排除大国对区域内事务的干预，而要平衡它们的影响力并使之有助于维护东南亚的稳定与繁荣。”^②随着冷战后东南亚地区局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金融风暴和“9·11”事件，新加坡的观点逐步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所接受，成为该地区各国处理与大国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不仅是出于对自身的实力的考虑，而且也是对冷战后急速变化的地区局势的一种反应。许通美认为，新加坡的观点“可能是最不受欢迎的，但最接近现实。”^③这意味着东盟在中美之间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平衡者的角色。东盟希望加强同中、美双方的关系，同时力求避免对任何一方的过分倚重，其目的为在中美两国的相互

①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是在参加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作上述表示的。
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0-10/19/content_21173668.htm

② 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门洪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③ 同上，第262页。

制衡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长远看，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共同利益将进一步增多。

一、后冷战时期美国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比较

1、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与各国贸易合作越来越多，中国和东盟成功地组建了自由贸易区，经贸往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由最初的单一货物贸易形式，逐步扩展到服务贸易、双边投资、信息通讯、湄公河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等各个领域。2012年是“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10周年，正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科技合作年。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历程中历史性的一步。它体现了中国和东盟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联系。从表1可看到冷战结束后20多年来中国-东盟贸易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和强劲增长势头。

表 1 中国-东盟贸易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和增长势头

东盟-中国贸易发展的里程碑	贸易总额	增长 (%)
1991年：双方建立对话伙伴关系	84亿美元	100
2002年：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548亿美元	552
2012年：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10周年	4000.9亿美元	4663

数据来源：王勤：“2012-2013年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数量分析与预测”，《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2期，第3页。

2011年以来，东盟继欧盟、美国之后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依存度，即中国-东盟双向贸易额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在近几年均维持在10.0%左右。中国除1993、1995和1997年有不超过10亿美元的顺差外，连续多年均为逆差。最大的逆差额出现在2011年，为229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与东盟10国贸易总额达到4000.9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10.2%。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2042.7亿美元，同比增长20.1%；进口1958.2亿美元，同比增长1.5%；

中方顺差84.5亿美元，1997年以来中国对东盟货物贸易的首次顺差^①。

表2 2012年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按贸易方式排列）

	总额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在贸易总额的比例 (%)
一般贸易	2038.9	+13.32	51.0
中国出口	1177.6	+23.6	
中国进口	861.3	+1.5	
中方顺差	316.31		
加工贸易	1153.5	+1.7	28.8
中国出口	621.1	-----	
中国进口	538.3	-----	
中方顺差	88.9		
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贸易	645.6	+15.7	-----
中国出口	109.4	+19.4	
中国进口	536.32	+15.0	
中方逆差	421.8		

数据来源：王勤：“2012-2013年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数量分析与预测”，《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2期，第4页。

从贸易的主体与企业性质看，外商投资企业仍为中国-东盟贸易的主角，但私营企业贸易增长迅速。从贸易国别来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保持增长但增速放缓，市场呈多元化趋势。在贸易总额方面，201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总量均呈正增长（表3）。

表3 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按国别排列/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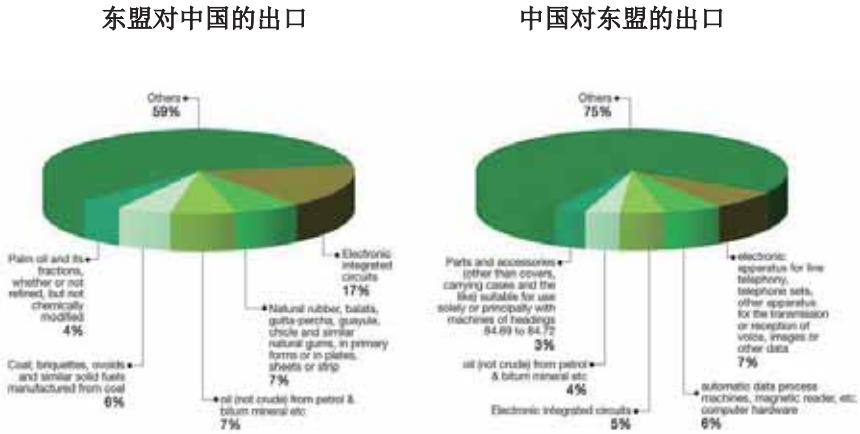
出口目的地/ 进口来源地	双边进出口总额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绝对值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	比重 (%)	绝对值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	比重 (%)	绝对值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	比重 (%)
马来西亚	948.1	5.3	23.7	365.2	31.0	17.9	582.9	-6.2	29.8
泰国	697.5	7.7	17.4	312.0	21.4	15.3	385.4	-1.3	19.7
新加坡	692.8	8.7	17.3	407.5	14.6	19.9	285.2	1.4	14.5
印尼	662.2	9.4	16.6	342.9	17.4	16.8	319.3	1.9	16.3
越南	504.4	25.4	12.6	342.1	17.6	16.7	162.3	46.0	8.3
菲律宾	363.7	12.8	9.1	167.3	17.4	8.2	196.4	9.2	10.0
缅甸	69.7	7.2	1.8	56.7	17.7	2.8	13.0	-22.7	0.7
柬埔寨	29.2	17.0	0.7	27.1	17.0	1.3	2.2	16.8	0.1
老挝	17.3	32.8	0.4	9.4	96.8	0.5	7.9	-4.1	0.4
文莱	16.1	22.6	0.4	12.5	68.2	0.6	3.6	-37.3	0.2
东盟合计	4000.9	10.2	100.0	2042.7	20.1	100	1958.2	1.5	100

① 王勤：“2012-2013年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数量分析与预测”，《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2期。

资料来源：王勤：“2012-2013年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数量分析与预测”，《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2期，第5页。

按产品来看，2012年中国-东盟贸易中，机电产品贸易额仍占贸易总额的一半，且进出口均保持增长态势，资源类产品进口所占比重较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趋势增强。图1显示按照东盟数据的中国-东盟的进出口商品的前五大类进口产品。区域内双边贸易具有互补性，中国将从东盟进口水果蔬菜等农产品，以及资源型工业加工品；而向东盟出口加工食品，以及钢铁机械、运输产品和电子产品(成品)。这种贸易调整体现了成员国间生产的比较优势，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图1 中国-东盟前五大类进出口商品



资料来源：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book 2012, ASEAN Secretariat, January 2013, p.3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双向投资不断扩大。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图3）。在中方倡议下，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相继成立，成为双方投融资合作的重要平台。2010年上半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约31亿美元，中国对东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约12亿美元。截至2010年6月底，双边投资总额约694亿美元，其中东盟对华投资累计约598亿美元，中国对东盟非金融类投资累计约96亿美元。2012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投资14.88亿美元，同比增长34.3%。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在东盟

投资额已达188亿美元，其中2008年以后新增投资额就占中国对东盟累计投资总额的70%以上。中国对东盟投资领域已扩大到建筑、饭店、电气、矿业和运输等各行业。同时，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上半年，东盟对华投资45.5亿美元，同比增长27.5%。截至2012年6月底，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达738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①

中国-东盟的双方经济合作将进入一个全面深化发展的新阶段。服务贸易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合作方式也将更多元化。随着“清迈协议”的实施和“电子东盟”的启动，中国与东盟在金融、保险与电信领域的合作将更大规模地展开。基础设施的合作步伐也将加快，同时将带动相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农业、环境保护、能源、知识产权及企业之间，特别是中小企业等方面的合作也将启动。

结合历史数据与计量模型，可以预测，在国际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将保持增长势头。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贸易伙伴，东盟也已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预计到2015年，双方贸易额将达到5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双方在贸易增长的质量以及结构优化方面将进一步提高，从而在全球贸易格局调整的进程中，推动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在多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并扩大共赢效应。

2、美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

回顾美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关系，可分为几个阶段。它们反映了美国 and 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也深刻地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美国以及东盟自身实力的变化。

1977年以前，在冷战时期，美国并没有对东盟地区进行太多的关注。这个时期美国只与菲律宾、泰国、印尼和新加坡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个阶段，经济让位于政治需要，并未在双边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1977年到2002年，是美国和东盟进行积极接触，开始对话，构建伙伴关系机制，并获得长远发展的25年，在这期间美国和东盟频繁接触，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这一时期，美国开始重视并注意提升其与东盟的关系。

2002年以后，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对东盟事务无暇东顾。美国国务卿赖斯甚至两度缺席东盟地区论坛，这也反映了美国对东盟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美国虽已与东盟国家进行了反恐合作，但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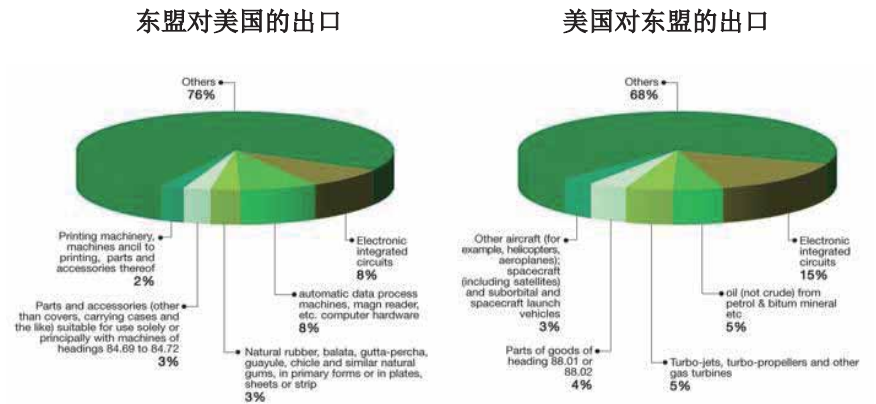
^① 王勤：“2012-2013年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数量分析与预测”，《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2期，第6页。

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却并未得到很大的提升。

2009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泰国曼谷首次提出“重返亚太”的构想，肯定也想踏上东盟迅速发展的节奏——要经济复苏，就必须更多依靠与亚洲的互动。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说，东盟对美国极其重要。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因此美国“重返亚太”的最终目的是为经济利益服务。

如上所说，过去十年，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存在下降，东盟各国对美国的依赖减少。近一两年来，美国积极谋求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联系。美国国务院去年发布的资料显示，东盟和美国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而且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投资目的地。2002年以来，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了60%。但是，近年来美国在东盟的市场份额在下滑。数据显示，1993年美国在东盟对外贸易额中占比接近20%，而今天已经降到10%以下。这部分是由于欧盟、中国和日本等加大了开拓东盟市场的力度，另一方面是由于东盟区内贸易占比有了提升。

图2 东盟-美国前五大类进出口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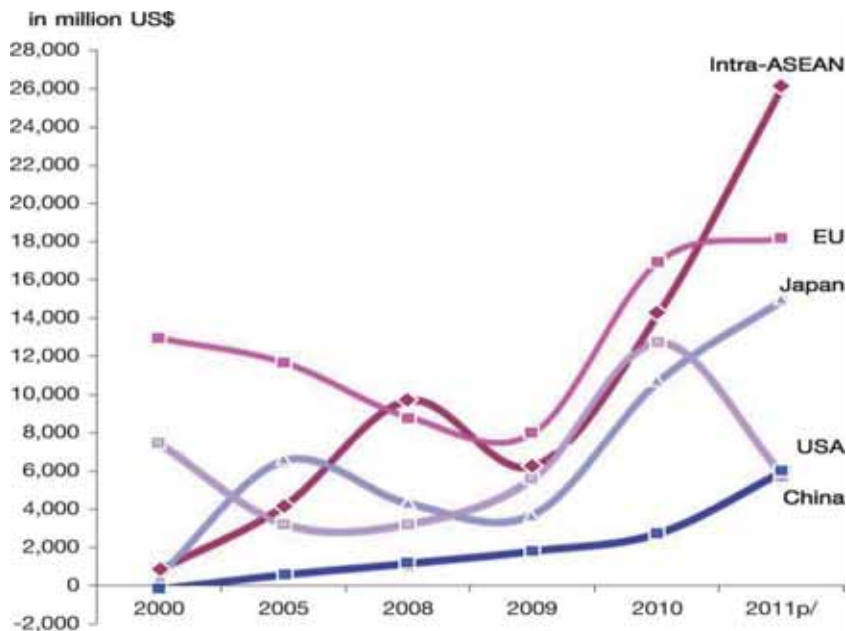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book 2012, ASEAN Secretariat, January 2013, p.34.

拿美国-东盟贸易结构而言，它一直比较稳定。图2显示，东盟对美国常出现贸易顺差，其中前五大类进出口物品见图2。东盟传统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口电脑与其它零部件种类以及天然树胶和天然树脂等，同时进口石油产品与沥青矿物，电子器件及航空器。

美国企业对投资东盟各行各业都很感兴趣，从能源、消费商品到信息与通信行业等。事实上，东盟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大投资市场。美国在东

盟的投资额是在中国投资额的3倍、印度投资额的9倍。但近年来美国在东盟市场的投资份额仍相对下降。东盟的数据显示，美国在2000年是东盟第二大直接投资国，总投资额达到72.93亿美元。但2009年美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下降为40.87亿美元。这一数据在2010年猛升为85.78亿美元，而2011年又下降为56.1亿美元，与当年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额相等（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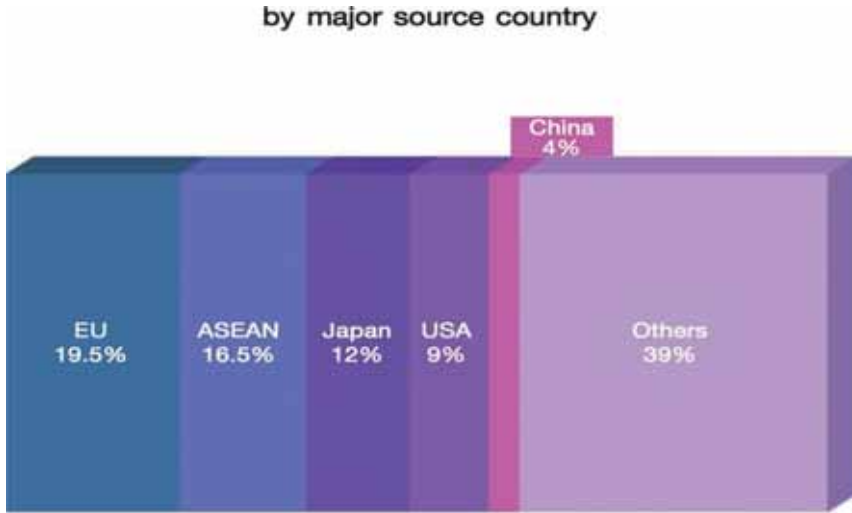
图3 各国在东盟的投资额（2000-2011年）（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book 2012, ASEAN Secretariat, January 2013, p.41.

从累计投资额来看，当前美国为东盟第四大投资者（图4），目前还有许多美国公司考虑投资东南亚。如泰国企业和美国谷歌、万事达、可口可乐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政府近年取消了对缅甸的部分限制，允许更多美国企业到缅甸投资。柬埔寨首相洪森曾在2012年7月举办的美国-东盟商业论坛上表示，东盟国家希望美国在能源、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进行投资。

图4 各国在东盟外资投资额中占比（2004-2011年）



资料来源：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book 2012, ASEAN Secretariat, January 2013, p.42.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2010年9月在奥巴马同东盟领导人会晤之前说：“美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是第一位的，美国经济和贸易部门将继续同东盟保持长期而极富活力的对话”，而且“我们并视美国-东盟经济联系高度优先。”^①可见，美国为了振兴其在东南亚的实力与影响，打算通过一系列措施在东南亚重新占有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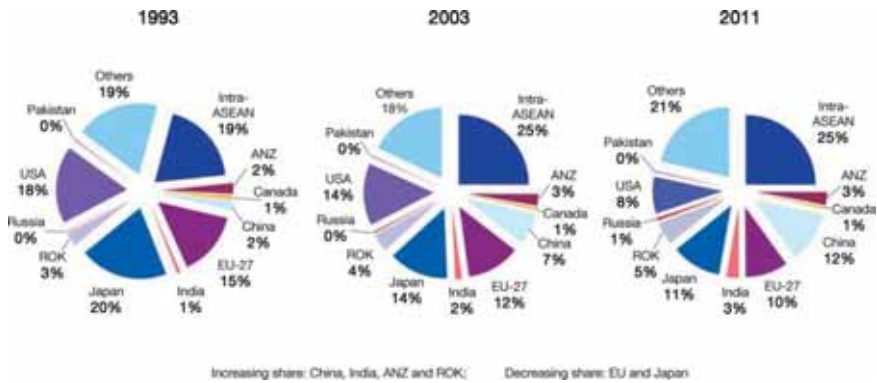
3、美、中比较

分析美国、中国同东盟经贸合作的信息及数据后，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来，中国-东盟经济关系不断发展而美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与影响则显著下降。

贸易方面，美国在东盟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从1993年的18%下降为2003年的14%与2011年的8%。而同期中国的比例却从1993年的2%上升到2003年的7%和2011年的12%（图5）。

^① 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丽贝卡·汤普森在2010年9月24日在纽约同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会晤在一份声明中所表示的。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9/27/c_12609388.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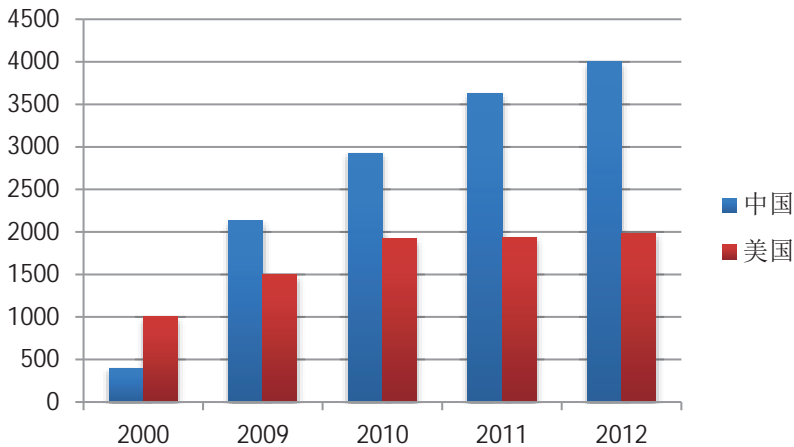
图5 各国在东盟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率



资料来源：ASEAN Statistics Chartbook 2012, P.21.

从图6可以看出，上述趋势也突出表现在中、美两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的变化中。2000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仅约400亿美元，不及当年美国与东盟贸易总额1000亿美元的一半。但2009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已达约2100亿美元，远超过当年美国的1500亿美元。近年来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2012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4000亿美元，已两倍于美国-东盟的贸易额（2000亿美元）。

图6 中国、美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单位：亿美元）



注：图表中左柱为中国；右柱为美国。

数据来源：美国“重返亚太”经济介入日增，人民日报2013年2月19日和“U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nual Revision 2012.”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released on 4 June 2013.

中国、美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结构比较相似。东盟为世界上传统的电子零部件和天然树胶的出口国。鉴于美国与中国都在东盟有电子合资企业，互相间的电子器贸易为加工贸易，即在东盟加工进口的电子器，然后再向中、美两国出口。

表4 美国-东盟、中国-东盟前五大类进出口商品比较

美国		中国	
东盟对美国的出口	东盟从美国的进口	东盟对中国的出口	东盟从中国的进口
电子集成电路 8%	电子集成电路 8%	电子集成电路 17%	电子仪器的电话，用于传输数据的装置 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脑硬件 8%	非原油，沥青矿物 5%	天然橡胶 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脑硬件 6%
天然橡胶 3%	涡轮喷气机，涡轮螺旋桨，燃气涡轮 5%	非原油，沥青矿物 5%	电子集成电路 17%
印刷机械 2%	零部件 4%	煤块，固体燃料 6%	非原油，沥青矿物 4%
电子零部件 3%	其他航空器 3%	未经化学改性的棕榈油 4%	零部件 3%

数据来源：ASEAN Chartbook 2012, pp.31-34.

从表5可见美国、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前五位贸易伙伴相同，但排序不同。

表5 美国、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最主要贸易伙伴（2012年/亿美元）

美国		中国	
东盟国家	双边进出口总额	东盟国家	双边进出口总额
新加坡	507.57	马来西亚	948.1
马来西亚	388.34	泰国	697.5
泰国	369.96	新加坡	692.8
印尼	259.95	印尼	662.2
越南	248.90	越南	504.4

数据来源：王勤：“2012-2013年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数量分析与预测”，《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2期，第5页，“U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nual Revision 2012.”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released on 4 June 2013.

在投资领域，美国对东盟的累计投资额仍然超过中国的（见图4和下表6）。因看好东南亚的市场潜力及投资环境，美国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至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国。美国商会“2011年东盟商业调查报告”显示，此前两年美国在东盟74%的企业都进行了扩张，且未来两年也有85%的美国企业计划进行扩张，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

表6 各国在东盟境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2004-2011年）

Source Country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a)	2004-2011
(1)	(2)	(3)	(4)	(5)	(6)	(7)	(8)	(9)	(10)
ASEAN ^(b)	8.9	9.9	13.6	10.8	19.7	13.4	15.5	23.0	15.4
REST OF THE WORLD ^(c)	91.1	90.1	86.4	89.2	80.3	86.6	84.5	77.0	84.6
Asian NIEs	3.7	2.1	5.0	6.5	10.2	18.3	5.6	7.0	7.1
Hong Kong	1.0	1.3	2.1	2.3	3.5	12.1	0.4	3.6	3.0
South Korea	2.3	1.2	2.0	2.9	3.1	3.6	4.1	1.9	2.7
Taiwan (ROC)	0.4	-0.4	0.8	1.4	3.5	2.4	1.2	1.5	1.4
China	1.9	1.4	3.0	2.5	2.5	4.0	3.0	5.3	3.2
India	0.2	1.1	-0.2	3.1	2.8	1.3	3.6	-1.8	1.2
Japan	14.6	15.5	18.9	10.4	8.8	8.1	11.7	13.2	12.3
Pakistan	0.01	0.01	0.01	0.02	0.01	0.00	0.00	0.01	0.02
EU	29.0	27.5	24.8	26.0	18.0	17.2	18.4	16.0	21.2
Russian Federation	n.a.	n.a.	0.0	0.0	0.2	0.3	0.1	0.0	0.1
Canada	2.5	1.6	0.6	0.5	1.3	1.5	1.5	0.9	1.2
USA	11.0	7.7	4.7	12.3	6.6	12.2	13.8	5.1	9.1
Australia	1.5	0.6	0.9	2.6	2.1	2.1	2.8	1.2	1.8
New Zealand	-0.1	1.4	-0.2	0.1	-0.2	0.2	0.0	0.0	0.1
Others ^(d)	26.7	31.1	30.9	25.1	28.0	31.3	23.9	30.1	27.2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Source: ASEAN Secretariat - ASEAN FDI Database as of 30 September 2012.
Data is compiled from submission of ASEAN Central Banks and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s through the ASEAN Working Group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atistics.

资料来源：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 p.131.

但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绝对额虽比美国少，却增速较快，潜力巨大，投资领域和投资形式不断拓宽。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小型项目。此后，中国企业已涉及东盟国家的能源开发、金融、建筑、化工、纺织、电气、矿业、医药和运输等各行业，而且投资形式也从直接投资发展到包括技术投资、BOT等多种形式^①。

值得指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分布极不均衡（表7）。美国、中国对东盟五个国家（即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占投资总额的约85%，其余的五国（即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只占投资总额的15%。

表7 中国、美国在东盟的投资的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中国			美国		
	东盟5国 ASEAN 5	文柬老 缅越5国 BCLMV	东盟10 国 ASEAN 10	东盟5国 ASEAN 5	文柬老 缅越5国 BCLMV	东盟10 国 ASEAN 10
2004	513, 2	229, 8	743	4280, 7	63, 1	4343, 8
2005	458, 9	156, 7	615, 6	2995, 5	267, 1	3262, 6
2006	1709	230, 4	1939, 4	2582, 4	388, 9	2971, 3
2007	1284, 3	784, 8	2069, 1	9490	901, 6	10391, 6
2008	685, 9	522, 5	1208, 4	2980, 5	278, 7	3259, 2
2009	1236, 7	615, 8	1852, 5	2385, 8	3318, 5	5704, 3
2010	2336, 7	448	2784, 7	11793, 7	977, 9	12771, 6
2011	5336, 3	698, 1	6034, 4	5610, 3	172, 4	5782, 7
2004 — 2011	13561	3686, 1	17247, 1	42118, 9	6368, 2	48487, 1

数据来源：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 pp. 127,133,137.

就拿受到直接投资的东盟国家、美投资的东盟国家而言，可见，在两

^① “美国‘重返亚太’经济介入日增”，《人民日报》，2013年2月19日。

种情况下新加坡为最重要的投资接受者。越南和泰国也在投资的全额占有大的比例。由于美国对缅甸的部分限制，此国家之前没收到美国的投资，但是缅甸一直为中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接受者。但是一定要注意，在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中，主要是东盟对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中国的国际顺差。2009年，东盟国家在华投资居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其中，新加坡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和东盟各国通过相互之间进行投资，代替对外直接贸易，减少相应的成本，促进利润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时有效地占领市场，加强贸易竞争。

最后，中国、美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也面临着重大挑战。由于中国在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力发展与东盟的贸易关系，目前在贸易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在对东盟的年度直接投资方面已与美国相当。中、美两国都认识到东盟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且在东盟的经济地位也比较接近，双方都正竭尽所能采取各种政治与经济措施进一步开拓东盟市场、发展经贸与投资合作。

二、美国与中国在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作用的比较

1、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和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特征

东盟成立于1967年，经过40多年风雨，如今已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于东亚甚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盟自成立以来，由当初的五个创始国发展成为现今的“东盟十国”，其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显著加强。相比欧盟，东盟虽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一体化也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东盟的发展和与各方面的合作使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明显提升。如在东亚地区积极开展的“10+1”、“10+3”和“10+6”（RECP）等各种形式的合作，东盟的地位和影响都相当独特与突出。

199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上，计划在15年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而到2003年，东盟六国提前五年基本建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十国中的87.85%的产品关税已降至0%-5%。同时，东盟也积极寻求与区域外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如中国和东盟之间的“10+1”以及东盟与中、韩、日三国之间的“10+3”形式的合作机制（即所“东盟+”概念）。近年来，东盟国家还积极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以东

盟为中心、多层次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据统计，截至2012年9月，东盟各成员国提议中的自由贸易协定为46个，正在协商中的自由贸易协定为41个，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为98个，总数达185个。2003年至今，东盟主要侧重于东盟共同体的建立。表8显示东盟国家经济一体化中的最重要事件。

表8 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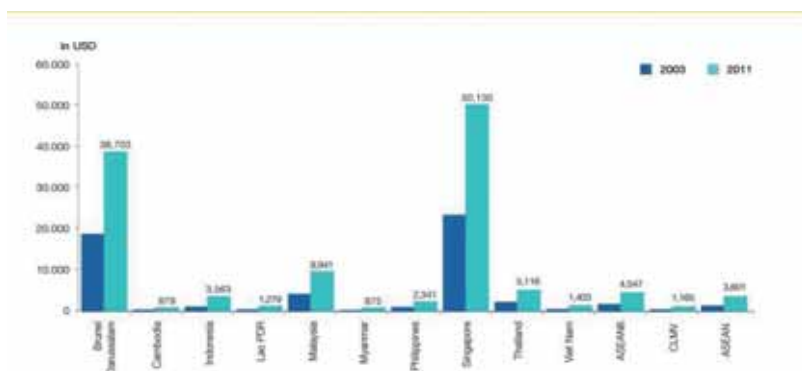
1992年初	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
1995.7.2	越南加入
1997.7.23	缅甸加入
1997.7.23	老挝加入
1999.4.30	柬埔寨加入
2000.11	东盟领导人达成了“推进东盟一体化计划”
2003.10	在第9届东盟首脑会议发表的“东盟第二协约宣言”宣布将于2020年建成以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
2007.1	在第12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的“宿务宣言决定”正式启动东盟宪章的起草工作；宣言还决定将东盟共同体建设提前至2015年完成
2007.11	第13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宪章”获得通过；另外，会议还通过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重申在2015年之前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
2009.2	在第14届东盟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东盟共同体2009年-2015年路线图宣言”
2010.10	在第17届东盟首脑会议期间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规划”包括700多项工程和计划，投资规模约达3800万美元；“规划”实施后将促进东盟地区全方位联通

信息来源：大林：“东盟一体化探索走过20年历程”，《广西日报》，2012年1月11日，第010版。

从东盟发展进程来看，东盟的一体化程度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对比欧盟经济体来看一体化进程仍相对缓慢。第二，合作领域相对狭小，一体化程度不高。东盟的合作领域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安全方面。对比欧盟来说，东盟合作领域较窄，这同时也反映出其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

东盟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东盟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文化制度上差异大，呈现很大的不平衡性，新加坡、文莱等早期的6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而后来加入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4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201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最高，为50130美元，而缅甸的人均GDP只有875美元^①，经济水平最高和水平最低的国家相差近55倍。

图7 东盟国家的人均GDP



资料来源：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book 2012, p.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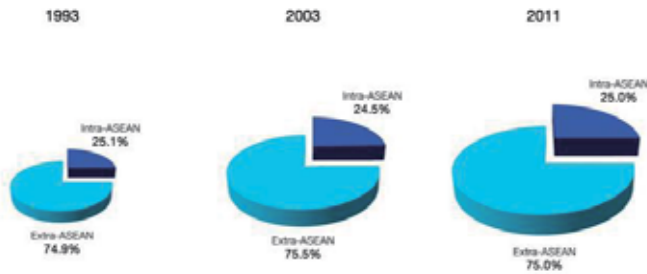
除了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之间的政治体制和宗教文化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别。文化方面，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大部分居民信仰伊斯兰教，而菲律宾90%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教，泰国、缅甸、老挝主要信仰佛教，而新加坡则是一个多元宗教国家。政治方面，越南、老挝是社会主义国家，缅甸正从军人执政中转型，印尼是总统制的穆斯林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一党独大的议会制政府，泰国和柬埔寨是君主立宪多党制议会政府，菲律宾是总统制多党制政府，而文莱则是君主立宪制伊斯兰国家。这些政治体制、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东盟内部很难就有争议

^①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 p. 42.

的问题达成一致。

东盟一体化发展的第二个制约因素是对外有较强的依赖性。东盟市场对外开放，在促进自身经济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东盟对外部市场形成较大的依赖性，而区域内的经贸联系却相对较少。如区域内的贸易比重自1993年至今几乎未变，占东盟贸易比重的25%左右。区域内的投资比重虽然在2011年有所增长，但是也仍占东盟投资比重的20%左右（图10）。而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过程却表明，要想提高一个区域的一体化程度，必须加强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与投资贸易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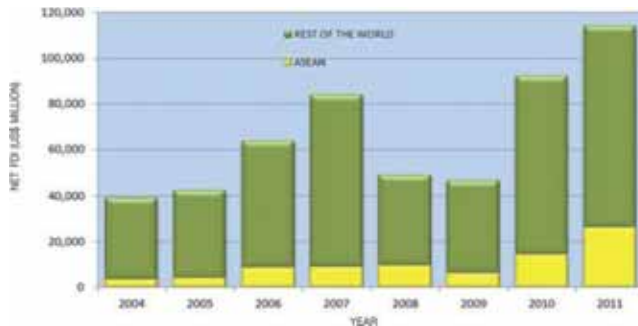
图9 东盟区域内贸易比重（%）



资料来源：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book 2012, p. 20.

东盟本身内部机制存在重大问题。从东盟的决策机制来看，东盟实行全体一致的原则，强调所有成员无论强弱，地位平等，这种“亚洲方式”的决策机制大大降低了东盟在很多问题上的效率。另外，东盟十国常常在争夺外国直接投资、先进技术和出口市场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东盟这种松散的制度和结构机制使得东盟一体化的步伐变得更加缓慢。

图10 东盟区域内投资（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 p. 128.

东盟计划在2015年建设成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的共同体，但从目前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其所面临的内部、外部等各方面的困难来看，建立共同体将任重而道远。东盟经济一体化已实现近八成。4月24、25日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召开、东盟十国领导人悉数参加的第 22 届东盟峰会发表声明称，截至2013年3月31日，东盟经济共同体已按计划完成了77.54%。目前，尽管2007年“蓝图”中的259项措施已得到实施，但东盟秘书长黎良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言，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尚未完成的22.46%，主要包括互联互通、跨境贸易便利化、交通协议的实施等，正是“蓝图”中难度最大的部分。

随着东盟国家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东盟与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5个“10+1”自由贸易区取得相当的进展。表8显示东盟“10+1”一体化模式。表9介绍在“东盟+1FTAs”框架下消除关税的规模。

表10 东盟在“10+1”框架下达成的协议

2001.11	东盟与中国宣布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CAFTA / ACFTA)。2010年1月1日，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
2007. 6	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AKFTA)的货物贸易协议正式生效，并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
2008. 4	东盟与日本正式签署经济伙伴协定(AJ-CEP)，并于2008年12月正式生效
2009. 2	东盟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签署东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协议(AANZFTA)，并于2010年1月正式生效
2009. 8	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区(AIFTA)的货物贸易协议正式签署，并于2010年1月正式生效
2012. 11	东盟与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了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资料来源：王勤：“2012-2013年东盟经济的分析与预测”，《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2期。

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东盟以自身区域化为核心的多层次

推进区域化，并注重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面对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尤其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CJK FTA)，东盟已意识到必须加快以自身为主导的区域经济整合的步伐。2011年11月，第十九届东盟领导人会议一致同意建立“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RCEP)，以建成一个由东盟为主导、与各自由贸易协定合作伙伴形成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议。2012年11月，东盟与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了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了覆盖16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按照RCEP组建的预期时间表，2013年年初启动谈判，2015年年底完成谈判并进入实施阶段。RCEP的目标是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建立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并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多个领域，其自由化程度将高于东盟目前的5个“10+1”自由贸易协议。但整合现有的5个10+1的难度比较高，对东盟与其伙伴国建立10+6也是很大的挑战。根据研究和分析，中国-东盟与东盟-韩国FTA的相似度最高，因此最易整合。而五个“10+1”中东盟-印度FTA的条件相比其他“10+1”的条件差别最大，其整合的难度也最大。五个FTA中，东盟-澳新FTA是质量最高的FTA，整合难度也相对较大。东盟-日本的自由贸易协议与谈判整合难度则介于澳-新和中、韩之间。还应注意，“10+6”中不仅有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有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于服务贸易领域尤其是自然人等领域的协调将较为困难^①。

表11 东盟10+1FTA消减关税的比较

	AANZFTA	ACFTA	ADFTA	AJCEP	AKFTA	Average
BRN	99.2%	98.3%	85.3%	97.7%	99.2%	95.9%
CAM	89.1%	89.9%	88.4%	85.7%	97.1%	90.0%
IDN	93.7%	92.3%	48.7%	91.2%	91.2%	83.4%
LAO	91.9%	97.0%	80.1%	86.0%	90.0%	89.3%
MLS	97.4%	93.4%	79.8%	94.1%	95.3%	92.0%
MVA	88.1%	94.5%	76.6%	83.2%	92.2%	87.3%
PHI	93.1%	93.0%	80.9%	97.4%	99.0%	93.1%
SGP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THA	98.9%	93.5%	78.1%	96.8%	95.6%	92.6%
VTN	94.8%	n.a.	79.5%	94.4%	89.4%	89.5%
AUS	100.0%					
CHN		94.1%				
IND			78.8%			
JPN				91.9%		
KOR					90.5%	
NZ	100.0%					
Average	92.7%	94.7%	79.6%	92.8%	94.5%	

Notes: HS2007 version, HS 6-digit base. Data on Viet Nam under the ASEAN-China are missing. Data on Myanmar under the ASEAN-China FTA are also missing for HS01-HS28.

① 方笑君、孙宇：“新时期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分析”，《国际贸易》，2012年第4期。

资料来源: Yoshifumi Fukunaga and Ikumo Isono, “Taking ASEAN+1 FTAs towards the RCEP: A Mapping Study”, ER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January 2013, p. 8.

从经济角度看, 东盟要在2015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内部市场的统一显得不太切合实际。首先,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与政治利益上的冲突, 东盟很难建立关税同盟。另外, 东盟内部发展高度不平衡, 是阻碍东盟整体实力提升的重要原因。总体来看, 对于东盟经济的发展前景, 国际经济机构和东盟国家大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预测多数国家将保持中速经济增长, 而少数国家经济则低速增长, 东盟仍将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是, 各国面临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挑战不容忽视。

2、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推动由其主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一直是美国政府的目标, 但是近年来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贸易争端不断, 美国在推进多边自由贸易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方面阻力重重。因此美国开始采取双边或区域合作的迂回方式, 作为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的筹码。从地理区域看,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对象国主要包括拉丁美洲、中东和亚太地区。过去十年, 美国加速与东南亚国家签订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新加坡和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为其在亚太区域推进经贸合作打下基础。美国于2004年6月和泰国开始自由贸易谈判, 2006年3月又决定和马来西亚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作为深入和东盟的经济一体化举措。近年来, 美国对东亚的经济战略成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 希望尽可能淡化“东亚”概念, 而将东亚纳入到其主导的亚太合作的框架下。

面对东亚寻求新的一体化架构的努力, 美国尝试从三方面来施加影响: 首先是参加与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TPP); 其次是加强美国和东盟以及其他亚太盟国间的经济合作; 最后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东亚峰会的活动。

(1) 参加与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TPP)。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 建立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简称FTA)组织。先后形成了一系列以东盟为中心的同心圆合作机制, 主要包括“东盟+”合作机制。而自称其为亚太国家的美国却俨然成为所有这些合作机制的局外人。这一发展态势使美国担心会损害其在亚太区域的战略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后, 美国大力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简称APEC), 以加强与亚洲与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2009年-2011年, 美国向其他APEC成员国的商品出口额增加了近45%, 仅2012年上半年这一指标就增加了7.5%。APEC对美国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美国对外贸易的前十大出口目的地中, 有6个都是APEC成员国经济体。但在开放地区主义的框架下, 亚太贸易自由化却缺乏少内在制度约束力与发展动力。

2009年年底, 美国高调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称TPP), 并随后开启了“重返亚太”的一系列布局, 涉及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领域。奥巴马政府已将TPP这项独立于东亚合作机制之外的多边国际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视为美国主导未来亚太政治经济格局的一块战略基石。TPP是一个较高质量的FTA, 最初来源于美国21世纪初倡导的P5(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定。2002年10月智利、新西兰、新加坡三国展开谈判, 2005年4月文莱宣布加入。2005年7月四国签署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2006年5月28日生效成立。按照协定, 成员方将在2015年前取消所有商品的关税, 此外协议还覆盖了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动植物检疫、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广泛议题和关于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的两个备忘录。金融服务与投资条款也在谈判中。原本名不见经传的“P4协议”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贸发展的影响很小, 但随着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谈判, 引发了全球强烈关注。2009年11月14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亚洲之行中正式宣布美国将参与TPP谈判, 强调其将促进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 并为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标准做出重要贡献^①。

美国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目的以及东盟及其内部成员国的反应是怎样的? 首先, 美国希望开拓新市场, 为实现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创造条件。在经济上美国强力推行TPP, 以破解中国试图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研究显示, TPP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体化收益是负值, 而对东亚以外地区如拉美地区的一体化收益显著^②。

^①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tatement by Ambassador Ron Kirk on TPP, November 13, 2009.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speeches/transcripts/2009/november/address-united-states-trade-representative>.

^② 全毅: “TPP对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中美对话语权的争夺”, 《亚太经济》, 2012年第5期, 第14页。

所以，TPP本质上是一个让美国和其他地区分享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红利的方案。

其次，东盟长期处于大国政治的挤压下，存在着强烈的防范心理，对任何可能削弱其东亚区域合作主导地位的举动都保持着敏感和警惕。如果TPP通过不断吸纳东亚经济体而扩大，面对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治理能力，东盟将很难保住自己在东亚合作中的“轮轴”地位。因此，以东盟整体而言，对TPP持谨慎和排斥的态度。

再者，由于东盟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差异较大，在面临承诺义务化、合作机制化以及各自国内压力等多重难题的形势下，东盟内部也存在矛盾冲突。东盟各国对推进东亚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认知存在差异，对美国主导TPP的发展以及未来其推动FTAAP建立的立场和态度也不尽相同。例如新加坡、文莱和越南态度鲜明地支持自由化，并率先加入TPP谈判，以求“平安”或希望从对美贸易中先分一杯羹；马来西亚虽然加入了TPP谈判，但表示会将TPP列为该国第十个五年规划，这预示马来西亚可能并不准备第一批加入TPP；泰国和菲律宾虽均对TPP表示了积极关注，但认为短期内难以达到TPP规定的标准或很多条款将影响国内经济部门，尚无决定加入TPP的时间表；而作为东盟中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则明确表示不急于加入TPP，认为加入TPP对印尼带来的损失或将大于利益。总体而言，多数东盟成员国还主要希望以所谓“东盟模式”（即协商一致、软制度和非干预性原则）来塑造东亚乃至亚太区域合作格局。同时，适度借助区域外大国力量，利用现有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制衡中日韩等区域内大国，避免东盟自身的影响力受到过度削弱^①。

（2）发展与东盟的伙伴关系是美国强化与亚洲特别是东亚联系纽带的另一重大举措。如上所述，美国长期以来与东南亚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联系，但是近年来反恐和伊拉克战争分散了美国对东盟地区事务的关注。布什政府从第二任期始着手加强与东盟的关系。2005年11月，在韩国釜山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期间，布什总统与东盟7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06年7月，美国与东盟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该计划为美国与东盟2006-2011年间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蓝图。在经济合作方面，美国继续实施自己提出的《东盟企业倡议》，

^① 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

尽早完成《美国-东盟贸易投资框架协议》，建立加强美国-东盟贸易投资流动机制，定期举行美国-东盟经济部长级磋商会议。奥巴马上任后，任命了第一个美国驻东盟大使，签署了“与东盟友好合作条约”，并发展专注于缅甸新的合作策略。这是因为之前由于美国的制裁，缅甸问题已成为其与东盟接近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3) 美国积极参加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还表现为美国在2011年获得东亚峰会的观察员身份，希望在未来的东亚峰会中发挥影响。2001年，由参加“10+3”会议的东亚13国26位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报告，为东亚地区合作勾勒出发展蓝图。2004年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决定，2005年在吉隆坡召开首届东亚峰会。这样美国即使不是东亚峰会的正式成员，至少也没有被完全排除在外。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峰会的活动，不仅可以更好地掌握这一机制的发展动向，而且美国的代表置身于东亚峰会的议事大厅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有效地阻止峰会朝着美国不欢迎的方向发展。

简言之，美国加入东盟经济一体化过程的长远战略意图就在于保证美国在亚太市场准入等经济利益、构建符合美国理念的价值观，维护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

3、中国在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形式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和东盟成员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高，全球经济变动会对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是为应对经济全球化中的负面影响和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应运而生的。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的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该协议以拓展双方经贸合作，创造自由便利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为目标，计划在2010年基本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英文简称CAFTA）。按照原来计划，CAFTA在2010年1月1日正式建立启动。CAFTA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当前世界人口包含最多的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缔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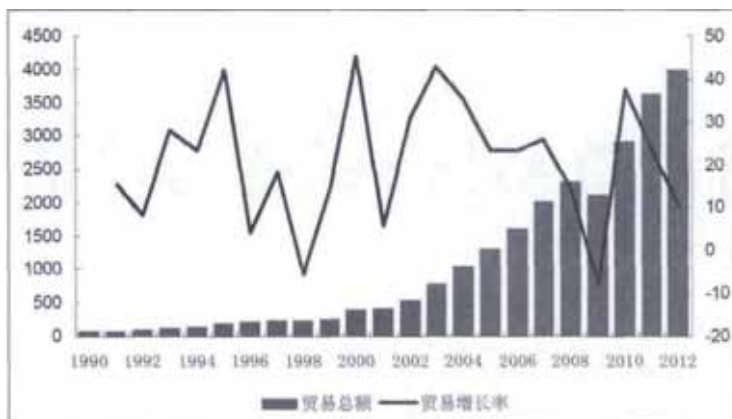
的最大的自贸区。成为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组织。

在“框架协议”中，货物贸易是自贸区的核心内容，除涉及国家安全、人类健康、公共道德、文化艺术保护等WTO允许例外的产品以及少数敏感产品外，其它全部产品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都应逐步取消。根据框架协议的安排，为使双方特别是东盟方面尽快享受到自贸区的好处，双方制订实施了“早期收获(Early Harvest)”计划，即从2004年1月起对500多种商品实施降税，并在2006年实现上述商品的零关税。随后，历经一年多的谈判，2004年11月中国、东盟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入了实质性建设阶段。“货物贸易协议”采用“负面列表(negative list)”方式，即没有列入敏感产品清单的产品均被视为正常产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规定，对中国和东盟老成员，正常产品自2005年7月起开始降税，并于2010年1月1日将关税最终削减为零；对东盟新成员，同样从2005年7月起开始降税，但是至2015年将正常商品关税降为零。同时，为了贯彻框架协议文件，并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合作，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在菲律宾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8月，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双方正式完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任务。

如图11所示，自2002年11月中国-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框架协议”以来，2002年便成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快速发展的“起飞点”。此外，中国-东盟日益扩大的双边贸易正成为双方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据估算，CAFTA建设历程中，双边贸易对东盟国家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0.9%，对中国GDP的增长贡献率也达到了0.3%。

然而，伴随关税水平的持续减让，其对双边贸易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势必逐步减弱并最终消弭殆尽。国际经验表明，自由贸易区“零关税”之后大概会有五年的“蜜月”期，此后出现贸易增长放缓甚至倒退。譬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也仅在成立后十年内出现了贸易的快速增长，此后便停滞不前。显然，希望继续通过相互关税减让来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其发挥作用的空間将越来越小。因此，“后自贸区时代”若要实现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持续增长，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深度一体化，则须在关税减让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口。

图11 中国东盟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与增长率（1990-2012年）



资料来源：沈铭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就与评估”，《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9期，第12页。

尽管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签署协议和实施以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是要进一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各方面）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在讨论东盟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时候，我们发现，东盟区域内各国的发展水平大不一样；政治制度差别很大，文化、种族、宗教等也不同，有些国家社会局势不稳，民众不满情绪高涨，这些都会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产生干扰。此外，东盟各国对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表示担忧。东盟各国担心一旦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产品会席卷东盟各国并对东盟各国经济发展造成威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东盟中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不得不对中国商品的进入持防范态度，这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十分不利。以双方直接投资而言，投资规模太小，双方投资不对等。中国直接投资占贸易额的比例约为6%，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在10%以上，而现在自贸区的比例只有3%不到，对此须引起重视。东盟-中国贸易发展和金融服务的关系也是大问题。从时间上看，2001年11月，“10+1”宣布了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而对金融问题的关注却始于2009年，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金融问题却如此不受关注，令人费解。自贸区内物流发展层次不一、通而不畅的物流观念差异较大，物流标准不统一等因素，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中国-东盟经贸发展的一大障碍。除新加坡外，其他东盟国家

都是农业国，以种植业为主，工业化程度较低。各国的工业化目标大同小异，中国与东盟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也存在很多竞争，有时竞争还是主要的。因此，在如何安排“敏感产品”的开放，如何保护各自的弱势产品，亦即如何达到双方互利共等，仍然存在不少难题需要解决。

为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步为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做出更大贡献，又必要从各方面对自贸区进行升级和完善。首先，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经济的互补性和国际竞争力。其次，努力拓展多领域、多形式和多层次的经济技术合作。根据双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要求，今后合作的重点应是金融和高新技术方面，应共同防范金融风险，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中国、东盟双方还处于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起步阶段。十一个国家都算是发展中的国家，除了经济一体化问题之外，他们都具有未解决的国内问题。中国-东盟一体化之所以不能跟欧盟国家一体化直接相比，就是因为各国发展水平不同以及区域经济水平不一样，历史条件有很大的差异。在全世界经济不稳定状态下，中国-东盟之间想要继续实现其经济一体化的计划是比较困难的。多数分析者认为，如果双方及时考虑上述建议，那么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贸易增长，通过投资来扩大经济合作领域也会日益拓宽。

4、美、中比较

现阶段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非常复杂及多层面。第一层面是东盟区域内的一体化；第二层面是东盟整体跟区域外国家的一体化（即“东盟+”概念）；第三层面则是东盟国家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组织（即APEC，EAS，TPP与RCEP的概念）。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经济一体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东盟区域合作的向心力仍然比较弱，所以未来经济一体化仍会面临许多挑战。不仅如此，随着东亚经济力量的增强，东亚的整合也将提升本地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但目前东亚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与其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却并不相称。

考虑到美国、中国在东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最重要的问题是：谁将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目前在东亚区域内，除东盟之外还没有承担一体化领导者角色的国家或国家组织，东盟也因此作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中心。但在全球和亚太格局大变化的背景下，鉴于美、中两大国最近在东亚地区努力推动各种合作，东盟能否独立发展区域经济

一体化并处于领导者地位不能不打上问号。但不管怎么说，追求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也必须要跟东盟整体与东盟各国加强经济贸易关系。

面对东亚寻求新的一体化架构的努力，美国将尝试从两方面来施加影响。美国在东盟的存在的基础就是美国长期以来与东南亚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联系。但是，美国在21世纪初忽视跟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其在区域的存在，结果使它目前在该地区面对困境。很明显，中国趁美国暂时失去其在东南亚的权威，马上开始加强跟东盟国家经济贸易合作以及加入东盟一体化的过程。在最后10年内中国-东盟已经证明在支撑其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上是适当的成功。虽然美国宣示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洲，但是当前比十年之前，从经济上看，全球环境就不同了。不但美国跟东盟国家的关系退了一步，而且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比以前非常不顺。对比最近中国和东亚国家的迅速发展，美国经济实力处于相对下降状态，并且它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比中国有相对的下降，美国不能不考虑这个不利于己的现实情况。此外，美国关注的中东问题也还是存在，所以美国需要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对应中国的政治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加速发展其与亚太国家的联系，同时关注中东状态。显然，美国无法为在亚太实现更大规模的战略存在投入必需而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可见现在美国的能力与需求失衡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美国在东盟及东亚主要借助TPP提高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从目前看，TPP成员分散在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等三大洲，相互之间的贸易量虽然不大，但却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来自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政治代表性。TPP具有涵盖广泛的高标准性，即TPP是一个所谓“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正因为TPP内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所以TPP在东盟地区能够得到的成就值得怀疑。TPP是高标准自由贸易区，那么东盟国家，特别是四个新成员国家，能否合格这样的高标准？按照“一对一”的加入模式，如果将来东盟要想加入TPP，必须得接受美国开出的一系列新价码，届时，愿意参与的国家可能又得付出类似于十年前加入WTO那样的不菲代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现阶段明显不能接受这样沉重的代价。由于该原因，东盟的一些成员对加入TPP表示犹豫。

拿中国来说，当前其跟东南亚区域国家经济一体化最发达的模型就为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而它跟区域国家经济合作最大的障碍为领土争端。曾经有研究显示, 东亚地区的若干一体化方案中, “10+3”是最佳方案。但东亚大国最后都选择了“10+1”方案。因为10+3会涉及到谁来主导的问题, 东亚大国之间缺乏政治互信与合作, 只好推出东盟做主导。然后以“10+3”为基础继续发展亚太经济合作, 讨论“10+6”甚至“10+8”(再加美国和俄罗斯)的自由贸易区, 终于实现涵盖16—18国家的RCEP的目标。不过, 现在地区国家倾向于“10+1”模式。一边由于整合的难度, 一边由于中国南海的领土纠纷重新爆发。中国与东盟山水相接, 发展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贸易关系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过去一段时期内,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框架下, 中国与东盟间贸易发展迅速, 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地区的经济发展。而美国作为世界霸主, 拥有最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 并且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存在历史比较悠久, 因此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必将会对中国与东盟政治、军事、经济关系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背景下进入新的时期。在经济一体化上看, 在最近的将来,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斗争实现于TPP和RCEP的对抗。可见, 目前RCEP与TPP是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基石。但也有人担心, TPP由美国主导, 中国尚未参与而RCEP成员国中则缺少美国, 两大协定是否会形成对立?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TPP在议题范围、准入门槛、自由化要求等方面明显高于RCEP。自2011年11月以来, TPP的谈判文本已从原来的20章扩大到29章。目前已经取得较大进展的领域主要在海关、跨境服务、政府采购、电信、竞争政策、中小企业、竞争力、商务便利化、合作和能力建设等领域。同时, 参与RCEP谈判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 其结果会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全球发展因素。因此, 在近期上看, RCEP和TPP反映了处于不同阶段的经济体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同诉求, 完全可以平行推进, 并根据形势变化展开良性互动。但是在长期上, TPP很可能会打破区域的平衡。美国提出并力推TPP, 事实上将中国排挤在外, 更多凸现了美国与中国竞争的一面。将来美、中相互对抗也越来越严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报告“全球趋势2030: 可能的世界”也预测, 中国几乎肯定将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这又加剧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失衡性。

可见, 东盟虽然成为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 但是从跨区域经济一体化来看, 东盟是亚太地区一体化的一部分, 目前也在该过程并不发

挥主导作用。最近东盟区域被视为中、美竞争与合作博弈全球地位的表现。出于各自东盟国家利益的考虑，它们不得不重新加以评估，重点是如何与中国和美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互动，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中国也就是仍需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在扩大经济贸易的基础上释疑解惑，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来抵消TPP会对中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坚持自由贸易，发展自由贸易区。如此，才能把挑战化为机遇。美国急需提升东亚在其对外经贸战略中的地位，继续扩大对该地区的出口，增加国内就业，更多分享东亚经济增长的红利。综上所述，与紧缩的世界相比，东亚经济蓬勃发展，是最具活力的增长区。因此，未来的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伴随三方共融利益的增多将趋向稳定并日益向前发展，而亚太各国乃至整个世界将会从中受益良多。任何排挤对方的做法只会损和双方的利益，也无助于建立相互信任。

结论

分析关于东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以及其跟美国、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可以做出如下结论：东盟是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也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理中心。东盟在21世纪初被认为是两个强国即美国与中国的关注对象与经济合作对象。

总结并分析中国-美国-东盟之间的双边关系及多边经贸关系与其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成就，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 1、东盟一体化过程虽进步迅速，但实际上一体化程度不高。
- 2、中国-东盟在最后十几年在相互贸易、投资以及自由贸易区建立上达成卓越的成就。同时，虽然美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历史比中国长，可是在二十一世纪初东盟与美国的关系冷却了。根据第一部分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目前中国与东盟在东盟的经贸合作以及一体化过程的地位大致等同。
- 3、今天中美经济互补性、依存度都很强，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例如，中国在2013年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很可能在今年末作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如今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则更多体现在经济领域。

当前美国、中国与东盟各方都希望近期在亚太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主导角色，因此均努力推出对各自最有利的经济一体化的方案。如果将第一、第二部分的内容综合概括起来，可以得出近期东盟之内的经济一体化

过程仍然未完成，其并不能充当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领导者。另外，由于RCEP和TPP质量的差距，这两个组织会同时发展而互不干扰。但是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亚太地区矛盾和冲突会频发和升级。按照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即使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增长放缓，中国也很可能在2030年前成为高收入的国家 and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起主导地位。其次，该报告也预测，在2030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一步上升，会成为全球增长的驱动力。假设东盟国家当前不错过其在全球不稳定的条件下具有的机遇，他们才有可能获得全世界的经济权威，并保卫其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领导地位。很明显，美国依靠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势与力量以及其在亚太区域的盟国力量也继续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中、美、东盟这三边将一方面坚持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同时也会为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领导角色而角逐。

为避免在亚太地区的激烈争辩，经济一体化的各方，尤其是美国与中国应该注意到，区域之内的平衡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责任。中国和美国在亚太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无论在亚太建立何种自由贸易的安排，中美合作都是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中美两国需要不但追求自己在该地区的利益，而且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构建更具平衡性和合理化的全球贸易体系，创造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责任编辑：李括）



修昔底德与战争的起源

——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孙超*

回忆过去，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者是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修昔底德^①

翻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页，我们就看到了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个人的回忆和思考与严格的考证工作之上，为我们展示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

历史是真实的祭司，修昔底德忠实于历史记录，他既不妄加，也不隐瞒，更不恣意于写作之需，与希罗多德相比，他的记录虽然让人有昏昏欲睡之感，但是这种无可挑剔的原则，避免了所有的怨恨与奉承……^②

虽然这位历史学家并不是因为其文风而受到普遍欢迎与赞赏，甚至古典作家如狄奥尼修斯对其晦涩的文风及其著作的体例明确提出过批评，但是这位伟人以其严谨的作风和对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获得巨大的影响力。^③修昔底德似乎认为历史写作的首要法则就是不折不扣的记载历史事实。这种历史哲学直接为后来的客观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

虽然后人对之评价极高，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部著作由于缺少历史细节，缺少故事性和生活性的描述而显得晦涩枯燥。于是乎，一个问题就产生了，他为什么要写这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生。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 2 页。

②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p. cit.

③ 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2007 年 6 期，第 7-12 页。

部著作，他如何组织材料？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位伟人的作品？涉及到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加深对修昔底德历史哲学的理解。

谈到修昔底德，就不能不谈到古希腊时代。这个孩童文明时期的学者认识世界方式极其特别，强调感性而缺乏对材料和叙述本身的反省与思考。正如黑格尔对古典历史学家的认识，“作家的精神和他记述的那些动作的精神，是一般无二的”。^①可是“修昔底德把希腊批判哲学的原理应用到历史写作中，这就是他最杰出的地方。”^②科林伍德认为修昔底德的历史学是一种心理历史学，即它不像希罗多德那样为了叙述事实而叙述事实，其目的是为了证实心理学规律。这种规律是支配各个事件之间关系的不变法则，具有永恒不变的形式。^③远观这位历史学家，我们得出的认识修昔底德的第一个逻辑：寻找规律的真知者。

这种认识的冲动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一个热衷于切实的认识过去，从中寻找规律并为未来提供有效指导的修昔底德式的历史认识论。但反观当下，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悖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并不能帮助人们走出历史悖论。历史之手将人们之灵魂握得紧紧，历史的悲剧不断在上演，历史并不因为人类技术、知识和文化的进步而让战争、野蛮争斗与歧视消失掉。

也正是这个困境让身处 21 世纪的我在资料室正襟危坐，重新审视古希腊时代伟大的智慧，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件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④

这段话如果放在启蒙时代似乎更加合适。但是修昔底德在公元前 5 世纪就开始重视证据的作用，他开始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批判地取舍材料，开始用他的智慧来加工、推断与评判，更加清晰地发现出他所能接触到的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 1999 年版，第 1-2 页。

②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 1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39 页。

③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 1 编，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64 页。

④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20 页。

历史真相。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使得当代客观主义历史学家为之所吸引，也让我得出了认识修昔底德的第二个逻辑：证据史观和理性史观。当然，这种认识如果让政治学家看到了会导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剪裁历史为自我服务的意识形态式历史叙事。

我开始有点兴奋，如接触启蒙思想家作品一般读起巨著。可是，那种琐屑的演讲词和让人生畏的人名、地名让我并没有享受到阅读的快感。气急之余，我将这本书合上，思考这本书的价值。突然之间，一段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①

仔细分析这段话，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因为他强调了一种“静”，因为人性总是人性，那么历史不也总是历史吗？如果历史没有借鉴意义，那么历史学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加入历史是一种线性进化，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在认识当代事件的时候总是要寻找历史文化根源，从这一段分析中我找到了认识修昔底德的第三个逻辑：历史认识具有终极目的性，而我的工作就是通过历史发现隐藏在背后的逻辑，从不相同、连续性的历史中发现相同的规律，这也许是修昔底德的写作目的吧。

可是激情是有了，但是如何去认识这本书？是否有一套方法论。思考之余，我看到陈新老师的一篇文章，他提到：

因果关系及其在史学中的利用是促使古希腊史学成就其辉煌的重要因素。它奠定了古希腊史学乃至西方史学意图进行历史解释的重心。^②

既然历史是已经发生的结果，那么历史学家提供了这些结果，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通过这些结果发现其产生的原因。而修昔底德也不例外，他在色雷斯写作的时候肯定是想让未来的我们理解他所阐释的规律。但是，他不便直接说明，于是他就用自己所发现的因果逻辑来编写这部历史，这不仅省略了很多他觉得没有必要的细节，同时也反过来指导他分析和筛选材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0页。

② 陈新：“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学术研究》，2001年04期，第111-116页。

料，将这些材料按照他的那种规律再次进行简化，这种双重简化产生的结果就是高度的理性和严密的逻辑性，伴随着是一种不变的因果关系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看到他所要说明的规律，就能把握其写作的内涵和筛选材料的方法。当然，这种认识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失于偏颇，因为不是所有历史都完全符合规律的，修昔底德显然有些独断。我从中发现了认识到修昔底德的第四个逻辑：修昔底德让历史因果律支配其著作。

既然他对规律了解如此透彻，但是他的材料从哪里来，他到底是如何组织材料的？由于修昔底德在叙事中从来不交代其史料来源，这让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对修昔底德史料来源的可靠性作出独立的判断。虽然他本人知道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获得的材料的局限性，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他所获得的材料大都是口述材料，而书面材料比较稀少，尤其是对演讲和对战争的描述，大都来源于亲身经历和别人转述。^①虽然他说：

听过的，还是其他人听过后告诉我的，我们都发现很难记得演讲的确切的原话。因此我的做法是，在尽可能保持实际讲话的基本意思的情况下，让讲话者说我认为他在当时情形下最应该说的话。^②

这种研究历史手段的方法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质疑，但是让我们得到了认识修昔底德的第五个逻辑：证据和材料符合修氏风格，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特性集中在于修氏一人之上，可以说了解修氏修辞和话语和修氏的情感，就能更好的理解这部著作。

与此同时我又看到了易宁先生的总结：

修氏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他揭示了客观历史自身存在的理性：历史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表现其发展的理路。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的本质就是人性。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无关，与道德理性背离。^③

也正如修昔底德借用伯利克里的话说：

① 关于对修昔底德理性历史构建的精彩讨论，参见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6期，第7-12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0页。

③ 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北京，2005年06期，第79页。

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①

可是我们看到人性在修氏的语境中展现出的是一种深刻的对立性；一方面，他发现人性之恶，这种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论述得到证明：

因为图利的普遍欲望，弱者安于忍受强者的统治；那些因为获得财富而势力强大的人则控制小城市。^②——对利益的诉求

照我看来，他之所以能够募集远征军进攻特洛伊的原因，不是由于同盟者对他的忠顺，而是由于同盟者对他的畏惧。^③——对强权的恐惧

古老的政体是世袭君主制，君主有确定的原则和限制；但是因为希腊的势力增加，获得金钱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僭主政治。收入增加，造船事业兴旺，于是他们的野心开始倾向于海上势力了。^④——对财富的渴望和对权力，领土扩张的追求。

（瘟疫发生之后）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这么迅速，这么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因此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放纵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是隐瞒起来的。^⑤

正如 P·A·斯塔特所指出的：修氏的人性说是以非理性的人性为基础的。^⑥人的非理性的本性是不变的，然而它又通过具体的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欲望、好斗性和情绪，或结合，或冲突，在不同的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人性的表现，其最终的动因也就是人性。^⑦修氏人性说，更多的展示的是人欲横流社会下的自私的本性。而正是这种自私的本性造成了很多事情的发生，造成了很多不幸的悲剧。这种认识让我总结出了认识修昔底德的最后一个逻辑：人性造成历史悲剧，希腊也不能避免。

虽然其笔调较阴暗，证明历史不幸的规律，但是矛盾却出现了。人类的无意识的理性总是能够推动人类历史向前演进，哪怕人性再肮脏，人类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16 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6 页。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8 页。

④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3 页。

⑤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60 页。

⑥ P. A. Stadter. *Historical Thought in Ancient Greece.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⑦ 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北京，2005 年 06 期，第 85 页。

彼此交流互动和社会的演进逐渐实现历史的真正进步。

在得到认识修昔底德的六把钥匙之后，我走进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英雄、国家与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分析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在第一卷中强调：

我首先说明双方争执的理由和他们利益冲突的特殊事件，使每个人都毫无问题地知道引起这次希腊大战的原因。^①

接下来他又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

使得战争不可避免的因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②

这个原因像极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范式对战争原因的探讨。正如肯尼斯·沃尔兹所说：

战争中没有胜利可言，只有不同程度的失败。不管人们怀着多么崇高的欲望，不管人们怎样孜孜不倦的致力于消除战争，换来的只不过是国家之间的短暂和平。^③

修昔底德正是看到了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用很大的篇幅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记录了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之间争吵的理由。他不仅注意到这场战争的背后原因，同时也注意到了引起战争爆发的远因和近因。他通过分析伊庇丹努争端、波提狄亚争端，逐渐将两个小的城邦国家科西拉与科林斯的斗争放大到雅典同盟与斯巴达同盟之间的斗争，并在伯利克里的影响之下，终于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可是，当我看完第1卷的时候，心中的疑惑仍在，我并没有感觉到我已经“毫无疑问的知道这次战争的原因”，也并不相信他把所有引起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讲了出来。英国古典学家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更是颠覆了修昔底德的“科学治史原则”的观念，指出“修昔底德没有告诉我们战争的起因，理由就在于：他从来不用，也不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1页。

② 同上。

③ 肯尼斯·沃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页。

能用清楚明确的语言提出该问题。”^①

如康福德所说，我们看到的第一卷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虽然不时出现一些能够引发人们思考的演说词，但是这些不是起因，而是借口与争吵。也就是说，修昔底德的第一卷中的内容只是给人们展现出了一种动态的战争爆发的过程，而其重要原因需要我们去发掘。

那么，我们如何去发掘战争原因呢？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给出一种系统的分析结构，从人性、从国家的内部结构，从国际体系进行分析。下面就是我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英雄与战争

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其作品《阿卡奈人》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段场景：

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玩酒戏喝醉了，跑到了麦加拉去，抢来了一个名叫西迈塔的妓女。想不到这一点鸡毛蒜皮，居然扫了麦加拉人的面子，惹动了他们的大蒜劲儿，他们反而抢劫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妓女。好，为了三个娼妇，战火就在全希腊烧起来了。我们的盖世英雄伯利克里勃然大怒，大发雷霆……^②

很多持有历史偶然论的观点的历史学家将看到这种情景自觉不自觉地将这场战争的爆发的原因主要归因于伯利克里。历史学家发现他野心勃勃，似乎想一挫斯巴达人锐气。布洛赫认为，伯利克里是由于感到其在国内的地位动摇，急于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还有诸如他有不想要别人知道的财政丑闻，不想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坏事件影响其个人地位而发动战争。这些观点被无数历史学家引用。^③

当然，虽然修昔底德非常清楚人性的是战争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在伯利克里身上，他首先驳斥就是这种观点。他很清楚表明伯利克里并没有因为战争而获得任何好处，反而通过他的口显示出其伟大的品格：

我爱我的城邦，不受金钱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能

① [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第54页。

② 罗念生译文《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第56-57页。转引自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英）《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第4页。

③ 关于伯利克里的有趣分析见于狄奥多洛斯第13卷，38页；普鲁塔克，《论希罗多德之阴险》，布洛赫的《希腊史》。

够安静的生活下去的话，那么，进行战争是绝对愚蠢的。但是如果被迫进行选择——不是屈服而马上变为奴隶，就是冒着危险以求生存的希望——的话，那么我宁愿做那个勇敢地冒着危难的人儿不愿意做那个逃避危难的人。^①

那么伯利克里是因为什么原因，作为雅典最有力量的人，呼吁大家参加对伯罗奔尼撒的战争呢？

经过反复的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伯利克里的内心思想出来。这个伟大的英雄人物犹如 20 世纪的美国理想主义者威尔逊，尝试用本国的理想主义原则缔造整个希腊的繁荣与和平。“伯里克利是不仅接受自身所处环境、而且要以自己的思想去塑造心中意象的罕见人物之一。”^②这种对世界改造的主动欲望也正是雅典人的整体特点：

（科林斯认为）一个雅典人总是一个革新者，他敏于下定决心，也敏于把这个决心实现。……其次，雅典人的勇敢常常超过了他们的人力和物力的范围，常常违反他们的善良判断去冒险。^③

（伯利克里）当我们的祖先反对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资源，就是他们所有的那一点资源，他们也放弃了，但是他们驱逐了外族的入侵，把我们的城邦建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由于他们的贤智，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物质力量。我们要学他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抵抗我们的敌人，努力把与平常一样的伟大的雅典遗传给我们的后代。^④

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宁愿你们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当你认识到它的伟大时候，然后回忆一下，使它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知道他们责任的人们，深以某种不达到标准为耻辱的人们。^⑤

这种主动性创造观念一直影响着伯利克里的战略。他将雅典的社会视为一个值得推广和改进希腊整体善的社会。虽然在希波战争与随后与斯巴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65 页。

② Donald Kagan, *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 136.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10 页。

④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17 页。

⑤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52 页。

达的冲突之中，伯利克里坚持和平战略与波斯和斯巴达媾和。但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国家不断发起小规模骚动和对科西拉的海权力量的渴望与维护雅典帝国万世永固的观念促使伯利克里开始转向与科西拉结盟，维护雅典的安全和抵制主战派上扬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可能的进攻。但是，这种追求绝对海权和绝对安全的思想并没有获得斯巴达的理解，伯利克里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特别是斯巴达经济形势的分析反映了他很不看好伯罗奔尼撒同盟维护和平的诚意，这位主和派更是坚信雅典的绝对实力，而这种信任导致其坚信战争可以解决一切。^①

谈到伯利克里之后，就不能不谈及斯巴达的英雄——国王阿基达马斯。这位英雄集中了许多斯巴达人的特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

至于迟缓和慎重——这是人家常常批评我们的——这毫不足以为耻。……迟缓与慎重和贤明与智慧是一样好的。无疑地，正因为我们有这些品质，所以只有我们在成功的时候不傲慢；在困难的时候，不合其他人民一样易于屈服。……因为我们有良好秩序的生活，我们在战争中是勇敢的，在智谋中是贤明的。我们勇敢，因为自制是以自尊心为基础，而自尊心又以胆量为基础。我们贤明，因为没有受到太高的教育，以至于鄙视我们的法律与风俗。^②

虽然斯巴达国王温和而又审慎，但是雅典对科西拉的吞并已经引起了盟友科林斯和国内主战派监察官斯提尼拉伊达等人的不满，这个崇尚武力和军事的国家在面对雅典维护自身安全上并没有十分的克制，可以说与雅典恰恰相反的情况出现了，斯巴达人民要求这位英雄走向战争，其口号是解放希腊：

为着斯巴达人的光荣！为着战争！不要让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不要完全出卖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前进，和侵略者会战吧！^③

二、民主与寡头——战争发生原因政治制度分析

谈到希腊城邦，不得不提到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斯巴达的军事体制。如果我们带着现代西方的政治意识来思考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时候，怕有

^① 关于伯利克里大战略的精妙分析，可以参见“灾祸伏于辉煌之中——对伯里克利大战略失败的政治文化解释”，《欧洲研究》，北京，2006年3期，第138-149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7页

^③ 同上，第69页。

很多人会认为这是民主制与寡头制度的较量。似乎这两种政治制度不能存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持有这种意见的极端主义者同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

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却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之上。它依恃的是恐怖与压制，控制着报章与电台，操纵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①

这种理解存在的致命的缺陷，它直接将政体与生活方式等同起来，虽然这种思维方式常常见于 20 世纪分析家的报道之中，生活在 21 世纪的我们怎能不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关于政体到底是不是发动战争的充分理由？军事寡头政体是不是一定比民主政体更倾向于战争？西方学者论述的结果之一是民主和平论。这里隐藏的逻辑是积极的和平只能在民主社会中才能存在。按照这种逻辑，民主的雅典发动战争的理想价值观之一就是迫使这个世界得到更多的和平。而斯巴达是本能的战争策源地。

但是，恰恰是在民主政治的顶峰雅典与斯巴达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这一冲突导致了古希腊的衰落。于是我们反向推理，民主制度与战争的关系是否还有另外一套逻辑——民主制度决定忍耐发动战争的限度。

如果是科学行为主义者，他们需要大量的数据，但是在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修昔底德给出了他的答案。

我们经常会因为斯巴达的严格的军事体制所恐惧。但斯巴达本身并不是一个傲慢或者穷兵黩武的城邦。^②斯巴达建立军事体制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对外进行侵略扩张，这可以从斯巴达的社会经济因素上得到解释。

斯巴达人自从征服美塞尼亚之后，当地农民全部沦为农奴，成为黑劳士阶层。斯巴达的繁荣可以说完全建立在剥削被压迫被征服的基础之上，这当然引起革命。于是，通过两次美塞尼亚战争，斯巴达人提高了警惕，黑劳士永远处于监督之下，而斯巴达人则从小就处于严酷的军营之中。来库古（Lycurgus）的立法之后，更是加强了斯巴达军事体制的因素。^③严峻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428页。

② [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第7页。

③ 其法律的主要内容是：来库古的口传约章（Rhetra）规定，斯巴达公民家庭新生的

的军营生活要求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商品货币经济会瓦解这种秩序，斯巴达人从此禁绝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交换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铁块……^①斯巴达的奴隶主阶级没有分化为经济利益不同的阶层，把青年训练成为雅典式的能够左右公民会议的政治家，远没有把他们训练成战士重要。^②斯巴达的重装步兵以公民为主力，但即使是如此其最盛时期也不到 6000 人，如此强大的陆权国家建立霸权的途径是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塑造出来的。

谈及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塞尔格耶夫说：“斯巴达的宪法，对斯巴达公民来说是民主制的，但是对附庸民族来说就是寡头制的。”^③斯巴达在国家形成之后，还保留着部落时代的长老会议，全民会议与其他制度。^④

长老会议	全民会议	二王制
年满 60 岁的氏族贵族，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	斯巴达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对国家和战问题进行表决，会议表决的方式是通过原始的欢呼鼓噪	一定的审判权，执行祭礼之权和作为军事首长的统帅权。

这种政治制度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斯巴达发动战斗的行为掌握在所有斯巴达的男性公民手中，虽然长老会议拥有最高的权力，但是公民的心态和情绪往往是决定和与战的关键。斯巴达贵族制度在战斗前夕迅速转型为民主制度，而这隐含了危机。

与斯巴达类似，雅典的民主制度在伯利克里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自从

婴儿要送给长老，经过检查，若认为不宜让他生存，就抛到泰革托斯山峡的弃婴场（Apothetae）。强健的可能长成为良好战士的婴儿才许养成人。青年人终年不穿鞋，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团队（Agele）里，从事体育锻炼，运动和学习语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奉命去做苦工，并且必须绝无抗议、绝无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领受一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他们依照斯巴达人的分地被规定 10 人至 15 人一组，向公民交纳实物贡赋——大麦、猪肉、酒和油。公民不得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必须参加公餐（Syssitia），不论贫富都吃一样的东西，每人交纳定量产物给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战士，平时都生活在按军事编制的集体里，军事操练一直不断。参见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4 页。

- ①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4 页。
- ② 吴于廑：《古代的希腊与罗马》，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 6 月版，第 35 页。
- ③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 162 页，转引自《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5 页。
- ④ 表格主要内容参加吴于廑著《古代的希腊与罗马》，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 6 月版，第 35 页。

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用地域原则的五百人会议代替了血缘原则的四百人会议，进一步巩固了雅典民主制度的成果，同时陶片放逐法的发明也缓和了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从此氏族制度在雅典残余力量彻底消灭。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成为雅典真正的主人。正如恩格斯在论及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时候说：

现在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制度建立于其上的阶级对抗，已经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抗，而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对抗，被保护民与公民之间的对抗了。^①

对比两种政治制度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在决定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时候，公民的力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往往拥有决策权。斯巴达公民在是否对抗雅典的力量做出了如下反映：

发言之后，他们是用高声呼喊的方式，而不是用投票的方式表决的。斯提尼伊达说，他不能辨别哪一方面的呼喊声音大一些。这是因为他想要他们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更加爱热心地主张战争。他说，斯巴达人啊，你们中间那些认为和约已经破坏而雅典人是侵略者，起来，站在一边。那些认为不如此的，站在另一边。他指出他们所要站的地方。于是他们站起来，分作两部分，大部分都认为和约已经被破坏。^②

雅典人的反映是这样的：

这就是伯利克里的发言。雅典人认为他的发言是最好的了，所以照他的意见表决了。对斯巴达人的答复——总的原则和各个论点——就是他所建议的那个答复：他们不愿在强迫命令之下，做任何事；但是愿意依照和约上的规定，在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之上，对于各项争点达到调解。^③

从修昔底德的两段描述来看，我们发现这种现场表决的方式是一种即兴条件下的迅速判断性决策，而且决策的主体是群众，同时决策之前所接收的信息是领袖的劝说和感情化的建议。这就很难让我们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斯巴达与雅典的相互冲突的关键不是制度的分歧，而是领袖意见的分歧与群众心理的作祟。

①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第114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0页。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7页。

三、战争与群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群众心理学解释

古斯塔夫·勒庞，这位法国的著名的心理学家，通过其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群众心理学的分析范式。当然，其著作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民主化趋势明显和群众力量逐渐显现的 20 世纪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我看来，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同样可以适用勒庞的群众心理分析，还是按照修昔底德的话说，人性历久不变，而悲剧却不断上演。民主社会不是和平的必要前提，却有着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掌握这种机制的领袖，就掌握了民主。^①

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将古希腊和斯巴达的决策群体分为两大部分：领袖与群众。首先我们分析领袖。按照勒庞的看法，群众领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且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一群人就如同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②

领袖具有以下几大特点^③：

1、他们拥有着了迷似的信仰观，对一种观念和一种情感的推崇超越了一切因素，甚至不惜为之牺牲生命的代价，这种对理想的坚定执着和奋斗不息提供了一种感染力。

2、他们善于动用情感的力量，将自己的激情毫无掩饰的表达出来，将自己的理性因素降到最低层面，他们将自己的利益降低为忽略不计，世界上值得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理想以身殉职，为此不惜一切。

3、他们熟谙巧言令色之道，有狂热性，并沉浸自己的理想之中，将之发酵与散发，影响群众。

4、他们是充满活力与意志坚强的人，意志力强大而持久。

如果我们将这些因素用在雅典领袖伯利克里和斯巴达的斯提尼伊达身上，可以很清楚明白这两个人一个是精力充沛，具有大战略思想并坚信雅典的城邦制度是绝对优秀和最好的制度；而另一个坚信斯巴达的军事力量，相信一个强大的民族是不会受到任何压迫与欺负的，相信对同盟的责任。具体的分析已经见于第一层次英雄与战争的分析框架。不过需要强调一点的是，雅典人善于修辞与论辩，其用词的精巧和准确是令雅典人树立

^① 关于这个观点的精彩论述可以参见冯克利先生的《中译者序：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见《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② 同上，第96页。

^③ 同上。

坚定信仰的关键，伯利克里杰出的演讲口才做到了这一点；而斯巴达人不重视语言艺术，讷于言，斯提尼伊达所依靠的是坚定的意志和强烈的“崇高的情感”，也只有情感共识才能顺利实现意见领导。

而本节主要分析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的群众。这里的困难在于我们并不了解其中一个雅典公民或斯巴达公民对这场战争是否发动的看法。但是从决策的结果来看，显然大部分公民已经支持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只能用历史进行想象，为什么他们会支持这场战争？

雅典和斯巴达的巨大不同在于，经过理性分析锻炼的雅典民众和经过纯粹军事训练的斯巴达民众作决策时所依据的理由并不相同。但从领导人双方的立场来看，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与斯巴达人荣誉与利益。如果这件事情放在 21 世纪，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但是认同政治和城邦主义在那两个城邦能否得到准确的展现，也就是说，当时是否存在着一种接近于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主义情结”？

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存在的。这可以从两个城邦的特性和领袖们对特性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城邦本身的感情认知得出结论：

（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发言）这是我们的成就。我们在马拉松抵抗波斯人到底，我们是单独对付他们的。……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三个方面重要的贡献，我们提供了最多的船舰，我们供给了最有才智的将军，我们表现了最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我们表现的勇敢是无比的。……三个重要的动机使我们不能放弃：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我们也不是首创这个先例，因为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①

（伯利克里葬礼上的演说词）我们爱好美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做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的东西。^②

从这两段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典人对于自己的认同，即“我们”的特点和荣誉是具有极高的理性总结，而作为一个雅典人，他们知道他们的责任是不能放弃自己利益，这种对政治生活和战争的极度热忱不仅来源于希波战争，更是来源于古希腊人对政治的认识。^③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9-60页。

② 同上，第149页。

③ 关于古代人对自由民主的认识可以去参见贡斯当的文章《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

相比之下，斯巴达人很少在演说上展现出自己对城邦的喜爱与向往，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斯巴达人恐惧和没有城邦认同感。这是因为斯巴达人有着自身的品格：

在斯巴达，从男孩那里比从石像还难得听到声音……男孩比女孩还要娴静。^①

虽然斯巴达人对修辞和演讲所下的功夫不够，但是从斯巴达国王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斯巴达的特点和精神，即对战争的崇高尊敬和尚武精神。

这些词汇和情感在两个城邦的公民心中塑造了对立和高大的雅典和斯巴达形象，哪怕是政治制度也不可能共存，群体出现英雄史诗般的战场胜利的幻觉，以及希波战争中胜利的经验促使他们开始“蠢蠢欲动”，他们不再需要那种平静的单调的生活了，他们需要一种战争的浪漫，这种浪漫衍生出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精神，它充入大脑，使指导着两个强大城邦公民的领袖们的决策无法控制，正如勒庞所说：

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人，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②

四、城邦政治的悲剧——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国家层次分析

修昔底德注意对人性和行为的感性分析，而国际关系学者更加注重对社会和国际体系的理性抽象分析。如果让一个现实主义者来寻找战争原因，他的结论一定少不了无政府状态下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分析逻辑。当然，希腊城邦国家不是主权国家行为体，在很多方面这种分析有种生搬硬套之嫌，所以我们首先就是对希腊城邦体系进行国际社会式分析。

很明显，如果我们把希腊当做一个小世界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就是所谓的“城邦大国”。顾准先生认为，在希波战争之后，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基本上是以希腊本土这两个强大国家为中心的历史。^③当然，他也强调这两个国家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的最高政治权力，同时许多边远

① 塞尔叶格夫：《古希腊史》，第164页，转述色诺芬的话。

② 见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94页。

③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的城邦如西西里、利比亚等诸邦根本从未处于这两个国家的统治之下，它们保持自己的独立发展。^①这说明了一个结论，也就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希腊城邦所构成的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之中，而这种无政府状态有其独特的特点。

在无政府的状态中，套用经典的现实主义观点，每个城邦国家都是自助自在的个体，国家追求生存，安全与权力。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受到的外界干扰远远小于内部的扰动，整个国家社会构成了一种霍布斯式与洛克式交替进行的国际政治状态，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和平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因此，从权力分配的角度考虑，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很可能导致战争。修昔底德在开篇也就指出了“雅典权力的增强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的造成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的原因仍然深深地植根于敌对国家政治家的观念中以及对可能自身受到限制的恐惧里。”^②这种典型的安全困境不仅见证了美苏之间两极对抗，也见证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两个超级城邦国家的对抗。按照这种逻辑，很明显是因为“主导国”雅典在扩张自身实力的时候引起了潜在的“挑战国”陆权大国斯巴达的恐惧与不安，因此，潜在的“挑战国”想通过一场转型期的战争来改变这种政治格局，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权力转移时候，彼此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观立场存在满意和不满意的心理效应，这种心理效应强大落差引起这场巨大的战争。^③

这种权力转移理论有效地给出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动战争原因的解釋。同样安全困境与博弈论解释力也很强大，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经济因素，吴于廑就在其著作中指出，斯巴达和雅典的矛盾，是希腊城邦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④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能够爆发，其经济因素和国家利益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我想谈一下工商业奴隶主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心理对雅典和斯巴达发动战争的作用。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我们就能发现雅典不是位于一个岛屿之上，而是位于半岛之上，这种模式意味着雅典也存在着土地贵族。虽然雅典是民主

① 对这一段历史精彩的论述参见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序言部分，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② Michael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

③ 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北京，2006年3期，第39页。

④ 吴于廑：《古代的希腊与罗马》，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6月版，第38页。

政治，但是大多数穷人对民主制度影响并没有贵族对民主制度的影响程度大。这些穷人很大程度上利益分散化，但是却趋向于一个共同的行为就是利益。而贵族则不同，他们已经有自身利益，对战争爆发到底能够促进利益还是削弱利益有着不同的认识。自从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在修葺自己的防御同时不断加强海外扩张，可以说这时候工商业主要力量正在成长，并成为贵族中主要力量，土地贵族并没有发挥多大的影响，这些安土重迁的贵族们关心的仅仅是输送自己的粮食和农产品到城市并获得巨大的利润。所以套用狄开俄波利斯的话来说：

我徒劳地想望着庄园，
我厌恶这座城市，渴望和平，
渴望返回着我那贫穷的村庄和我的农场，
在那里从来不用大声招呼“过来买我的木炭”，
也不用喊“买我的油”，“买什么什么东西！”
我想要什么就给我什么，自由而且公平，
从来不用“买呀”、“买呀”这样的词。^①

这些不关心商业的土地贵族们从来不关心商业和海权。同样，在军事共产主义的斯巴达城邦，土地贵族的观念更加严重地影响斯巴达政治。但是，与雅典不同的是，斯巴达的土地贵族占据统治地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雅典人对科西拉的这个要求加入同盟国的第二海上大国的重视和保护，也可以看到斯巴达人对雅典的攻击被公共舆论称之为“解放希腊”，而不是恢复现状。

以上这些层次从英雄、制度、群众、国家与社会的角度解释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虽然各个层次分析的先后不同，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有主次之分，它们都对伯罗奔尼撒的战争的爆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经典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正是将这些要素一一叙述，从各个侧面揭示了战争的各种因子，正是他的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构建出一幅宏大的西方冲突论思想，也为两千年来的西方思想家提供了无尽的资源。

（责任编辑：赵舒婷）

^① 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转引自[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第17页。

读《大外交》有感

——从历史视角看政治领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华盾*

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说,可谓“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的一把钥匙。像亨利·基辛格所说:“历史虽然不能为我们提供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是了解迄今为止的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兴衰,是现代政治领袖面临挑战时唯一可资借鉴的经验。”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婴儿”,我这学期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中畅快遨游。其中,亨利·基辛格所著《大外交》给我带来了许多感悟、理解和启迪,将掌握历史与理解当今相结合,我收获良多。

《大外交》纵论古今,接视万里,洋洋近 70 万言。^①它为我们展现了从十七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到二十世纪末冷战后世界的历史画卷;从近 400 年的历史描述中基辛格为我们展现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理解,富有深刻的政治理论启示;它糅合了理论演绎和个人实践经验,充分展现基辛格本人深赋欧洲气质的现实主义思想。亨利·基辛格是 20 世纪最富盛名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而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大外交》则是他的代表作品,凝聚着其长期从政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堪称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②

《大外交》这本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而阐释出不同的意义来。对于我来说,我格外关注书中重要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几个关键时期的政治领袖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大外交》采用了传统方法,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了深入细微的政治-历史描述,追求对事物本质的直觉把握,基辛格对政治领袖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独到理解,是我收获最大的地方。站在历史节点,从历史细节感悟政治领袖;透过历史人物,理解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静览沉思过后,心中便荡漾起历史启迪的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生。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页。

② 同上,第 1 页。

涟漪。

一、黎塞留与俾斯麦 ——现实主义政治大师的伟大与遗憾



中世纪的欧洲完全笼罩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宗教教会的影响极为深重。直到宗教改革，教皇权威式微，建立欧洲统一帝国的希望破灭，民族国家逐渐兴起。与此同时诞生的反传统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国家至上（raison d'état）及权力均衡这两个观念。而在那个时代这一观点的实践者就是枢机主教法国首相黎塞留。

少有政治家能像他一样对历史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黎塞留是现代国家制度之父。他提倡国家至上的观念，并为了法国的利益义无反顾地付诸实施。在他的倡导之下，这个观念取代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成为法国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他的初衷是着眼于防止哈布斯堡王朝独霸欧洲，留给后世的却是一段传奇。引起后两世纪继他而起的君主企图建立法国在欧洲霸权的野心。这些企图一一失败后，均势逐渐成形，最初是事实如此，后来则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系。^①

黎塞留之所以被基辛格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和概括，最主要的是他在那个时代提出了“国家至上”的思想。在一个神权世界中，他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看得比任何宗教目标更重要^②；身为法王的首相，他把宗教与道德均置于个人最高原则“国家至上”之下^③。而这一政策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正确评估权力关系。^④厉害的是黎塞留对赢得这一挑战的能力满怀自信，他对其目标认识得十分透彻。^⑤黎塞留在三十年战争中，终止了法国深陷重围的险境，耗尽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他根据是否有利于法国的利益进行结盟，拖延战争，援助敌人的敌人，贿赂、挑起叛乱，后来阻挠德国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50页。

② 同上，第50页。

③ 同上，第55页。

④ 同上，第54页。

⑤ 同上，第54页。

的统一。

他的种种做法，在当时的宗教道德面前是无法容忍的，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黎塞留开创了现实主义外交的先河，使“国家至上”的原则逐渐成为欧洲外交的指导原则。倘若政治家的政绩是以其是否达成自定的目标为准绳，则黎塞留必属近代史开创划时代新局的大人物之一。因为他留给后世面目一新的世界，并奠定法国后三百年的政策。按照基辛格总结的话就是，“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与宗教束缚的政治家。”^①

在一战之前的欧洲，能与黎塞留站在一个层次的人，我认为只有一个人。他打破了黎塞留创立的均势使德国统一，又同时维护着欧洲均势，他运用与黎塞留同样的现实主义把权力均衡玩弄自如，他为大权在握和自我约束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他就是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比较两人可见其极其相似：黎塞留虽身为枢机主教，却会因法国利益的需要而反对同样是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俾斯麦虽个人思想属保守派，但当保守派的正统原则有可能限制到普鲁士的行动自由时，他就会与保守派大佬们分道扬镳^②。俾斯麦统一了德国后，在欧洲地图上纵横捭阖，远交近攻，他排挤了奥地利，与法国结好，与小国结盟，维持着欧洲的均势，为欧洲和平的大局，操持着欧洲各国的承诺与利益。



《大外交》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在指出现实大师成功的同时，发掘出了其中蕴涵的反效果。黎塞留的遗憾是他提议的国家至上观念没有预设的限度，有玩火自焚的风险。黎塞留留给后世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法国、分崩离析的弱国普鲁士，以及积弱不振的邻国西班牙。但路易十四却无法安于此种安全形势，他起了征服的野心。他无节制地追求国家利益，令其他欧洲国家提高警觉，结合组成反法联盟，最后粉碎了他的企图。^③同样的，俾斯麦给其后继者提供可循的蓝图，他留给德国的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德国外交建构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留下的传统。所以，俾斯麦的遗憾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漱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57页。

② 同上，第113页。

③ 同上，第57页。

程度。

这一观点，是我认为基辛格在描写政治人物上格外出色和精彩的。他不仅仅写政治领袖如何带领自己的国家发展强大，还看到了他们的不足。就像他在书中说的，“成功往往令人极难以捉摸，因此政治家在汲汲营营于追求成功之际，很少会考虑到成功可能带来的反效果。”^① 这一点的提出，引发了我对历史的更深思考：领袖的成功与失败，在历史长河中也显得如此之渺小，不论是多么伟大的历史人物，历史对他的评价永远是公平的。在历史中，永远没有完美。历史也就是在这样的你成我败、昔负今胜中完成自己的一个又一个轮回。

二、罗斯福与威尔逊

——是谁塑造当代美国的外交性格



基辛格的《大外交》可谓是一本美国外交专著。他着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世界事务的威尔逊主义，以及此后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全球外交。在基辛格看来，威尔逊主义代表了美国外交思想，以及此后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全球外交。二十世纪美国外交的得失，以及深深打上美国烙印的本世纪全球政治利弊，都与威尔逊总统所彰显的这种道德主义外交紧密相关。^②

在二十世纪初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是倾向孤立主义的。在美国走向国际事务时，老罗斯福总统和威尔逊却采取相反的理念，结果和影响也不尽相同。那么为什么是威尔逊塑造了美国的性格，而他又是靠什么塑造的呢？

先说老罗斯福总统，他是分析均势的好手，他坚信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是基于国际利益需要^③。他是首位坚持美国有义务让全世界感受其影响力，且应给予美国与世界产生关联的总统。他与前人不同的是，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18页。

② 同上，第2页。

③ 同上，第22页。

他认为除去不介入的利益之外，美国还有真正的外交利益存在。老罗斯福的前提是，美国跟其他强国没有两样，她不是独一无二的道德化身。^①本着现实主义的原则，老罗斯福实行门罗主义，在西方推行强力外交。他否定国际法的效力；他不屑于当时国际的裁军；他相信“势力范围”代表时势的自然法则。老罗斯福了解在当年主导世界局势的国家之间，国际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并对国际体系的运作颇有见地。他的成就在一百年后固然受到肯定，但是左右美国思潮的却不是他。

与老罗斯福相反的，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是基于弥赛亚式的理由扮演国际角色的，美国的义务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原则。威尔逊率先倡议成立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而非结盟来维持和平。虽然他未能说服美国民众接纳此议，但这个构想仍未夭折。最重要的是，自威尔逊关键性的任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②威尔逊是美国独树一帜的传统代表人物，他开创了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主流学派，而这一派的主张在老罗斯福看来，最多只能说是无关紧要，弄得不好反而有害美国的长期利益。^③但是最终引领美国思想的，真正握住了美国外交动机主要脉络的确是威尔逊，这又是为什么呢？

基辛格的解释是：“最根本的一点便是，美国完全不把自己当一般的国家看待。美国既缺乏欧式外交的理论基础，也欠缺务实经验。……不论权力政治的理论及教训为何，美国人民始终不变的信念是，实践及发扬民主自由是美国与众不同的根源。”“只有以符合这种美国不同凡响的观念为号召，才能促使美国人采取伟大的行动。无论老罗斯福的主张在理智上如何吻合强国之间实际的外交往来，他的理念并未能说服美国人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是威尔逊用充满道德意味的言论感动了美国大众，虽然这在外国领袖看来相当令人费解。”^④威尔逊排斥权力政治，却知道如何感动美国人。他在宣战演说中是这样感动美国民众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将这个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带入战争，带入最恐怖最惨痛的战事，而文明本身似乎正处于平衡状态。但权力比和平重要，我们应为自己素来最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0页。

② 同上，第22页。

③ 同上，第35页。

④ 同上，第35页。

关切的事，为民主，为受制于权威者对政府的发言权，为小国的自由及权利，为全体自由民族结合在一起而战，一直到所有国家均可享有和平安全，终至为世界自由而战。^①”就这样，美国在这种以民主的道德圣战的感召下，开始走向更广大的国际舞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终于扮演起威尔逊当年所设想的角色，做举世的模范供人效法，做举世的希望供世人去追求。

这让我想到，就是这种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一直影响美国，当今的奥巴马也不例外。2009年奥巴马访华，在和上海学生交流时就强调这种普世价值观。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依然沿用这种理想主义在这件事上可见一斑。另外，我感受颇深的是，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理想主义来加速崛起的进程，或许理想主义是崛起的思想关键，因为他能够把一国理想赋予世界涵义。我们中国在崛起的冲刺期中，是否也需要一些理想主义元素？是否也应当为我们的崛起赋予一定的世界意义？这些问题值得我国领导人、学者积极进行思考。

三、希特勒与斯大林

——个性左右历史，英雄造时势

领导人的责任便是要对自己就局势发展的方向以及个人可如何左右这一发展做判断，必须有信心，并据以采取行动。^②



个人在历史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尤其是具有独特个性的领导人，当他们拥有绝对权力的时候，能给历史带来不凡的影响。

也许因为基辛格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长大后又受到纳粹的迫害而移居美国，他在书中对希特勒的个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深入透彻的揭露。他说，“希特勒的崛起代表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③他还补充道，“之所以会演变成一场充满杀戮与毁灭的人间悲剧，全都是一个恶魔般的人物造成的。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26页，第39页。

② 同上，第127页。

③ 同上，第280页。

①”足可见基辛格对于希特勒的个性左右历史的“肯定”。基辛格是这样描写的，希特勒以他善于煽动的口才爬上高位，以煽惑人心的鬼才一飞冲天登上德国领导人宝座。希特勒是草莽英雄，但对心理弱点把握得奇准无比。他总是游移不定、坐立不安，全凭直觉办事，并非理性分析。他在《我的奋斗》中曾写道：“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在永恒的和平中毁灭”，表现他害怕和平，渴望战争的心理。希特勒这样危险的个性加强了德国在强大之后的复仇力度，1933年德国永久退出裁军会议，一周后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初，重整武装……直至1939年闪电突袭波兰，引发二战，酿下不可收拾的残局。

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是自社会边缘起家，他花很长时间取得权力，然后就深入俄共官僚体系内部清除异己，终至大权在握。斯大林将他早年在宗教训练中学到的严格诘难法，应用于冷酷的俄共世界观的演绎，并将意识形态转换为政治控制工具。他个性过于偏执，极其在乎结果的胜利远超过对一时掌声的期待，而且宁愿以逐一摧毁所有潜在敌人的方式达到目的。这一点倒是和中国古代的帝王，比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些相似。他有无比的细心，他时时刻刻不忘仔细研究权力关系，再小的细节也不放过。正因为斯大林深信其政治思想代表历史真理，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追求苏联国家利益，全不受在他眼中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包袱或感情因素所阻碍。②他作为苏共领袖，表现出冷酷坚持，不讲温情，对其历史使命坚定不移，也决不为传统的理念，尤其是非共产党所提的传统主张而动摇。③令人叫绝的是，斯大林这位意识形态高手，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务。斯大林是个热情的革命家，但更是个冷静的谋略家。④因此，他的偏执本性充分表现在他将所有可能的敌人消灭殆尽，更让千百万人因被他无中生有疑为有反叛之心而遭杀害或流放。然而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不愧是最冷静的算计者，并极以不受挑拨不轻举妄动而自傲，尤其是对各种势力的相互关系了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80页。

② 同上，第310页。

③ 同上，第312页。

④ 同上，第317页。

解程度，被他十分看不起的资本主义领袖都无法影响他。^①

过多的历史不必重复，但是我却从基辛格对这两位政治领导的独特个性的描写中，确确实实地感到了领导人的个性对于历史的影响。在一个时期内，一个民族的领导人尤为关键，他可以励精图治，国家富强；也可以玩物丧志，丧权辱国。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领导人的个性，他的素质决定了国家的发展。尤其是要实现国家的崛起，使国家富强，这对于领导人的要求是极高的。回看中国历史，九百多个皇帝中留下丰功伟业的、能被世人铭记的屈指可数。当历史需要英雄时，优秀的政治领袖就会成为英雄，从而影响历史。

四、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胜者王侯败者寇，时势造英雄

冷战的结束是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亨利基辛格也为这二十世纪末最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给出了他的解释：

这项重大变化是在两个似乎不太可能的合作对象的庇护下展开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笃信最后胜利属于自己这一方。然而这两位意想不到的合作伙伴之间还有重大差异：里根了解他的社会之主流脉动，戈尔巴乔夫则毫不了解。两人都求助于其制度最佳的部分。里根借由释放出主动创意和自信的力量，解放美国人民的精神；戈尔巴乔夫却以要求苏联进行做不到的改革，加速催动他所代表的制度死亡。^②

书中对这对既是对手也是合作者的两个人进行了极为细致的介绍，从中我们再一次看出政治领袖的个性是如何影响历史发展的，同时又怎样受到历史的局限的。



苏联阵营的分崩离析在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已现迹象，到他即将卸任时已经大事底定、不能挽回。在里根之前的几任总统功不可没，紧接着是入主白宫的布什总统，技巧地导引着苏联的寿终正寝，亦有一份功劳。不过，真正发生扭转作用的却是里根。^③里根的表现可谓令人咋舌，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14页。

② 同上，第738页。

③ 同上，第740页。

无懈可击。演员出身的里根对历史几近一无所知，而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却被他用东删西添，支持其坚强的定见。里根或许只具备若干基本概念，但这些概念凑巧都是他所处时代之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他特殊的直觉能紧紧扣住美国人兴趣的泉源。基辛格在书中写道，里根和威尔逊总统一样，知道在美国历史上，美国人都照着自命与众不同的例外主义之节奏进行，他们势必将在历史理想上找到最终的启示，不会在地缘政治的分析上寻找它。^①里根可谓是把威尔逊主义发挥至极致，美国没有消极坐等自由体制的演变产生，也不划地自限。里根总统这样的特点使得他实际的做法也极为直接且深具杀伤力，他做出了结束冷战最重要的两个战略决定：北约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以及美国承诺投入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这样，里根政府对苏联制度施加的压力极大成为了冷战未继续下去的部分原因。里根也由此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在冷战两极的另一极那里，基辛格的开场白却如此黯然：“戈尔巴乔夫是自列宁一脉相传下来的第七任苏联领袖，它生长在苏联权力、声望空前鼎盛的时代里。可是他命中注定要为此帝国送终，戈尔巴乔夫一九八五年掌权时，他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袖，可是其经济与社会状况已败象显著。一九九一年他黯然下台时，……彼得大帝以来历代俄罗斯统治者血腥征服组建的帝国已四分五裂。”^②苏联这硕大的伟大的帝国就毁在了这个人的手里……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也确实与以往的苏联领导人不同，他缺乏前人的强悍作风。苏联的政治高层不容许软弱的情形，当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反映出混淆并且目标性不强时，他的地位开始下降。最后，他缔造了当代意义最重大的一场大革命：他要促成现代化，不是自由；他想要苏联共产党与外在世界接触，不要固步自封；可是，他却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的那种制度的覆亡。^③戈尔巴乔夫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他的动作太快，也太慢；太快，因为他容忍其制度，但又太慢控制不住不断加速的瓦解。^④最终，苏联人民怪罪他在任期内肇致重大灾难，民主国家已忘了他，而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742页。

② 同上，第759页。

③ 同上，第761页。

④ 同上，第772页。

且他无法保持住权力宝座也让他十分难堪。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性——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毕竟是历史，它永远都有一个胜利者，而另一个则黯然离去，只留下无奈的叹息。然而，或许戈尔巴乔夫不该受如此的贬抑，因为它继承了一套真正棘手，甚至可能无法克服的困难。对于苏联政策变革的步伐经常是极其缓慢的，正如基辛格的一句比喻所言：“大国的政府好比是一艘十万吨的超级大油轮，掉头转身的半径面积至少就数十英里。”^①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偏偏不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就连 89 年在中国与中国改善关系时还遇到了中国的学潮，无果而终。虽然最后是失败下台，他肯面对苏联的困境也是值得嘉许的。也许，英雄根本就不会出现在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冷战后期的苏联不是一个诞生英雄的土壤，戈尔巴乔夫也只能怪罪自己生不逢时了。

冷战获胜，当然不是哪一位总统的成绩，他是美国两党四十年努力之功，也是共产党积七十年僵硬之果。里根现象乃是个性与机会偶然结合的结果。早了十年，它会被认为太逞强好胜；晚了十年，又似乎太偏执一途，毫无折衷。里根所做的正好是苏联衰弱并出现自我怀疑心态的时期所需要的对策。需要英雄的时代总会有英雄出现。基辛格在冷战结束这一章中，流露出的时势造英雄的史观也为整本书的末尾部分染上一丝淡淡的无奈。

五、结语

亨利·基辛格著的《大外交》浸透他本人的外交哲学，把历史活脱脱地展现，让其中的政治学理论熠熠生辉。我也基于自己的理解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领导进行感悟与思考，品读到历史与政治的魅力。在伟大的政治领袖背后同有遗憾；只有优秀的领导人，才能依照适合其本国的思想与意志引领国家走向富强；政治领导在历史中如此关键，能够左右历史的发展，但个人的影响永远会受到历史的局限……若再有时间，惟望独自几夜再读《大外交》，深思静览，随阅历和知识的丰富，必有更多的感悟与启迪。

（责任编辑：李括）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763页。



索契——被绑架的白雪公主

“当你跨进体育的门槛时，政治就抛弃在门外了。”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曾如此评价奥运会的伟大。但是这一梦想，对于残酷的国际社会来说如此脆弱，美好的情感总是遭遇冰冷事实的绑架。当地时间 2014 年 2 月 20 日，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盛大开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即便人们想忘记这个世界的纷繁复杂，但是本届冬奥会仍然不可避免的，被贴上众多的政治标签。

索契冬奥会至今占据国际媒体视线的新闻，并非体育本身，而是围绕着开幕式展开的大国外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出席开幕式，就引发了诸多的政治联想。中国媒体指出，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在境外举行的大型体育赛事，同时也是习近平连续第二年选择俄罗斯作为首访国。在西方媒体不断报道索契冬奥会负面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开幕式，国际恐怖组织发出安全威胁的背景下，习近平的举措无疑是对俄国总统普京的有力支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出席开幕式，更让索契冬奥会增添大国外交的色彩。中日两国起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主权纠纷，已经扩大到靖国神社参拜的历史旧恨，以及双方在军事武备和国际舆论上的针锋相对。中国官方自参拜风波后已经公开表明，拒绝同安倍有任何来往，安倍前往索契，一方面固然有拉拢强邻俄国，避免自己在东北亚陷入外交孤立的考量，另一方面更不排除他试图借习近平也在场之便，伺机取得中日领导人接触甚至对话的外交突破。

俄国与西方世界近期的外交博弈，同样波及索契冬奥会本身。普京之前在叙利亚内战中突然出手，在传出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触犯奥巴马所划下的动武红线，而华盛顿又举棋不定之际，介入并成功调停，抢尽了美国的外交风头，已经让美俄产生嫌隙。俄国与欧盟在乌克兰入盟上的博弈，进一步加深了莫斯科同西方世界的对立感。俄国去年底通过立法把同性恋入罪，立即成为了西方媒体攻击普京的焦点。这场以人权为号召对普京的

口诛笔伐，在冬奥会开幕前仍然方兴未艾；一些西方运动员更准备在赛会上，用不同的方式抗议和表达对同性恋者权利的支持，势必越发突出本届赛会的政治性。

纵观现代奥运会的历史，可以发现当赛会的政治意味盖过体育精神时，往往都是世界处于某个大时代转折的敏感时期。二战前的柏林、东京的日本和其所带动的亚洲复兴、莫斯科的冷战高峰、中国的北京和其所带动的亚洲崛起，人们对于时事的关注，最终难免要投射到这项主要的大型国际体育活动上。索契所反映的时代性究竟是什么，或许要等未来的历史学者做出诠释，但全球化、金融危机、美中势力消长、多极国际秩序的转型，甚至是国内观众的价值取向，都注定索契无法自外于历史洪流，单纯地让运动员一较高低。

“当你跨进体育的门槛时，政治就被抛弃在门外了。”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口中的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要求，还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或者仅仅是一个对纯粹体育精神的信仰？纵览以往各界奥运盛会，是否如此大规模的体育运动真的能够摆脱政治的枷锁？回顾 2008 年的北京奥运，斯皮尔伯格因为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态度而辞去开闭幕式艺术顾问一职；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曾经鼓吹抵制北京奥运会，但后来为了宣传东京申办 2016 年奥运会，他又主动要求担任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等等。再看刚刚过去的索契冬奥会，各国元首出现在开幕式的现场并不仅仅是为了体育的精神。西方多数大国元首的缺席，安倍晋三的出席，再到习近平主席力挺普京，中国元首第一次出境出席大型体育活动等等，奥运会对于这些政治家们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博弈的大舞台。当索契奥运会开幕式上“五环变四环”的技术故障已然被人们认为是俄罗斯针对美国而故意为之的时候，我们知道政治对奥运的纠缠已经是人人安之若素的平常事了。

——王韵涵

当李坚柔戏剧性地冲过女子 500 米决赛的终点线时，所有人都在为中国这枚幸运的金牌而欢呼。我们可以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幸运总是眷顾默默付出的人”“上帝是公平的”等等理由为这个幸运的奥运冠军庆祝——是的，是奥运冠军，中国体育界最引以为傲的产品。这件产品是举国体制这条流水线上最标准化的模板：在一个项目上，用纳税人的钱集中

力量培养一批专业人才，聘请国外高水平的教练，在短期内出成绩冲击冠军。不同的是，有些项目渐渐成了优势项目，比如短道速滑，有些则仅仅是昙花一现，比如女子冰壶。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它都只是流水线上没有生命的产品而已。作为选手个体，取得或幸运或理应的成绩固然是对于辛苦付出的回报。但是，作为整整在这条路上走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体育界，没有生命的成绩只是逸散的流云。

体育的生命是什么？不是领队李琰在巨大压力下收货意外金牌后的喜极而泣，不是五星红旗辉映着金色奖牌，满足所有看客虚荣心的举国狂欢，而是一个选手无论成绩如何，都一样由衷热爱着自己从事的运动，在生命中无数的惬意与难熬里，将它视为依靠，视为伙伴，并以此感染身边的人们，投入到这肢体与思维最美的交响乐章之中。让体育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比无数块金牌更有价值。

——席天士

当索契冬奥会行将闭幕时，站在场地中央的吉祥物北极熊留下了令人动容的泪水。这不由得想起34年前的一幕：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吉祥物，一只名叫“米莎”的熊，同这只北极熊一样憨态可掬。然而时值冷战，由于苏联侵阿，中美等多国抵制了这届奥运会，许多优秀的运动员无缘这一盛会。

奥运本应是崇尚和平、远离政治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总为政治、经济利益所左右。决策者们关注的核心总是自己的政绩工程与政治收益，而真正的主体——运动员和观众们，却往往被选择性忽略。当我们还在为多少位政要出席而谈论不休，还在为开幕式是否彰显普京的雄心壮志而津津乐道，那只能说明我们与可爱的“肉食者”一样在把奥运复杂化。

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总结时依然不乏溢美之辞，但“这是一届运动员的奥运会”的评价却最为中肯。简单是一种智慧。也许奥运终究不能成为纯粹的体育赛事，但我想决定权始终在人类自己手里。若有一天我们的国际环境容许我们能够简单地欣赏奥运，而不再将之与国际政治挂钩时，我想我们的学科就实现了它的最终价值。

——杨一帆

作为一名喜欢看热闹的伪体育迷，对大型赛事诸如奥运会一类总有特

别的兴趣。据说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小西良幸能从奥运代表团服装看出一个国家政治发展进步与否，从奥运会开幕式到赛事组织，从运动员赛场比拼到各国媒体报道，短短十几天奥运会也成为世界人民吐槽盛会，感受另类世界大同。追踪本届索契冬奥会，颇能联系北京奥运会的种种心情。开幕之前遭遇西方媒体抵制，开幕后媒体抓住那朵未展开的五环尽情戏谑而根本不去仔细体会俄罗斯砸下重金搬出门捷列夫和国粹芭蕾舞未来主义各种手段展现的俄罗斯伟大复兴之路的激动心情。出色赛事组织、严密的安保也挡不住国际媒体揪住冬奥会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不放。对比伦敦奥运会种种奇葩事，不由得感慨转型国家总是出力不讨好啊。可能出于北京奥运会遭遇西方抵制的同感，央视新闻在播报索契冬奥会时不断点赞。好在战斗民族有一颗强心脏，闭幕式上故意再次制造“残缺”五环，敢自嘲也可以创造奇迹。

——赵舒婷

索契冬奥会如同一本红楼梦，包罗万象，各位看官都能从中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体育迷们看比赛，经销商们抢广告权，政治家们则研究其中的勾心斗角，而且后者看上去更受追捧。

应该说，任何一件盛大的国际活动都有可能成为某一种噱头的开始，人们相信阴暗，而忽视阳光；人们咬定阴谋，而遗忘竞技。尽管纯粹的精神对于丛林式的国际社会显得如此飘渺，但是仍然有那样一群人相信，每一次的国际聚首，都会为未来的美好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承认这个世界的残酷，但是我们也同时拥有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期待，潘朵拉虽然将“希望”压在魔盒中，但人们却从未失去寻求它的动力。

——王晓笛

（责任编辑：王晓笛）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

——乔治·奥威尔，英国作家和记者。《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是其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

任何太过强大的军事政府对自由都是一种威胁，尤其对共和制度下的自由产生极大威胁。

——乔治·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任大陆军总司令。美国开国总统，被美国尊称为“国父”。

人拿起武器可能是因为微不足道的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也没有，而一旦拿起，对法律、对神灵、对人类的敬重便荡然无存。

——雨果·格老秀斯，荷

兰法学家兼哲学家，因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被后世尊为“国际法之父”。

在法律上，一个人若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他就有罪。在道德上，一个人若只想着侵犯他人的权利，他就有罪。我们越是谨慎，良心受到的谴责越大。有条理的知识即科学。有条理的人生即智慧。就像你的行为原则会被定为全世界的准则那样行事。

——伊曼努尔·康德，普鲁士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启蒙运动时期重要的思想家。

我深知我们需要付出多少苦难、血泪和财富来捍卫这个宣言，以及支持和保卫这个国家。然而透过雾霭我能看到冉冉升起的光辉与荣耀。我们所实现的结果比实现它的手段更有价值和意义。

——出自亚当斯在《独立宣言》签署的前一天写给妻子的信。

（责任编辑：王晓笛）





小时代浪潮下的守望者 ——献给《闻道》三周年

李沛*

今年，是马年。马年的到来，不标志着某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发生，却标志着一本学生自办刊物已经发行三周年！这本刊物为国关院师生所熟知，这本杂志为三届编辑部成员所喜爱，这本杂志为众多路人甲所遗忘。这样的一本小刊物，有着朴实而内涵的名字——《闻道》。因此在三周年之际值得写一些真挚的东西献给这样一本独特的《闻道》！原因不在于这本刊物是否能给编辑们带来某些利益，也不在于这本刊物是不是由我和同学一起创办，而在于这本不起眼的小刊物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是一个很多 30 岁以上的人所不能充分认识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很多小白领们对余额宝收益率、淘宝店出售量的关注超越了对这个国家贫富差距大不大、社会资源分配公平不公平的关注。因为，这个时代的很多小女生们对宝马车上哭的向往胜过了自行车后面的笑。因为，这个时代的小屌丝们对一夜暴富的渴求超过了国家未来在哪里的谈论。种种迹象都表明，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全新的“小时代”。^①在这个时代里，上一代所追求的众多精神需求逐渐被新一代所边缘化。年轻的大多数，甚至包括坐在政治学课堂中的众多硕士研究生们对王力宏结婚、Flappy Bird 得分的注意度远远超过中央打虎行动和李泽厚伦理学课程。就如凤凰网 CEO 刘爽所言，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创富、致富，是娱乐、享乐，极端的甚至是炫富、奢靡。^②

*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级硕士研究生，《闻道》的主要创始人和第一届主编。

① 如果看看《小时代》这部电影为什么受到年轻一代的疯狂追捧，以及小时代下给从业者带来的巨大挑战，对笔者做出这一判断的质疑将会荡然无存。

② 参见刘爽在凤凰网 2013 年年会上的致辞：《顺势而为，拥抱生活》，http://tech.ifeng.com/internet/detail_2014_01/21/33196073_0.shtml。

在这个主旋律下，从根本上体现的是大数据和移动浪潮的汹涌冲击^①：一分钟内微博新发的数据量超过 10 万，社交网络“Facebook”的浏览量超过 600 万，数据量在短时间内从 TB 级别跃升到 PB、EB 乃至 ZB 级别……而我们仅仅需要一个简便小巧的移动智能终端就可以帮助刷新上述记录。个体表达自身感受的声音在海量的数据中瞬间被淹没，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因虚拟空间的无限放大显得愈加渺小。当前的小时代和希腊化时期一样，这是历史的进步却是个人的悲剧。如果说希腊化是用冷冰冰的官僚制度和强力打碎了带有人文情怀的地域性城邦，致使个人在大帝国内无法找到自身的命运之绳，那么小时代的浪潮则是用无限放大的虚拟世界突破现实世界的地域局限，造成个体在数据汪洋中的渺小和孤独。两者的惊人相似之处在于，留给个人的只能是无处安放的个体和无处安放的精神家园。最终每个个体只能进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循环，寻求自我的满足和享受。而这恰恰在本质上反映出个体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对自身意义的渴求。

令人欣喜的是还有大学的象牙塔没有完全卷入小时代的浪潮之中。在华师大这所象牙塔里，一批又一批还未完全接触社会的学生们构建起了一个自娱自乐的精神小岛——《闻道》。在里面，我们可以不去想所做的事情会不会像余额宝那样带来超过 6% 的收益，也不理会这本刊物能不能超越汪峰登上头条，更不去理会有没有好友在微信上给我们点上 32 个赞。唯一理会的是我们办这样的刊物有没有意义？怎样去办？而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新鲜出炉的刊物，或是一份兄弟般的友谊，而且还包括精神世界的满足和离开校园后的美好回忆，最重要的是给心灵一个纯洁的港湾。也许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小小的学生刊物便具有了不同的时代价值。它没有卷入小时代的浪潮中去，甚至在主流的浪潮下成为了一朵小小的奇葩，但它却成为了时代的守望者，就像 2000 多年前的第欧根尼让伟大的君主不要挡住照来的太阳一样值得推崇！

举目远眺，不管世界的那一头是冷酷的地狱或是精彩的仙境，坚持青年学生自由意志和应有尊严的《闻道》人，应该埋头做属于学生自己的事业，构筑一个可以安放青春的精神之岛，不要因为路人甲和路人乙都认为你们在自娱自乐，而放弃做一个麦田守望者的时代价值！

（责任编辑：王晓笛）

^① 关于大数据时代和移动浪潮对人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可以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美]迈克尔·塞勒：《移动浪潮》，邹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

将心注入

吴途勇*

2013 进入尾声，迈入 2014，《闻道》就 3 岁了。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闻道》看着我从一个研一的新成长为即将毕业的研三老生。从进入大学到现在，我加入过多个社团，平心而论，对《闻道》我用心最深、最真，这段经历也对我影响最大，甚至部分重塑了我的价值观。

回顾两年编辑生涯，极为难忘，在闻道的日子仍历历在目。2011 年进入国关院不久，《闻道》就开始纳新，那时闻道刚刚成立半年多，非常年轻。新进国关院的我，对这份杂志了解不多，但是看到李沛、孙超、李荟、程艳阳、刘佳琪等师兄师姐在纳新会上绘声绘色的介绍，我受到了感染。尤其是李沛师兄讲，我们要把办《闻道》作为研究生期间最重要的事业来经营，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确实也非常希望在一个学生杂志做一位编辑，当时我还是研究生刊物《华实》的编辑。我认为在青春的岁月里，能自主地办一份杂志极为浪漫，在我年老之时，回忆起我曾经是编辑将令人激动。而且，做杂志也能在编辑工作方面锻炼自己。

我加入的是学术版，孙超师兄是学术副主编，陈洁琼师姐是资深编辑，同在一个板块的还有安龙、生升。加入学术版块，我是希望这能够帮助我在学术上成长。研一开编辑会议，我们一起讨论的日子，回忆起来真是感慨万分。记得我们第一次开编辑会议，讨论翻译一篇关于俄罗斯研究的译文。孙超师兄认为作为学术板块的编辑，就要积极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钻研学术，必须要有这种意识，才能做好学术编辑工作。孙超师兄、安龙和生升都决定一心向学，而我却做了“叛徒”。记忆犹新的是，我以本科时期写的一篇文章为底本，把它重新改写成书评拟发表，预先发给孙超师兄审阅。他对我的文章进行的极为耐心细致修改和编辑，对我触动很大。我的文章写得一般，但他对待文章的严肃态度让我颇为感动，还从来没有如此改我的文章。这种职业精神和做事态度，让我重新认识了编辑的职位和工作伦理：作为一个编辑，我们要认真负责对待每一篇来稿，不要怕麻烦和辛苦。

做学术编辑的时间里，在孙超师兄的指导下，安龙、生升和我承担了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生，曾任《闻道》第二届主编。

审稿重任，对每一篇学术论文来稿进行匿名评审，以学术水平为唯一标准。其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李沛师兄当时也向我们投了一篇论文，照例隐去了名字，交给我审。在审稿过程中，论文不仅被发回修改，而且在对文章的评论中，他的论点和行文还被我过重地批评了一番。但作为主编，李沛师兄以身作则，尊重和遵守匿名评审制度，对我过重的批评非常包容，让我着实佩服。可见坚持公正的制度，对于学术公正、学术质量非常重要，在制度和公正前面，不能留情面，即便是杂志的主编，也不例外。

在12年4月，《闻道》编辑部进行了换届，完成了新陈代谢，我们11级编辑团队的责任更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创刊的首届编辑团队非常优秀，他们将茁壮成长的《闻道》交给我们，既让我们感到开心，也让我们倍感压力，我们每一个编辑都在担心能否挑起这副担子。很快，我们召开了编辑部大会，总结和讨论《闻道》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这次会议讨论热烈，成果也很丰硕，奠定了接下来一年的办刊思想。为争取更大的发展，在遵守《闻道》办刊基本理念的前提下，我们对杂志从形式设计到内容排版都进行了大的改革。趁热打铁，我们将新的办刊方案立即付诸实施，以防久拖生变。新的方案还征求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意见。

事实证明，新的编辑团队运作非常成功，能够承担《闻道》赋予我们的重任。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12年8月中下旬，我一个人正在南方几个省市骑行，9月初就要发行新一期杂志。在出刊之前，有些重要工作需要我做，暑假往往又联系不易，编辑们各有假期安排。但在小娇、乔圆、崔攀、李洋、孟维瞻和其他编辑的通力合作下，杂志按时出刊。那个学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主办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刊物论坛”、“《闻道》主题研讨沙龙”等活动，都很成功。

在《闻道》，我深刻感受到了团队精神和合作的重要，《闻道》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将心注入的结晶。回顾过去，由于李洋、维瞻、安龙、生升、承璋的努力，学术论文质量才得到很大提高；正是亮哥、崔攀、永福、亚宁和子兰对文艺版所做的改革，文艺版才更加具有人文气质；乔圆和我对学人访谈、新闻报道做出的革新，使得这两个部分耳目一新。小娇对统稿、排版和校对的那股认真劲、执著精神，则保证了细节的精确，使得杂志更完美。航翔对外观和细节美的追求，封面才有了文艺小清新的风格。其实，我们在办刊过程中，编辑之间，不乏争论和分歧，有些分歧甚至是根本性的，但我们都开诚布公，因为我们知道，正是我们对这份杂志倾注着最真

挚的感情，希望《闻道》更好，才会使得我们勇于说出自己的看法，不惜争得面红耳赤。但最终我们都从《闻道》发展的长远考虑出发，在争论和对话中形成共识，相互理解和支持，促成了杂志的发展。

那一年的时间里，大家一起改稿、审稿，讨论新一期的内容主题，一起反复校对、排版。为准备学人访谈，我们一起讨论访谈提纲，听录音整理稿件。新一期的封面和内页，我们都要讨论好几遍，图片和每一个字的位置都反复推敲，改了又改，不厌其烦，直到设计出最好效果。航翔和承璋对我这个“技术盲”也是无可奈何。在统稿时，编辑们会为了一个标题而讨论不休，会逐个标点和文字的去修改引文注释。我们会在线上用 QQ 开在线会议，会利用吃饭时间讨论文稿。非常感念学院图书资料室，在那里我们开了多少次大会小会呀。更忘不了的是，稿源不够、发刊在即时的那种心急如焚！这个过程中，每个编辑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担当让人景仰。

或许在外人看来，《闻道》既非核心学术期刊，也不是人文、财经名刊，对外界无多大影响力，但在我们编辑看来，它就是我们的杂志，属于我们。在这个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日渐衰落的时代，坚持办《闻道》，真正是在承载着我们的理想，凝结着我们年轻时的激情。

并且，作为一份学生刊物，正如我为第 6 期写的卷首语《从文字到思想，打开思想可能的空间》所说，通过《闻道》，我们在进行学思操练。

《闻道》3 岁了，祝愿它在一届又一届编辑团队的努力下，将办刊理念发扬光大，走得更远，成为属于学生的一流学术人文刊物。我们相信，只要将心注入，就能做到！

（责任编辑：席天士）



在《闻道》中蜕变

曾乔圆*

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人被扔进了秋天的时空里。早晨出门，踩着遍地凋落的枯叶，周身被浓重的秋的空气包围着。在这个姗姗来迟的 2013 年秋天里，即将毕业的我们在面试、招聘会、公务员考场间往来奔波，焦急地寻觅着职场的归宿。

在我们形形色色的求职简历上，必有一隅是《闻道》编辑的经历。并非为了炫耀，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能力，正如每一位“闻道人”所独有的务实求真精神。

《闻道》虽然年轻，却集结了国关院最优秀的人。在《闻道》，我们结识了李沛、刘佳琪、孙超、程艳阳、田艺伟等一批品学兼优的学长学姐；在《闻道》，吴总、小娇、尹亮、永福、安龙和我结成最真挚坚固的友谊。无数个日子，我们在 QQ 中讨论刊物细节，在资料室里汇报各栏目的进度，在会议室里作编辑总结，甚至在食堂一边吃饭一边讨论。那样的日子，总是飞快而逝，唯余美好的回忆在脑中久久沉淀。

因为《闻道》，国关院的老师们与学生联系更紧密了。犹记得：在闵行教师之家温暖的咖吧里，林国华老师优雅怡人的坐姿；在阳光四溢的白俄罗斯中心，贝文力老师面带微笑娓娓而谈；在逸夫楼宾馆一楼嘈杂的大厅里，于向东老师满腔热血语出惊人；在学院 402 室柔和的灯光里，刘擎老师满腹经纶高语连连……我们意外地发现，课堂之外的老师们有着更深的学识和更平易的人生态度，令我们获益匪浅。

在《闻道》，我重新认识了自己，重树了对生活和学习的自信。在《闻道》，我学会了词句的斟酌推敲，学会了用文字凝固人生的美丽瞬间、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发现了文字之美，爱上了写作和阅读。

毋庸置疑，《闻道》，已成为我研究生期间最重要的标志和记忆。

在离开《闻道》后，我突然发觉自己已完成蜕变，犹如身经百战后胜利凯旋的勇士。我相信，将来无论会遭遇多么猛烈的风雨，坚强的心，将助我渡过一切难关！

（责任编辑：席天士）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生，曾任《闻道》第二届副主编。

我站在丽娃河畔

王晓笛*

我站在丽娃河畔
黑色的皮箱和灰蓝的跑鞋
九月的风，淹没过我的膝盖
贫困的诗人被遗忘在河底
身旁是他深爱的家人

他疯疯癫癫，他喃喃自语
他说，他是整个校园里最知道幸福的人
他还盗取火种
将它们咬碎，灰烬
一点一点，画出他的师长与朋友

有种声音这样告诉你，如同教堂里被人唱起的诗篇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那是诗人睡觉的地方
你去看看，那里还有他不曾带走的草席

那个时候
诗人还没有成名
三年后，他或许会爱上这个地方
一些恩怨，一些吵嚷
大家终会走散
在别的地方
我们常常提到那片神奇的土地
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

（责任编辑：席天士）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生。

专题报道

“中亚南亚战略交叉点”国际研讨会 在我校举行



2014年，美国将从阿富汗撤军，这对于整个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安全局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中亚与南亚地区。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交往，推动与世界各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2013年12月12日至2013年12月14日，我校举行了“中亚南亚战略交叉点”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周边论坛。会议由我院和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南亚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各国的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共同探讨了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局势。

会议开幕式由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我校副校长范军教授和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南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罗杰·康加斯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范军教授在讲话中首先代表我校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成为各国学者良好讨论和对话的平台，集思广



益，为中亚和南亚地区战略局势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他指出，我院与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推动国际交往和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希望能够进一步聚合各界力量，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发展和谐共赢的国家间关系做出贡献。

会议中，与会各国学者就在美国 2014 年从阿富汗撤军的大背景下，如何评估目前中亚和南亚的安全局势，近期中亚和南亚所处的战略交叉点面临哪些主要战略威胁，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在内的各大国对该地区的安全和发展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地区内部存在怎样的多重冲突利益，相关国家有哪些求同存异的新渠道和新举措来促进地区安全等问题，进行了系列圆桌讨论。学者们指出，我们即将迎来的可能是未来地区局势重要的转折时刻（Break Point），只有各国之间增强互信，建立紧密的合作与对话机制，才有可能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既需要各国政府层面的协调，也需要各国学界和智库机构的讨论和对话。会议的讨论将会为各国的决策层提供更多的参考。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网站）



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

“最后的边疆：新欧亚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金融危机之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新的“欧亚”理念引发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争论。在这种背景下，2013年11月16日，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在中北校区举办了“最后的边疆：新欧亚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英国肯特大学协办。来自中国、俄罗斯、加拿大、英国、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等国的专家学者以及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的开幕式由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论坛代表塞拉妮昂女士致辞。会议中，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主席

卢基扬诺夫教授、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尔坦诺夫教授、我校冯绍雷教授、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杜特科维奇教授、英国肯特大学萨科瓦教授等先后围绕着“最后的边疆：新欧亚理念”发表了主题演讲，各自陈述其观念认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李新研究员等对各国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会议最后，与会各国学者就会议所讨论的重点内容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汇聚各家论述，精彩纷呈。此次国际研讨会中各演讲者的精彩内容和主要观念在不久以后将以英文版著作的形式结集出版。

本次会议的召开也得到了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大力支持，会议也以2013年度“小瓦尔代”分组会议的形式被纳入瓦尔代国际论坛序列。这也是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第三次组织召开“小瓦尔代”会议。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网站）

（责任编辑：杨晓娜 古娅珂）

2013年12月12日至14日，“中亚南亚战略交叉点”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周边论坛在我校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各国的学者共同探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局势。我校副校长范军教授、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南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Roger Kangas 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开幕式。

2013年12月9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所长 Prof. Marcel Van der Linden 来我院做了主题为“苏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的讲座，会议由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我院师生踊跃参加。

2013年11月18日，俄罗斯著名学者、《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卢基扬诺夫做了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精彩演讲。讲座由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我院师生积极参与。

2013年11月16日，由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由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英国肯特大学协办的“最后的边疆：新欧亚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中北校区举行。我院研一研二全体同学参与了此次会议，同学们与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互动。

2013年10月21日，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翻译家，原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教授来我院讲座，主题为“中外国际关系史漫谈”，讲座由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我院师生踊跃参加。

（责任编辑：杨晓娜 古娅珂）

院外来音

“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 2014：中国外交新十年”

2014年1月4日至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协办的以“中国外交新十年”为主题的“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 2014”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 408 室成功举行。自 2004 年首届“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成功举办以来，讲坛连续举办了 10 年，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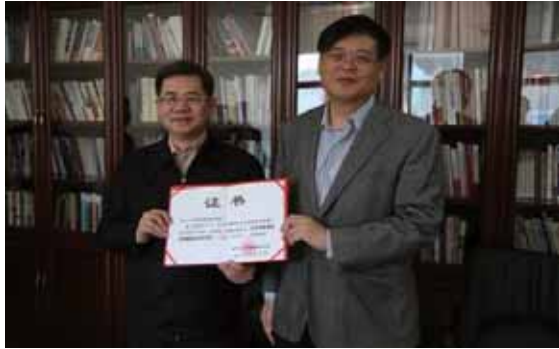
2014年1月5日，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和复旦大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文科楼 725 会议室召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总的目标，这在历届党代会来说是一个理论创新，但是在报告中没有具体的展开。实际上，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提升和优化。这些都是很重大的理论问题，研讨会取得了很好的观点和扎实的成果。

（摘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外交部确定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为
“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

2013年12月1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一行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调研，同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战略研究院负责人座谈，共同探讨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任务。郑泽光部长助理说，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前身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于 2010-2012 年期间，作为四个“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对象”之一，高质量地完成了多项外交部委托的课题研究，受到外交部有关领导和单位的表彰。

（摘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东北亚区域合作模式新探：以再生医疗特区为例”研讨会 成功举办

由北京大学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与日本 MBK 株式会社联合举办的“东北亚区域合作模式新探：以再生医疗特区为例”研讨会于 11 月 9 日上午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大学、日本 MBK 株式会社等相关单位的官员、专家及企业家共计二十余人参与了此次会议。中心副理事长古川令治先生出席并做主题发言，会议由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心理事关贵海和中心主任王正毅教授主持。

（摘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超越地缘政治：建立中美关系新框架”国际学术研讨会 成功举行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 11 月 2 日至 3 日在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主题为“超越地缘政治：建立中美关系新框架”的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中外高等学府的 20 多名国际关系学者就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精彩的学术研讨。

（摘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责任编辑：杨晓娜 古娅珂）



征稿启事

这是一份学生刊物，

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我们相信：与天下才俊共闻天下之达道，
相互切磋、互相发明，已是世间最大的快事。

这是一份学生刊物，

没有太多的现实功利。我们深知：象牙塔乃真理的永恒故乡，
与真理为友，学无止境、止于至善，正是学者固有的天职。

这是一份学术思想刊物。

“思想无禁区，学术有真知”，是我们的执着追求。

我们知道，真正深邃的思想与艰深的学术背后，
无不挺立着强健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格，或许还有高贵的灵魂和卓越的胆识。

《闻道》属于年轻人，属于与你我一样的年轻人。

他们怀揣梦想，勇于创造，他们嘲笑对过去的迷恋，
蔑视陈规，反对纠结于历史——因为，未来注定属于他们！

所以我们向你——我们亲爱的朋友，征稿。

我们恳请你惠赐佳作，我们需要你的声音，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我们需要你敏锐的思想与激昂的豪情。

冷静艰深如学术论文，热情饱满如诗歌散文，

快意哭笑如思想、情感杂论……好文、妙文、怪文、奇文，皆受欢迎，

总之我们鼓励学术思想争论，鼓励批判性思考，鼓励心灵情感独白。

当然，对于来稿，我们不得不有所筛选，但我们保证，会认真对待每一篇稿子，

会尊重每一位朋友的文字、思想与情感。

对于学术文章，我们强调严格的学术规范。

若来稿得到采用，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酬劳。

朋友们，请与我们结伴而行！

来稿请发送至：ggwendao@gmail.com

《闻道》编辑部





封面故事：

油画描绘的是《佩列亚斯拉夫协定》的签订仪式。1654年1月18日乌克兰哥萨克领袖赫梅利尼茨基与俄国沙皇代表签订了后世说不清道不明的《佩列亚斯拉夫协定》，正是这一协定从“法律”上规定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统治。